

目 录

1. 辛亥革命在柳州……………戴义开(1)
 附：刘古香事略
 李德山事略
 王植槐事略
 柯汉资事略
 李友梅事略
 吕士宾事略
 吴挺生事略
 龙禹门事略
 谭 昌事略
2. 陆亚发在柳州起义见闻……………龙月卿(41)
3. 护法战役中我入湘作战的经过……………冯浦澄(46)
4. 二次革命柳州起义亲历记……………覃子权(63)
5. 我所知道的陈炳焜……………冯浦澄(69)
6. “四·一二”事变柳州清党捕杀点滴……………刘克初(89)
7. 一九三二年秋廖磊第二次率部进犯
 东兰凤山和谋害韦拔群同志的经过……………沈 治(90)
8. 钟祖培反白崇禧活动概况……………杨 义(95)
9. 昆仑关战役亲历记……………陆学藩(101)
10. 抗日战争期间柳州商业概况……………黄炳棠(119)
11. 解放前广西桂林特察里的概况……………谢凤年(128)
12. 桂北军政区和平改编前后……………蒋道宽(142)
13. 我从柳州、南宁、小董溃逃亲历记……………陆学藩(151)
14. 解放初从大陆逃到港澳的
 桂系军政人员概况……………谢凤年(160)

辛亥革命在柳州

戴义开

一、威武雄壮的柳州独立斗争：

（一）柳州城的独立斗争。

（二）融县夺权斗争。

（三）二次革命柳州的讨袁斗争。

二、形成柳州独立斗争特点的几个条件：

（一）长期反清武装斗争的传统。

（二）柳州是清政府政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地方。

（三）立宪派保守势力在柳州影响较少。

（四）有一批斗争经验较丰富的革命派骨干。

（五）柳州革命党人比较重视武装斗争工作。

附：

刘古香事略

李德山事略

王植槐事略

柯汉资事略

李友梅事略

吕士宾事略

吴挺生事略

龙禹门事略

辛亥革命在柳州

威武雄壮的柳州独立斗争

七十年前，即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全国各省相继响应，宣布独立。广西宣布独立是在十一月七日。各省独立时情况不一样，有些省是革命党人左右局势，有些是清政权原班人马或君主立宪派人士摇身一变，成了新贵。广西大体上是后一种情况。说它大体上是，因为有些局部不是。这个局部就是柳州。

梧州率先由立宪派份子宣布独立。独立后的政权机关保安公所是由立宪派份子把持，其后梧州军政分府府长就是原来满清道台沈林一；桂林是由清廷广西省谘议局议员到藩台衙门请愿，经广西巡抚沈秉坤同意，并由他来宣布独立的；南宁的独立是同盟会派代表到提督衙门谈判，经提督陆荣廷允许，由他派代表参加宣布独立的。广西这几个地方的独立，在政权的变化上是换汤不换药，实权仍然掌握在旧政权官员手里。在宣布独立的大会上，这些封建旧官僚辫子也不愿剪掉，清廷的朝服也不肯脱下来，沈秉坤的官衔由巡抚改称都督，他在宣布广西独立的通电上说：“除改抚院为军政府，谘议局为议院外，一切机关用人行政，均仍旧制”。陆荣廷

的提督官衔改为付都督，宣布独立的当晚，陆荣廷还在家里设香案叩拜，向“皇上”请罪。列宁说：“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的政权问题。”广西上述的种种现象，使得有人怀疑广西独立是假的。事实上辛亥革命之后一段时间，广西的政局是旧封建官僚统治继之以新的封建军阀统治，人们的这种怀疑是有根据的。不过，广西的情况在全国各省中，是属于一般情况，但柳州就不同了。不仅在广西省内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在全国各县（州）中，也是少有的。据李侃同志辑录，受武昌起义影响最为直接而武装夺取政权的，湖北十个县（州）里只有三个是革命党人能控制局势的；江苏省二十八个县（州）里只有一个，《社会科学战线总十六期二十九页》，当然，辛亥革命广西独立的形势跟全国各省一样，不能仅用“假的”两字以概括。由于辛亥革命，中国历史的进程的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反封建虽然是不够彻底的，但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确把中国推进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毕竟，历史前进了，透过“政权仍然掌握在大大小小的封建统治者手里”这一层令人沮丧的乌云，还是能够看到鼓舞人心的光景，能够感受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洪流虽然是缓慢的，却也实实在在推动着这个古老社会的演变。历时几千年的封建帝皇专制制度终于结束，从此以后，任何野心家想要搞封建专制统治，都要受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而以失败告终。这是辛亥革命给予中国历史的新的东西。广西当然也受到了这场伟大的洗礼。而在广西各地宣布独立的日子，柳州的独立，是特别令人鼓舞的。辛亥革命在柳州，远较广西其它地区彻底。在柳州，革命派对满清政府的夺取斗争，是相当威武雄壮的。

(一)

柳州城的独立斗争

柳州于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九日（旧历九月十九日）宣布独立。柳州宣布独立之前，同盟会会员刘古香、邓宝书、钱权、陈晓峰、张铁臣、卢焘、黄岱、李德山、宋洪、柯汉资、王植槐、李子廷、梁润生、郭干臣、刘震寰、王干庭、杨秀芝、杨瑞池、莫显丞、韦伯荣、吕士宾、熊少丞、吴挺生等已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柳州同盟会会员武装夺权的意识比较强，他们有着相当周密的起义行动计划，他们大致部署有：一、由策反成功的清军帮统刘炳宇、水师统领刘月卿发动各界人士集会，掀起要求独立的社会舆论，对清政权施加压力；二、刘炳宇、刘月卿及熙字营督带陈朝政，水师管带兼巡防营管带胡岱铭各率所部在城内起义，从内部瓦解统治集团武装；三、由已经联系好的商界、士绅掌握的地方团练负责维持社会治安秩序；四、由同盟会会员钱权率领高岭塘的垦兵向城内挺进，以为策应；五、大量会党民军布防三江一带，牵制桂林方面可能向柳州进击的清兵；六、同盟会柳州各部长王植槐和刘震寰、柯权资、宋洪、郭干臣、王干庭、吕士宾、吴挺生等率领同盟会会员和会党民军，组织敢死队，向城内各级清政府衙门进攻。这样内外发动，四方呼应，各路并进。冲进道台衙门（地址在今河北大桥头交通大队）的郭干臣手拿两个炸弹当面警告道台沈秉炎：“你不走，我就炸死你！”冲进柳州府衙门（地址在今培新路）的宋洪挥刀威胁知府高墨林，要他立刻交出官印。在这种形势下，清廷

右江镇总兵陈鸿初、右江道台沈秉炎，柳州知府高墨林、马平县知事万荣龄交出了军政、财权，被驱逐出境。同盟会在柳郡中学堂（中山东路文化大院）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柳州独立。大会通过成立“右江国民军总机关”。王植槐为总机关司令官，周焕章为秘书长，郭于臣、邓宝书负责参谋部，梁润生、翟富文负责秘书部，韦伯荣、银永亭负责军需部，杨瑞池、王干廷负责军械部，刘肇周、韦荣、刘名世负责军法部，柯权资负责执法部，何觉负责电报局，熊少亟负责外勤部。民军及团练编组为两个支队，刘震寰、宋洪分别任一、二支队司令。为了组织北伐的兵力和加强地方治安，成立了柳州区征集所，王植槐兼任所长。一个月之内，征集沈鸿英、曾四、甘六、蓝八、韩彩凤等约二千人，枪八百杆，总机关直接听从广东革命政府的指挥，能较好地贯彻同盟会各项政策策略精神，排除广西封建官僚军阀的干扰。广西宣布独立后，陆荣廷对革命党人渐显露狰狞面目，企图以缴新军武器，囚禁同盟会武装骨干来扑灭革命势力。柳州党人愤然发出驱逐陆荣廷的呼声，陆慑于革命党人的锐气，不得不释放新军队长谭昌，重行召集原新军员兵以缓和众怒。并派出南宁军政府的交通部长，同盟会员雷在汉来柳州调停，以平息反陆活动。广西独立不久，同盟会在南宁的活动即受制于陆荣廷；梧、潯的革命派武装被陆镇压；桂林活跃于政界的一般谄议局衮衮诸公，群争媚陆；而敢于树起反军阀旗帜和陆对抗的，以柳州革命党人为最力。在宣布独立后，迅速建立起了同盟会员为主体的新政权机构，有效地施行军政权力，顺利地展开各方面的善后工作。

右江国民军总机关成立不久，王植槐即致电广东，请刘

古香回柳州主持工作。广州光复后，胡汉民任广东都督，刘古香任都督府秘书长。这时候，广东革命政府为了加强革命党人在广西的力量，就派了在柳州革命派人士中最有威望的刘古香回柳州，主持右江军政事宜。十一月二十八日，总机关改组成立右江军政分府，得到广西军政府的确认。一九一二年一月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主持南京临时政府的三个月中，发布了几十件有利于民主政治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法令。宣布“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废除封建陋规恶习；如体罚、刑讯、雉发蓄辫，跪拜礼节，称呼“大人”老爷等等。革命新气象豁然开。柳州右江军政分府总长刘古香，也是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就任。由刘古香、王植槐主持的同盟会柳州支部，一直在孙中山、黄兴领导下的同盟会总机关指挥下开展活动。柳州新政权既为同盟会员所主持，自然比广西其它同盟会失势的地区更有力地贯彻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同盟会执政时期，柳州新气象迥异寻常，自是不言而喻。刘古香就任分府总长，起义军官陈朝政任付总长，同盟会员王狮灵任参谋长，地方人士朱奇元任民政长，刘海如、钟尧勋分别担任财政、司法长等职务。将原总机关的一部份人员派往各县任职，以加强地区革命派的力量。军政府积极刷新军民政务，同时为响应孙中山北伐号召，裕筹军饷，准备北伐，委任邓发为广西右江北伐军司令官，严兆丰为总教练，以编训北伐部队。为了更有效地整顿各县粮税，又派出朱奇元任迁江县知事，黄坤任罗城县知事，邓宝书任融县知事，邓士瞻任三江知事，王宏猷任马平县知事，钟尧勋任柳州警察局长。南北议和之后，政治局势发生重大变化，陆

荣廷恃仗袁世凯的支撑，对革命党人的强硬态度变本加厉。力图把柳州革命派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军政分府成立才几个月，广西都督府下令撤销，任命刘古香为陆军第五路统领。刘震寰、刘炳宇为帮统，原分府付总长陈朝政为陆军第六统领，调离柳州，兼任庆远府府长。王狮灵为柳州府府长。王植槐为新军第四营即模范营营长。刘月卿为水师统领，民军帮会首领曾祖尧、冯有信、宋五、廖辉庭、刘士雄、刘成甫、刘福卿等各任帮带、哨官等职。这时候，革命党人在柳州地区仍然有实力，右江各县政务，仍然在革命派的推动下展开。直至第二次革命柳州讨袁失败，革命党人所建立的政权才全部被陆荣廷军阀集团所破坏。辛亥革命柳州独立到二次革命失败，革命党人掌握柳州地方军政实权历时两年，这是广西其它地区所没有的。从右江国民军总机关到右江军政分府以及柳州府这几个政权机构的成员名单中，可以看到：同盟会员始终掌握了主要行政，军事职务，而参与或倾向革命的士绅和旧官僚（包括清军起义军官）也都占有一定名额，但不居于主导地位。这种情况当时在广西其它各地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的事。

（二）

融县夺权斗争

广西独立，并非全部是和平转变，兵不血刃的。潯州（桂平）和融县（即现在的融水、融安两县）都曾爆发了较

大规模的流血战斗。潯州战斗以形势不利，没有收获而撤退，起义军最后还是被陆荣廷强行遣散了。在广西，革命派和清政权最激烈，流血战斗而革命派取得胜利的，是发生在柳州地区，并且是由同盟会掌握的右江军政分府派出军队发动的。柳州宣布独立后，融县清军知事张礼乾拒不交出权力，并且加紧对人民群众革命意向的压制，刺探监视各界人士中的进步言行。对广西及各地方宣布独立的事不肯表态，而他属下的县警则大量收购火药及棕绳等物，引起地方上惊虑不安。右江军政分府派出专人到融县调查，地方人士证实张礼乾确有反抗独立的企图。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初右江军政分府派出民军到融县，组织融县军民办事处，领导地方起义活动，会同县里团练向清县警发起攻击，经过激烈的交火，县警向贵州边境溃逃，知县张礼乾在窜逃的时候溺死河中。革命军占领了县城，民军办事处联同地方人士推荐新县知事。融县光复十分有力地显示了右江军政分府的革命锐气，在桂林、南宁、革命党人对封建官僚、军阀把持的政权，侧目重足，没有插手之余地。同盟会广西支部长耿毅，新军中重要的同盟会员陈裕时、谭昌在这种形势下，退出地方的权力斗争，离开广西去参加北伐。在梧州，同盟会员只成了桌子上的“花瓶”，他们所借重的会党武装力量却在遭到陆荣廷军阀集团的血腥镇压，发生了所谓“镇梧”“平潯”事件。这和柳州的右江军政分府对融县清县知事顽抗势力的坚决镇压，正好成为鲜明的对比。融县之战，在广西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局部事件，但意义却很重大。在新成立的民国政权领导之下，革命军队联合地方民众武装，对拒不投降的反动政权给予摧毁性的打击，把一个县的地方权力夺了过

来，当时全省之内这是独一无二的，在全国各地，也是不多见的。这个事件表明柳州革命势力确是比较广西其它地区为强大，并且，通过国民革命政权的武装对满清反革命政权胜利的讨伐；还表明在全广西以至全国日渐增强的封建军阀压力之下，柳州地区取得相对优势的革命党人，却在持续地，勇敢而坚决地向反动势力发动进攻，毫不迟疑地行使了革命的权威。

(三)

二次革命柳州的讨袁斗争

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三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三月十日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全国政治局势的这个重大变化，在根本上决定了柳州这个局部革命事态的发展。十三日孙中山致电陈炯明，认为“南北统一，民国大定，各省民军过多，亟宜分别遣留。”四月一日孙中山在一个同盟会会员饯别会上演说称：“英、美诸国社会革命，或须用武力，而中国社会革命，则不必用武力”。六月十三日黄兴电告袁世凯：南方军队已按计划裁撤，“约计不下二万余人。”同盟会的最高领导层在实际上已经让自己的党自动解除了武装，远还没有完成，在军事上对封建军阀势力的进攻停止了，取消了。各省革命党人的实力地位进一步被削弱了。当时柳州的革命党人仍然是柳州地区的实力派。但从整个广西来说形势对革命派是越来越不利的，陆荣廷就任广西都督之

后，就着手整编军队，要把包括民军在内的全省武装力量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六日，陆荣廷电令柳、梧、龙州军政分府在三月一日撤销，原分府总长改任统领。刘古香任陆军第五路统领，统兵约一千多人。广西境内就只剩下这唯一的由同盟会掌握的武装了。这支军队被陆荣廷军阀集团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因为广西独立不久，沈秉坤、王芝祥相继离桂，陆荣廷将率兵到桂林接任都督职务的时候，同盟会中有人主张提请广西参议会选举刘古香为都督，但终以刘古香实力单薄，未足与陆抗衡而作罢；又柳州同盟会员以广西宣布独立时，陆态度暧昧，并对邕、梧、浔等地革命党人肆虐而曾提出驱逐陆荣廷的口号。陆由此种种，对柳州革命势力十分忌恨。孙中山发起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后，陆荣廷对柳州的动向更感紧张，收买了王狮灵和沈鸿英暗中监视刘古香。王狮灵原是跟随刘古香从广东上柳州的同盟会员，见陆荣廷势大而变节投靠。沈鸿英由刘古香从绿林中一手提拔上来，当时他所带领的部队是刘部中武器最精良的。一九一三年七月间，孙中山、陈炯明分别由香港、广州来电柳州，促令发动响应“二次革命”。七月十二日二次革命爆发，广东都督陈炯明派代表来柳州，约刘古香同起兵讨袁，刘古香慨然答应，要求广东协助军饷，陈炯明也同意拨给十六万元。十八日广东宣布独立，讨伐袁世凯。八月，广东、湖南、江苏、江西、四川等省讨袁相继失败，九月十五日，袁世凯下令通缉孙中山、黄兴之前两天，即九月十三日，柳州革命党人毅然树起二次革命讨袁大旗。当刘古香答应广东起兵讨袁的时候，广西形势已经很险恶；陆荣廷对革命党人潘乃德说：闻得刘古香等在柳州将有所举动，

你与刘认识，请你告知他，不可妄动，否则我是不客气的！刘古香当然知道一旦发动讨袁，陆荣廷军阀集团必然倾力来对付柳州革命党人，力量的对比则是非常悬殊的，刘古香召集党人秘密商议，对付袁的具体时机和策略还是犹豫未决。陆荣廷调刘古香为田南道道尹的调令下达后，革命派识破这是调虎离山、分化瓦解的阴谋，刘古香也没有离开柳州，局势日趋紧张。王狮灵、沈鸿英在革命派内部加紧了破坏活动。郭干臣从广州运回一批讨袁的军饷和武器，到达柳州的当晚即被人从刘古香家中引诱出去（刘当时下乡剿匪不在家）下落不明。后查知是王狮灵的密探抓去，随即将郭干臣秘密杀害。刘古香也在暗中积极准备讨袁事宜：如派出革命党人陈绍虞联络湖南志士，去到道州，柳州讨袁已发动，随即失败，陈遂止行；和农实达商议讨袁，由农到南宁运动独立，被陆荣廷发觉，将农实达捕杀。陆荣廷得到王狮灵关于刘古香召开讨袁秘密会的告密，即由陈炳焜从桂林派出賁克昭一个团，黎明卿一个营向柳州进窥。沈鸿英盘据河北中心东门一带准备内应。一九一三年九月十二日深夜，帮统刘震寰和所属周毅夫等仓促起义，鸣枪示威，由于事先未经周密计划，局面一度失去控制，刘古香卫队长刘士雄所属士兵出身绿林，此时趁机乱抢劫，刘古香秘书长梁作霖，刘妻马电，媳妇杨澧于兵乱中被枪击遇难，刘古香越墙伤足。第二天，刘震寰派出军队制止了混乱，起义军召开了讨袁大会，会上选举刘震寰为讨袁军司令官，王植槐率领的新军背（模范营）为讨袁军的主力，士兵一律带上“护国讨袁军”的臂章，群情激昂，革命热潮高涨。广西省唯一的一面二次革命讨袁大旗终于在柳州树立起来。这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继

成立民国政权之后，柳州又一光辉的历史篇章。柳州通电讨袁之后，沈鸿英等亲袁分子更在革命党人控制的武装部队中间大肆拉拢、分裂、恐吓、逮捕。结果民军一些军官被拉了过去，士兵许多开小差。九月十六日陈炳焜所部赧克昭团进据柳州河北鹊儿山和马厂一带高地，黎月卿营进据河南马鞍山。刘震寰派出讨袁军先遣队约六百人向南宁方向开进，部队渡过柳江河向陈炳焜所部发起突击，经短促交火，击毙敌军六人，越过警戒线，冲到四方塘，而城内沈鸿英兵变的消息传来，先遣队以后援无据，孤军难支，队伍随即走散。赧克昭团从北郊向城内进逼，在马厂缴了新军营的械，王植槐被逮捕。沈鸿英先以跪哭伪装诱骗伤足的刘古香至其驻地软禁起来，发动兵变后大肆搜捕反袁分子。刘震寰、周毅夫等十多名讨袁军骨干逃去香港。革命党首要人物王植槐、开明绅士杨秀芝、起义军官刘月卿、会党首领杨景廷以及许多革命派人士杨瑞池、吴芳圃、杨友兰、钟亚琼、廖月甫等均在反革命分子制造的白色恐怖中被杀害。逃脱后继续坚持反袁斗争的柯汉资、吕士宾、吴挺生、龙禹门、李友梅等先后在广州、桂林、宜山等地遇难。陆荣廷亲自带着袁世凯命令杀刘古香的电报到柳州给刘看，十月十三日刘古香就义于柳州东门鹧鸪堆（现在市机关幼儿园门前），辛亥革命柳州革命党人掌握政权历时两年（一九一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一三年十月），最后，在封建军阀反革命屠杀的腥风血雨中倾覆，柳州二次革命终于失败了。

柳州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传一首山歌：“石榴花开叶子青，柳州起义讨袁军。马鞍山脚打一仗，不知吓死多少人！”马鞍山脚一仗，死亡陈炳焜士兵六人。山歌以含蓄的方式表达

了柳州人民对讨袁的赞同和对军阀的谴责。但是革命派没有能够广泛深入发动群众，斗争孤立无援，寡不敌众，很快就失败了。辛亥革命掀起的广西境内最为激烈，最为彻底，因而也是最为壮观的柳州独立斗争高潮，到此结束。广西各地方政权，也就全部落于封建军阀的控制之下。

柳州独立，革命党人掌握政权达两年，在融县以革命暴力推翻旧统治，柳州独树二次革命讨袁大旗，以及独立前爆发的四十八砵之战，这一系列历史事实，显示了令人注目的柳州。独立斗争在全省之中特别突出的坚决性和彻底性。这些特点，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形成的呢？

二

形成柳州独立斗争特点的几个条件

持续半个多世纪的柳州地区农民起义

（一）长期反清武装斗争传统。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各种社会矛盾的对立走向激化。南方各省之中，清政府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是广西。农民起义的浪潮特别汹涌：柳州地区从一八四六年之后的梁亚发起义，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这六十年的时间，连续爆发了激烈的反清斗争。一八四六年梁亚发为首的柳江波山船水手起义，参加者多达一万多

人。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在一六五五年到一八六六年间有李文茂、陈开，大成国起义。柳州是大成国平靖王李文茂王府所在地（王府地址在今红星剧院）。一八七二年柳江县流山一带，因为征粮，农民和清官吏冲突，私塾老师蓝山萃率众起义，一八七三年失败。一八九七年马平县基隆村参加哥老会的农民刘三经在马平三都石门村起义，几千人攻占拉堡，多次和清兵在拉堡到竹鹤塘一带激战，一八九八年失败。一九〇二年到一九〇三年有以柳城四十八峯为中心的覃老发起义，先后和永宁（永福）、柳城、雒容、桂林、柳州等地清廷的军队战斗，起义军有五、六千人之多。一九〇四年到一九〇五年间，柳州陆亚发起义，这次起义发展非常迅速，声势浩大，清廷檄调两广总督岑春煊来广西镇压；调动了湖南、湖北、安徽、云南、贵州、广东、广西七个省的军队会攻，陆亚发起义失败了。但是，起义军四散潜伏，后来汇合在辛亥革命的旗帜下，继续展开反清斗争。

从一九〇七年春到一九〇八年春，一年之中革命党人在两广、云南南疆发动了多次的武装起义：包括黄花岗起义、七女湖起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州起义、河口起义。孙中山回顾这一段时期的起义斗争时说：“吾党……折而愈劲，道阻且长，期以必达，则党力无有充实之时。”这正是同盟会革命进攻精神非常凌厉的时期、屡蹶屡兴，再接再厉。这种斗争精神也都反映在柳州革命党人的斗争活动中。一九〇七年到一九〇八年间，刘古香奉同盟会香港机关的命令回广西，运动梧州、潯州、柳州、玉林等地清防军和各地会党起事，事泄而止。一九〇九年，刘古香和甘乃纲、张铁臣、李德山、卢坚白等再次联络柳州防军长官陈晓峰准

备起事，计划先打下柳州，再打桂林，集合了民军千多人在柳城太平圩及四十弄一带，清廷右江镇总兵率队大举进攻，民军迎战，打了四天四夜，起义军弹尽无援，撤退到苗山。辛亥革命前夕，广西革命党人率领的起义军和清兵战斗，投入人数以此役为最多。防城起义二百多人，镇南关一百多人，钦州二百多人，四十八弄之役，人数多于这三次人数的总和。从农民起义到资产阶级革命，六十多年间，柳州地区反清武装的怒潮，此起彼伏，延绵不断，形成了一股奔腾不息的洪流，猛烈地、持续地冲击清廷地方政权，以至于辛亥革命的巨浪一击之下，柳州清廷统治力量，顷刻之间就土崩瓦解了。

（二）柳州是清政府政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地方。

广西四大城市，桂林为一省首府，是清王朝在广西的统治中心。抚台、藩台衙门所在地，藩司王芝祥手握重兵，政治上、军事上的控制，力量均比较强。当时广西新军之中，桂林新军一千一百多，加上学兵营有几百，总共约二千人。这是革命派做了工作，可以利用的力量。但是清政府所控制的旧军有约二万人，而且新军被清官吏疑忌，不敢信任，每名士兵只配给五发子弹。辛亥革命爆发，桂林同盟会党人，被清旧军的庞大数量所吓倒，放弃了武装夺取政权。南宁是广西提督陆荣廷驻地，陆荣廷掌握众多的军队，把势力所及之地视为禁脔，俨然是南方一霸，他控制上的邕龙标（南宁、龙州新军）据曾在龙州新军中做过排长的方子鸿说：广西宣布独立，他们军人毫无所知，只开往南宁，后来编为北伐军开往南京，这中间也没有听到哪个长官跟他们讲过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南京接受过孙中山的检阅，听黄兴演讲，也没有听

清楚，没有印象。辛亥革命前穿的那套当兵的服式一直穿到民国十年陆荣廷垮台都没有改变，象这样的军队自然容易被封建军阀所利用。梧州位置靠近清朝两广政治、军事中心总督府的广州，对革命活动的反应也比较敏感。柳州情况就不同了，它地处广西中部，位于桂林、梧州、南宁之间，是清王朝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近几十年来，先是有李文茂以柳州为中心纵横驰骋，北指桂林，南及宾阳，东占平南，西控庆远；后来陆亚发也曾经以柳州为起点，锋芒所及，东北到永宁、桂林，西南到迁江、上林，西北到贵州边境。武装斗争活动有比较宽阔的回旋余地。柳州宣布独立时，大量军民集结三江，桂林藩司王芝祥想南下柳州扼杀党人，西顾而生畏，终于龟缩起来。柳城四十八寨一带，地方偏僻，重山峻岭，形势险要。覃老发、陆亚发的农民起义军和刘古香等同盟会领导的起义军都曾经利用这一带地方做武装斗争的重要据点。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存有一件光绪三十四年湖南巡抚报告，说在湖南、贵州、江西、广东、广西边界发现三万张传单，上面写约定本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柳州起事，兵分两路，从广东和湖南分别北上北京。这宣传工作，规模相当大，柳州确是普遍波反清斗争看作是适合于武装起义活动的地方。

（三）立宪派保守势力在柳州地区影响较少。

十九世纪末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改良运动是进步的政治运动，在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还没有形成强大的政治势力之前，维新派的政治运动代表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发展起来了，康梁维新派成为保皇派。这个时期改良运动中的立宪派

和康梁思想仍有很大的一致性，康有为两次来广西讲学、办学，目的还是要造就一批为君主立宪制度服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批人之中有梧州的陈太龙，林绎，他们是广西立宪派的骨干。辛亥革命时他们和封建官僚勾结起来制造假独立，排斥、反对革命派。例如梧州独立，立宪派分子林绎和清道台搭档，操纵宣布独立的活动，把持了地方政权。梧州立宪派势力比较大，有历史原因，康有为曾在梧州传经学院讲学，宣传君主立宪思想，还在梧州办了广仁学堂，一九〇四年又办新学“国民学”。立宪派势力逐渐扩大，以至辛亥革命时居然左右了梧州政局。他们害怕革命派用暴力推翻清政府，极力劝说清地方统治集团改头换面，也高唱“拥护共和”，以避免权力落到同盟会党人手中。这个目的达到之后，又追随封建军阀镇压梧州的革命派。康有为两次到桂林讲学，组织“圣学会”，创办“广仁报”变法维新的改良思想，在知识分子中间，广为传播。辛亥革命前，桂林既是广西同盟会党人最集中的地方，也是立宪派分子最集中的地方，他们之间，既有反对君主专制，发展资本主义的一致性，又有主张改良和主张革命两条道路的对立性。广西省谘议局，是立宪派分子展开政治影响的主要活动场所，促成巡抚沈秉坤宣布广西独立的，就是这个立宪派占多数席位的谘议局。南宁则有倾向于康、梁的君主立宪派的城厢派和属于同盟会的城外派这两股政治思想势力的分歧。陆荣廷在辛亥革命期间就是拉拢立宪派而抵制、打击革命派以谋取及巩固其在广西的权势的。

在柳州，君主立宪思想没有象梧州、桂林、南宁那样活跃。柳州独立活动前后整个过程中，立宪派分子没有插足的

余地。由于没有出现象梧州、桂林、南宁那样的改良思想路线的干扰，同盟会所组织和领导的柳州独立活动，没有梧、桂、邕那样浓厚的妥协色彩。

（四）辛亥革命时期，柳州有一批斗争经验丰富的革命派骨干，他们积极开展了斗争活动。

辛亥革命前，同盟会在柳州已经拥有一批能力较强的活动分子，他们传播革命思想，发动群众，联合各阶层反清力量，从敌人内部进行策反，瓦解敌人等，都做了不少工作。其中有一部分曾经多次参加武装斗争活动，有比较丰富的斗争实践经验，在起义中起了骨干、带头作用。他们的工作比其它地区做得较为广泛和深入，所以，到起义爆发的时候，已经造成了革命力量的强大优势，使武装夺权得以实现，其善后工作也比较顺利。

柳州虽然地处广西腹部，却因为梧州、柳州通航、交通便利、港、澳和穗、梧，消息传入较快，北近桂林，首府动态也比较容易知晓。这都有利于民主革命风气的开通。一九〇五年，（清光绪三十一年）清廷停止一切乡、会试，和岁科试。一九〇六年，柳州即创办柳郡中学堂，一九〇七年办马邑两等小学学堂，一九〇八年，办马邑女子小学堂。学校有英文、历史、地理、格致（物理）、图画、音乐、体育等科目。青年人的眼光打开了，民主新风气豁然兴。柳州的一些知识青年，有些到桂林、广州学习（如柳州革命派首领人物刘古香）。有些东渡日本留学（后来参加同盟会的有王植槐，杨滋庵、刘扬庭，钟明甫、钟万，李春晖、邓士瞻、王铁珊、王心佛以及在右江战斗中阵亡的宋洪，北伐军第八师团长谭昌）。这些知识青年参加了同盟会，有较高的

新知识水平，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在柳州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持续的冒险犯难的革命实践，更是为柳州起义高潮的到来，准备了较为成熟的干部力量。柳州的同盟会党人很重视抓武装斗争方面的工作，主要人物象刘古香是毕业于广东将弁学堂，宋洪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李德山少年时代就投身行伍，王植槐、柯汉资、刘震寰都有过一定的武装斗争实践，搞军事都是比较在行的。他们在策动清廷的军职人员，联络地方团练武装和会党绿林，设置秘密据点展开地下斗争等方面工作卓有成效。

一九〇四年陆亚发起义失败之后，李德山就曾经联络柳州地区会党绿林，准备打下柳州、庆远；一九〇八年又有立鱼锋绘制攻取柳州作战图事件；一九〇八年刘古香主持的拉堡葛婆庙会议，是同盟会在柳州较早的一个重要活动；一九〇九年有以刘古香为首召集的上千民军在四十八崙和清兵的大规模对抗；同时还有柯汉资等策谋的柳州万寿宫伏击计划；一九一〇年又有柯汉资等拟订的秋季祭孔日突袭柳州计划和上千民军集结屯伦村的行动；以及刘古香离柳后王植槐、刘震寰等广泛联络会党民军、策动清官吏、士兵，动员士绅和各阶层民众的工作持续地进行着，表明辛亥革命的前几年柳州武装斗争已逐渐形成奔腾之势，一浪紧接一浪，不断地冲击腐朽的清政权，这种形势的发展，跟一批满腔热血，活动能力强的同盟会党人的宣传、策动和领导是分不开的。

柳州同盟会女党人为数不少，也很活跃，在革命斗争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也是柳州起义活动的一大特点。她们之中有：

陈文，出身于沙塘江湾村武弁之家，书昼名家朱芾

(号子桓)之妻。辛亥革命前夕，来往城镇圩场，从事革命工作。联络学堂教师，家庭妇女、农妇，负责运输及掩护活动。她对策动清统领陈忠堂反正起了重大作用，柳州起义之日，她率领一队妇女首先冲入县衙门，迫使知县献印投降。

马电、也是柳江农村人，刘古香之妻。武勇有谋略，襄助古香联络、吸收四乡绿林参加革命。负责筹办粮饷，向妇女界募捐经费，自己家财也献出充当费用。还曾主办蚕业学校为宣传联络据点，掩护起义工作；刘古香任统领她负责财务，二次革命时死于兵乱。

李荫菁，幼年随父(李友梅)母居广州，毕业于广州市立优级师范学校。一九一〇年由老师张芷馨，何香凝、廖冰筠介绍在香港加入同盟会。广州三·二九之役她担任运输、通讯联络工作，因化装不慎暴露，被捕入狱三个月经老师营救出狱后负责桂林、柳州党人的联络工作。经常化装小商贩、佣工、秘密运输和筹饷募捐，往来于穗、梧、柳、桂之间。广州光复时，她担任募捐、宣传和组织妇女工作。

其他如王国瑞以马平县立女子小学校长身份利用校舍为掩护革命地下工作的机关；陈蔚华变卖田地房屋以作革命费用；宋洪之妹宋淮十三岁参加同盟会，在柳州宣布独立大会上演讲宣传革命。

在封建思想还很严重的清末社会，柳州为数不少的妇女那么广泛而深入地参加到反封建皇朝斗争的行列中，出生入死，慷慨捐躯，不让须眉，上承太平天国女战士的遗风，而为“五·四”运动妇女解放斗争的先河。她们是柳州独立斗争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军；她们的斗争实践，是柳州近代妇女解放史光辉的一页。

同盟会在柳州设置的地下活动据点很多。例如有：张铁臣、陈晓峰开设的富贵客栈（后改名华熙客栈）地址在城内榕树脚（现在中山中路大桥头）；又开设一乐也俱乐部在莲花桥（现在皇荡巷25号）；吕士宾和莫显丞开设莫权利鞋店（现在中山中路照像器材门市部一带）；王干庭开设的洪顺杂货店和杨瑞池开设的泰来杂货店（在莫权利鞋店对面），张铁臣、卢焘等人在柳城开设樟脑公司，谭志岳创办蚕业学校在谷埠街（现在谷埠街太同巷）；谭志岳病死后由马电接手办，另一个女革命党人王国瑞主办马邑女子小学堂（校址在现中山东路87号新华书店）；还有由刘古香协助地方开办的柳郡中学堂，柳郡师范（校址都在今文化大院内）；龙城求是学会（解放北路东一巷公安局幼儿园）。这些宣传联络据点之众多，可以想见同盟会在柳州活动的规模是不小的。

（五）柳州革命党人比较重视武装斗争工作。联络和发动会党武装。辛亥革命时期，同盟会和会党的关系十分密切。早在辛亥革命前的一百年，即一八一〇年（清嘉庆十五年）南宁就有天地会的反清活动记载。一九〇二年爆发的广西会党起义、遍及全省，这对辛亥革命高潮的到来，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一九一一年六月，孙中山在美国旧金山联系会党组织致公堂，通知美洲各地的同盟会员一律加入洪门，海外华人反清力量声势骤盛。清末，广西会党反清斗争十分活跃，革命党人与之携手，是形势发展之所必然。一九〇四年柳州陆亚发起义，他本人是会党头子，李德山、刘古香都是会党成员。清末南方会党的反清斗争，孙中山曾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从这些起义的经验可以看出清政府的“军队在任何战场上都不足与我们匹敌，目前爱国分子在广西的起义就

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在孙中山、黄兴直接领导下，香港同盟会机关派遣回柳州同盟会会员花了很大的力气来做会党的联系工作。一九〇七年间，刘古香策划梧州、浔州、柳州、玉林等地起义，就是以会党武装为发动对象；一九〇八年至一九〇九年刘古香、柯汉资等以四十八岸为活动中心，运动柳州、庆远一带会党武装一千多人，准备攻打柳州；一九一〇年柯汉资、钱权、刘震寰在柳州屯伦村集结上千会党武装；一九一一年柳州宣布独立前夕，布防于柳州外围三江一带以钳制桂林王芝祥上万军队使之不敢南窥，柳州得以顺利起义的，也就是会党绿林附义民军，柳州起义前后，由同盟会收编的会党绿林武装，现在已见的资料中有来宾、迁江、象州、柳城、雒容、忻城、庆远等州县的曾超廷、曾祖尧、冯有信、刘麻六（即刘士雄），“柳州二次革命前夕，发起反动兵变的头子”，刘成甫、沈鸿英（后来自封建国军桂军总司令，和陆荣廷争霸广西，在民国十四年被李宗仁、白崇禧打垮）、李天民、杨景廷、周彝卿、刘福卿、吕士宾、黄芝华、屈光祥、郑子龙、范彩园（后来投靠陆荣廷，民国十

二年在柳州、柳城上雷被白崇禧打垮）、兰八、宋五、陶二、廖辉庭等。兵力多的有几百，少的有几十人，总共大约有四、五千人。辛亥柳州独立的基本武装队伍，以及刘古香任分府总长和统领时候的军事力量，也主要是这一批人。

对清防军出色的策反工作：最先是吸收了防军帮统刘炳宇，水师统领刘月卿参与革命活动；还策动了水师管带兼巡防营管带胡岱铭、熙字营督带陈朝政；在柳州以外还联系上桂林新军中的冷御秋，南宁同盟会打入新兵营当队官的谭昌等人。由于对清防军的工作做得比较深入，柳州发动起义

时，右江镇台兼防营统领陈鸿初徒拥虚名。柳州防军已基本上为革命党人所控制，镇台、道台、知府、知县眼看自己的枪杆子已经落到党人手上，已不可能进行有效的反抗，只好束手抗降。

对地方团练武装的策动也很成功：当地地主、商界人士所掌握的团练，是一支直接关系地方治安秩序的民间武装。在刘古香为首的同盟会会员活动下，为团练的团总、地方自治会及地方知名人士杨秀芝、杨霖、杨友兰、吴芳圃、朱奇元、覃哲民、曾弼昌、杨子安、韦荣、何佩三、翟富文等人，都先后参加了同盟会的秘密活动，一旦举事，地方人士实力派倾向革命的态度明朗，团练自治会主动出面维持治安，社会秩序没有什么惊扰。有力地保证了新旧政权的交替。

军队的训练和整顿：同盟会在柳州城外高岭塘（三门江）新办的垦殖公司，原是清兵忠字营的军垦机构，主办人原是该营军官黄岱，加入同盟会后黎少臣等党人把这个公司改变为革命据点。利用军垦合法地位训练革命武装，一面务农，一面练武，这支垦兵是同盟会自己直接训练组织起来的武装。柳州独立成立国民军总机关，同盟会把军政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司令官王植槐、参谋部郭干臣、邓宝书是同盟会会员。成立总机关就着手编组地方武装和会党绿林武装，编为两个支队，支队司令刘震寰、宋洪也都是同盟会会员。一九一一年冬，刘古香就任广西右江军政分府总长，把革命武装放到很重要的地位，他亲自由广东带回一支五十人的敢死队，每个队员都佩带炸弹和手枪，这种配备在当时是最精锐的武装了。革命政权很重视编整军队，积极建立新军

和收编民军。新军由原来总机关司令王植槐任新兵营营长，驻扎柳北马厂。总机关原来收编的民军，由刘震寰统辖。刘古香因为考虑到民军未经过训练，纪律不好，为了提高军队素质，必须认真整顿。在整顿军风纪期间，查出有个督带叫冯五，想叛变拉队伍上山，经审讯后处决。即此一端，可见当时一段时间内肃整是相当认真的。军政分府还曾经派出军队到融县向负隅顽抗的清廷顽固派实行暴力夺权，这场斗争取得了胜利。这表明刚独立时候的柳州革命党人，确实是掌握了一支有效力的军事打击力量。

辛亥革命，二十世纪初曾经震荡于柳水鹅山的这一场迅雷烈风，已经过去七十年了。当年，那些为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复兴中华，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献身的志士仁人，他们的爱国主义的光荣业绩，将为人们世代永志不忘；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着我们去实现伟大祖国的繁荣富强这一崇高的历史使命。二次革命期间，柯汉资为了刺杀袁世凯的爪牙龙济光，行动之前对同志说：“我此行本大无畏精神，决必死的心志，倘有不测，希转告各同志继续奋斗，为吾党争生存，为国家除败类。”在被捕牺牲之前说：“我此行早拼一死，图报党国，牺牲是份内事，现已得偿我愿，没有什么遗憾，只可惜不能手刃龙贼，为我转告各同志，勿以我为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李德山，广州起义血战重伤被捕，临刑前痛斥监斩官说：“大丈夫为国牺牲，是份内事，我不能象你们这样，认贼作父，不知羞耻。”这是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是中华民族的骨气，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为二次革命献身的王植槐有一首诗写道：“戎马十年空误我，江山半壁少完人。何时得见擎天手，扫净妖氛荡净尘。”

诗句充满了对国事民生的忧伤和对祖国新生的渴望。这种忧伤，我们有深切的理解，这种渴望，我们也有同等的强烈。今天，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发表这一历史性时刻，是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国家这一宏伟目标的进军路上，来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的。这标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有着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有利的条件，去实现中华民族的崛起奋飞。对七十年前历史的回顾，的确是更加激发了我们历史的使命感和时代的自豪感。

刘古香事略

刘古香原名起今，广西马平县（今柳州市）西鹅乡人。一八六九年（清同治八年）出生。自幼家居城内今小南路斜坡长寿街口。清末庚子，辛丑（一九〇〇·一九〇一年）并科举人，一九〇四年就学广州广雅书院，一九〇六年入广东将弁学堂毕业。一九〇七年在香港与钱权由姚雨平介绍加入同盟会。

刘姓是地方大族，刘古香又中过举，所以跟柳州社会各阶层都有所接触。一九〇六·一九〇七年间，假期回柳协助地方创办柳郡中学、柳郡师范、马邑两等小学，后又兼职劝学所总董，担任学堂经学、国文、体操教师。把许多知识分子，地方士绅吸引到革命活动中来。他的妻子马电是农村妇女，武勇有谋，能联络四乡会党缘林，积极协助丈夫开展革命活动，在群众中有声望，对刘古香的工作帮助很大。同盟会在柳州早期的活动，刘古香是最有影响的一个，对辛亥革命柳州独立斗争做了思想上、组织上大量的准备工作。王植

槐和刘震寰都是他的学生。这两个学生和李德山、柯汉资、李子廷、杨秀芝、王干庭、杨瑞池、莫显丞和熊少丞等柳州独立斗争时期革命派骨干，都相继由刘古香和邓宝书介绍加入同盟会。刘古香早年设龙城求是学会于柳州，和有志之士探索复兴中华的道路。这时候他对推进革命思潮，扩大组织活动更是不遗余力。

一九〇八年五月受命从广州回广西运动梧州、潯州、柳州防军和会党。与刘颀、黄日初、甘乃纲、陈勉生、苏无涯等同盟会员在梧州三角咀西医院召开秘密会议，决定首先在梧州举事，潯州、柳州、玉林起而响应，刘古香即回柳州积极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与许子林、董豁然、刘福卿、刘静三、刘瑞麟等在郊区拉堡葛婆庙开秘密会议。事情被清政府侦悉，知府杨道霖准备逮捕刘古香。此时三角咀西医院秘密会议事也已被查觉，梧州知府李开侁正大肆搜捕党人，形势顿形逆转。刘古香于是偕同李德山、李子廷连夜步行到石龙，坐船走广州、逃去香港。

一九〇九年，同盟会南方支部在香港成立，成为指挥南方革命的总机关，广西党人行动更趋积极。刘古香又会同甘乃纲、张铁臣、陈晓峰、李德山、柯汉资、卢笙白、黄岱等策划起事，集结民军千多人在柳州府柳城太平圩和四十八弄一带，并联络上桂林新军冷御秋等，伺机而动。但被清右江镇总兵李国治发觉，率大队清兵围攻，民军火力不继，弹尽无援，撤退苗山。刘古香和部分同志潜回广州。张铁臣北返，陈晓峰愤而自杀。刘古香离去，柳州工作交王植槐主持。到这时候，同盟会在柳州已打下了一定的工作基础，地方团练为倾向革命的团总和地方自治会中人士所控制，给起

义时社会治安取得地方势力的支持和保证，已着手联络四乡和地区各州县的会党民军，开始积蓄柳州独立斗争的主要军事力量；开展对清防军各级军官的策反工作，有效地从内部瓦解当地清政权的武装。

一九一〇年二月十二日，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黄兴、赵声、胡汉民等秘密会议、规划再次发动新军起义、攻取广州。一九一一年初在香港成立同盟会革命军统筹部，联络东南各省志士，指示各地同盟会负责人积极准备策应广州起义。黄兴要求刘古香负责选拔广西籍志士二十名为先锋，带头攻打督署。刘古香于是和柳州党人柯汉资、钱权在广州旧仓巷芙蓉里四号暗设联络机关开展活动，指派李德山回广西邀集志士，得韦统玲等二十余人。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即旧历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刘古香率领李德山、钱权、王植槐、郭干臣等广西同志约三十人，随黄兴从小东营进攻总督衙门，尽歼其守卫。清援兵大至，起义军弹尽无援，李德山等广西志士六人壮烈牺牲。刘古香和部分同志向大南门、大东门冲出，坐小艇渡过河南，次早乘轮出香港。

武昌起义后，刘古香和姚雨平奉命返广州布置新军反正。十一月九日，与胡汉民、姚雨平指挥新军光复广东。胡汉民任都督，刘古香任都督府秘书长。民国成立，广西基本上仍然是封建军阀所控制。除柳州革命党人还拥有一定实力外，桂林、南宁、梧州等地的同盟会员及民军都受到排挤或镇压。为加强革命派在广西的力量以对抗封建军阀势力，同盟会于是派遣刘古香在一九一二年元旦前回到柳州，就任广西右江军政分府总长，军政分府撤销后，改任广西陆军第五

路统领。在柳州近两年，其时百废待兴，于军政各方面都有所建树。

一九一三年七月，二次革命爆发，刘古香响应讨袁。但这时柳州革命派处境已很困难，内有被军阀收买的柳州府府长王狮灵和督带沈鸿英的暗中破坏，外有高踞都督职位的陆荣廷及其爪牙陈炳焜的虎视眈眈。处此艰险形势下，刘古香仍然于暗中积极进行反袁活动，取得广东讨袁军的经济和武器支援，派人到南宁、湖南方面联系反袁力量。九月中旬，各省讨袁军已相继失败之后，柳州革命派中以刘震寰、周毅夫等仓促宣布起义讨袁，被亲袁军阀血腥镇压。刘古香被叛徒王狮灵、沈鸿英出卖向陆荣廷邀功，陆为此专程到柳州审理，并将案情电报袁世凯，袁复电令将刘古香就地枪决。临刑前，陆设宴款待，席间出示袁的电报，刘古香怒目无语。十月十三日，刘古香从粤东会馆昂首阔步出来，面不改色，从容就义于柳州东门鹧鸪堆，终年四十四岁。

李德山事略

李德山，桂平人。一八六八年四月二十日（清同治七年）生。十七岁投苏元春参加抗法战争，负伤，战争结束后被裁遣回家种田。一九〇二，一九〇三间参与广西会党起义，成为三点会首领之一。和广东会党述善堂首领左麟书策划袭取柳州，事泄被查缉。举家由桂平迁居罗城龙岸乡。一九〇四年陆亚发在柳州起义，进据四十八界，李德山亦往参加，起义失败后逃回龙岸。

一九〇六年联络石龙、穿山、罗城一带会党缘林欧华

周、吕六、沈鸿英等，图谋攻占柳州、庆远。柳庆镇总兵黄忠浩有所发觉，被拘禁数月。

一九〇七年闻革命党人张铁臣、刘古香、王植槐、陈晓峰等衔孙中山之命到柳州策划革命，因往寻见。经刘古香介绍加入同盟会，为联络员，联系柳州附近各县的游勇会党。

一九〇八年间，在柳州创办樟脑公司，华熙客栈为联络机关。在立鱼峰绘制攻取柳州地图，事泄，公司、客栈被查封。逃广州。

一九〇一年在广州结识新军军官数人，谋举事，德山和几个同盟会党人潜入广州府学宫群治学堂，准备接应。清吏探悉，大肆搜捕。潜回广西平南县丹竹乡都兴村设武术馆授徒，结纳志士。

一九一一年春，应刘古香之命，邀集广西志士二十余人赴广州投入“三·二九”之役。起义当天，来自广西、广东、湖南、四川等省的志士以及部分华侨陆续到达集合地点。黄兴向先锋队李德山等人说：“要活捉清两广总督张鸣岐，要他交出两广总督印信，把他软禁起来，利用他的名义发布命令，号召两广提镇反正，事情就容易成功。”广东徐维扬以本地人，街道熟悉，要求让广东志士打前敌，李德山自告奋勇说：“我们广西人惯打头阵，我与韦氏兄弟担任尖兵”华侨志士亦要求组织炸弹队，协助尖兵冲锋。湖南志士亦表示要冲锋在前。黄兴见大家勇敢争先，很高兴地说：“各队应互相掩护前进，听从号令冲锋。”下午五时三十分，黄兴发出进攻命令，李德山率领广西志士走在前头，从小东营出发，迅速冲入督署，击散卫队，击毙管带金振帮，张鸣岐越后墙逃往水师行台，不久，张鸣岐所部四百人，合水师提督

李准所部千人，包围督署。攻入督署志士不足二百人，以力量悬殊，于是撤退。李德山率广西志士由督署冲出，和徐维扬等会合，转战至小北门高阳里，遭遇清军大队防背阻击，李德山乃率队占领源盛米店，以米包筑垒作掩护，血战一昼夜，打死打伤清军多人。清军纵火焚烧米店，德山不得已率队突围，在突围中，不幸腮部中弹，被东区警队执获，处以死刑。临刑时，监斩吏问德山为什么轻生，德山厉声说：

“大丈夫为国牺牲，是分内事。我不像你们这样认贼作父，不知羞耻！”慷慨就义，时年四十三岁。与广西韦统铃，韦统淮、韦荣初、韦树焕、林盛初、韦云卿共葬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墓。

王植槐事略

王植槐一名冠三，柳州人。原清学府生员。辛亥前一再参加革命党人重大的斗争活动。一九〇七年七月六日，徐锡麟击杀清安徽巡抚恩铭，并率领巡警学堂学生在安庆起义，王植槐参加了这次斗争。

一九一一年，广州“三、二九”起义前夕，他在广州参与筹划进攻督署的活动，和柯汉资、甘乃纲等奔走穗、柳之间，部署柳州党人响应广州起义事宜。“三、二九”爆发，王植槐和其他广西党人在刘古香率领下进攻清总督署，激战兵败，潜回柳州：柳州同盟会支部成立，王植槐被推为支部长。武昌起义后，和刘震寰、柯汉资、钱权等集会于高岭塘机关，商议柳州起义的行动计划。柳州宣布独立的斗争取得胜利，王植槐就任广西右江国民军总机关司令官。新政权直接

听从广东革命政府指挥，以及处理军民政务。局面大致稳定之后，王植槐即致电广东，请派刘古香回柳州主持右江军政事宜。十二月二十八日，总机关改组、成立右江军政分府。一九一二年元旦，刘古香就任分府总长职务。柳州同盟会的工作，在一九〇八年前是刘古香主持，刘被捕离柳后，由王植槐主持。至一九一一年柳州起义胜利，数年间柳州革命党人工作卓有成效，导致辛亥革命广西独一无二的同盟会武装建立国民政权，控制局势达两年之久的柳州独立斗争光辉历史。这与王植槐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一九一二年三月，右江军政分府撤销，刘古香任陆军第五军统领，王植槐任新军第四营（模范营）营长。刘古香属下的军队基本上是收编会党绿林民军，未经认真训练，素质亟待提高。王植槐亲统新军营，是柳州党人建立革命军队的重要措施。王对新军灌输革命思想不遗余力。二次革命柳州酝酿讨袁，王植槐参与其事。亲袁分子把新军营视为最主要的军事对手。军阀陆荣廷亲信陈炳焜用一个团的兵力于柳州北郊马厂围攻。新军营被缴械，王植槐亦被捕牺牲。

植槐能诗，虽戎马倥偬，仍不少感时之作，如七律：“剑戟丛中寄此身，是非得失总前因。争知土地如棋布，孰料中原等烬薪。戎马十年空误我，江山半壁少完人。何时得见擎天手，扫净妖氛荡净尘”。

柯汉资事略

柯汉资，字奎成，柳州人。生于一八八六年（清光绪十二年）。一九〇七年秋在香港由刘古香介绍加入同盟会。一

九〇八年刘古香与甘乃纲等策划柳州起义，是年冬，柯汉资奉派潜入柳城县四十八峯联络会党民军，并与刘福卿、许仲山、陈晓峰、杨秀芝、王干廷、谢龙祥、巫春甫等分头运动柳州、庆远会党缘林首领邱光廷、郑云龙、陶二等，商定于一九〇九年农历元旦乘清吏汇集柳州万寿宫朝贺时，设伏一鼓而围歼之。柯汉资和民军首领梁云甫等在柳州城内莲花桥设立机关，暗运枪械，积极准备，右江镇总兵李国治率兵进攻四十八峯，民军撤退苗山，柳州城里大肆搜捕革命党人，梁云甫被捕杀，柯汉资和部分党人逃港。

一九一〇年夏，又潜回柳州会同张铁臣、钱权、许仲山、刘震寰、杨景廷等联络各地民军，约定秋季祭孔日突袭柳州，事为清吏所闻，把许仲山逮捕入狱，仲山坚不吐实，机关也未被破，活动仍得继续进行。仲山至光复后始获出狱。九月四、五日民军千人陆续集中附城屯伦村，为劣绅刘扬辉密报清廷，于是民军遣散，突袭计划中止，柯汉资潜赴香港。

一九一一年春，同盟会准备广州起义，柯汉资与刘古香、钱权等奉命潜入广州旧仓巷芙蓉里第四号暗设机关，并函邀广西党人李子廷、李德山来穗共举大事，旋和王植槐、甘乃纲赶回柳州高岭塘机关，与黄岱等筹划柳州党人响应事宜。复回广州时起义已失败，遂赴香港协助办理善后。夏初，奉派偕同施锡周同志去安南，并到镇南关连城一带察看形势，为将来进取之计。九月下旬到南宁与同盟会南宁支部雷鲲池、驻邕新军队长谭昌等商定柳、桂、邕同时并举的计划，十月回香港汇报工作，武昌首义捷报传来，即从香港回柳与王植槐、刘震寰、钱权等策划柳州起义，汉资分工和王植槐、刘震寰等担任率民军进驻柳州城。右江国民军总机关成立，任

执法部负责人。二次革命期间，袁世凯为了摧毁南方反袁势力，派爪牙龙济光率兵入广东驱逐陈炯明。陈氏令驻防西江的肇军李耀汉派兵到都城一带布防，并打算物色志士击杀龙济光。事商于柯汉资，汉资慨然承担此任，布置杜澄硕、郭敬章二人负责后方接应。于是向陈炯明领取手枪及炸弹两箱赴都城，行前对郭敬章说：“此行成败未可知，但不能不置生死于度外，如果龙济光入粤，袁氏必纵其残暴消灭吾党，此时若不杀龙，将来为害，实不堪问，民国亦危殆。我此行本大无畏精神，决必死之心志，倘有不测，希转告各同志继续奋斗，为吾党争生存，为国家除败类。至于我的父母妻儿，望予照顾，因与你交厚，故敢重托。”言毕，殷殷握手而别。同行有陈子英、杨愿公、刘崛、周榜。到都城后并共同秘密布置一切，更派人赴梧州侦察龙济光行动。不料李耀汉与龙氏早已暗中勾结，遂派兵一营到都城将汉资和陈子英拿解肇庆。当时邓仲元、钟秀南、郭敬章等尽力设法营救，郭敬章的母亲到肇庆探问，知不可救，潜然泪下，烈士神色泰然自若，慨然对郭母说：“我此行早拼一死图报党国，牺牲是分内事，现已得偿吾愿，没有什么遗憾，只可惜不能手刃龙贼。为我转告同志勿以我为念。”龙济光到广东，李耀汉将汉资和子英解赴广州，汉资于一九一三年九月十七日在广州壮烈牺牲，年二十七岁。

李友梅事略

李友梅，广西柳州人。喜研究军事学。一九一一年任广西第六统领部参谋长。统领陈朝政，原是清朝一个官僚，不

知革命为何物。友梅与陈表面虽相投，实际是志趣各异。辛亥革命成功后，柳州成立广西右江军政分府，刘古香奉派为分府总长，刘未到柳就职之前，由陈朝政率部暂驻柳州并代理广西右江军政分府总长。友梅即乘此时机与在柳的国民党革命人士深相结纳，积极联络，对革命有深刻的认识，并抱定为革命不惜一切的决心。迨刘氏返柳，陈朝政奉派兼任庆远府府长，陈朝政即与友梅及帮统莫荣新等率所部移驻庆远。一九一三年袁世凯阴谋叛国，暗杀国民党骨干宋教仁，罪迹暴露。国民党李烈钧、柏文蔚等四都督酝酿倒袁，并约柳州方面出师响应，友梅遂秘密准备，待机而动。一九一三年八月十二日刘震寰在柳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通电讨袁，友梅遂决定将已运动成熟可以掌握的一部分军队在宜山举事。当刘震寰倒袁通电发出后，广西都督陆荣廷及师长陈炳焜即派贲克昭率新军一团星夜经雒容直攻柳州，又令驻庆远之陈朝政率部至三岔夹攻柳州。友梅如在宜山发难，在军事和政治方面，都有很大影响和作用。不料在将举事时，为帮统莫荣新所发觉，设计将友梅诱捕，然后出发，军行至三岔，柳州已为贲克昭部占领，讨袁军事完全失败，陈朝政部在三岔停止待命。莫荣新旋将友梅密谋起义情况电报陆荣廷处理，陆复电将友梅就地枪决，友梅遂在宜山三岔慷慨殉难。

吕士宾事略

吕士宾，广西柳城县人，汉族，富革命思想，又最勇敢。辛亥前与吴挺生同时加入同盟会。士宾为掩护党人及进行革命工作顺利起见，竭力筹资与莫显丞在柳州开设皮鞋店，

作为秘密活动场所。同盟会员借此得以展开工作。辛亥革命，柳州同盟会会员，布置进攻镇台衙门，士宾不怕牺牲，奋勇前进，迫使清镇台献印投降，柳州得到宣布独立，士宾贡献甚大。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刘古香在柳州领导起义失败，袁氏爪牙陆荣廷杀戮党人，十分残酷，士宾开设的皮鞋店，已被查封。士宾与吴挺生、王芝华、易公策等先后潜赴香港，往来港穗间，继续作倒袁，倒龙活动。当时反动军阀，对革命防范相当严密，活动困难，士宾气不稍馁，仍往来穗、港间，偷运枪械，接济广州同志。又借私交关系到龙济光之秘书杨伦堂处探听消息。同志等见其过于放胆冒险，劝其小心谨慎，免蹈危险。士宾认为干革命事业应不避艰险，不以为意，卒以事机不密，为龙济光派人缉获，吴挺生亦被执，同在广州光荣殉难。士宾平生只知献身革命，耻谈名利。当辛亥革命成功后，同盟会员多获有相当政治地位。士宾仍然在柳州经营皮鞋业，安之若素。不少人一再建议要他出来做官，他说：革命不是为了做官的，婉词拒绝。当时不少人评论，革命党人象他这样思想的，实在不可多得。

吴挺生事略

吴挺生，广西柳州人，辛亥前与吕士宾同在柳州参加同盟会。一九一一年八月二十一日，柳州同盟会会员及其联系的武装进攻镇台衙门，光复柳州，挺生亲与其役。一九一三年，柳州响应讨袁失败，当时在柳州党人，被陆荣廷、沈鸿英杀害甚多，挺生遂与吕士宾、易公策、王芝华等潜赴香港，进行倒龙（济光）活动。挺生抵港后，不时潜入广州，探听

虚实，并与同志及进步人士联络，待机发难。以事机不密，与士宾同时被龙济光派人捕拿，并与士宾同时在广州壮烈牺牲。

龙禹门事略

龙禹门，广西柳城县人，壮族。辛亥革命前后，柳州的革命及武装斗争，禹门多参与筹谋。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刘古香在柳州领导起义失败，革命党人在柳州受到严重迫害，均相率逃到香港，往来港、穗间做倒龙（济光）工作。当时到香港的有吕士宾、吴挺生、王芝华、易公策等，禹门虽不是同盟会员，但亦来港积极参加革命工作。禹门与龙济光部连长韦小狗是同乡好友，就运动韦小狗作内应，后来泄漏消息，吕士宾及吴挺生为龙济光暗探缉获遇害。禹门在广州不能立足，即逃回桂林暂避。到桂林不久，即为袁氏爪牙——桂林巡防营统领秦步衢侦悉，逮捕入狱，禹门直认不讳，旋被杀害。

谭昌事略

谭昌，字有宋，原名徵猷，广西柳州人。一八七九年（清光绪五年）生。十六岁入学为生员。一九〇四年就读桂林高等师范学堂。后回柳创办柳州八县学务。一九〇六年东渡日本，就学东斌陆军学校。在日加入同盟会。一九〇九年回国。在南宁任龙霁光新兵营队长。并介绍在日本的同学但懋辛、熊克武、邓鼎封、刘月清、曾小崖、黄金波等在邕工

作。共同密谋举义，其后熊、但二人回四川活动。武昌起义，桂林独立消息传来，南宁同盟会党人讨论独立事宜。谭昌和其他新军一标各营队长王兆銮等，极力反对向清广西提督陆荣廷协商独立，而主张由民众自动宣布独立，并提出军事方面，新军愿负全责。意见得到党人的赞同。但当时一般人对陆荣廷面目认识不清，存有幻想而思借重。十一月九日（旧历九月十九日）宣布独立的当晚，陆的爪牙新军标统龙觐光对新军训话说：今天宣布独立，不过敷衍时会，要各官兵仍然遵守清朝军令，否则军法从事。谭昌率众起而反对，打算把龙抓起来。龙哭诉于陆荣廷，陆为之震惊，于十二日下令对新军缴械解散。执行时，谭昌当面斥责龙觐光，被逮捕入狱。全城搜捕革命党人。但这时候各省纷纷起义，而且柳州党人起而反对广西独立之虚伪，有逐陆之主张，贵县也发现驱陆的旗帜。陆荣廷迫于形势，在十五日无条件释放谭昌，并布告召集已遣散的新军员兵。新军归队后出师北伐，到南京编为第八师，谭昌在该师当营长，后升为团长。邓鼎封、黄金波都同时于此当营、团长。袁世凯窃国面目暴露，孙中山和黄兴在上海共谋讨袁，孙中山派朱卓文到南京活动邓鼎封，邓与谭昌秘谋，结果军内党人举谭昌为第八师代表，赴上海参加讨袁会议。回南京后立即号召，第八师响应孙中山号召，起义讨袁，但二次革命不久失败，逃上海、香港。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年间，讨龙护法诸役，谭昌在香港设共和茶庄，接纳各方亡命志士，派遣党人潜入广州、汕头、汕尾等地，策谋起事。所有经费，多由南洋华侨及谭人凤、周来芝等汇寄接济。孙中山并加委谭昌为第三路总指挥。后以广东局势变化，活动未获开展。

孙中山筹划驱逐广西军阀时，马君武曾邀谭昌晋见，孙中山特和他谈话到深夜，想让他负一部份责任入广西以为先声。谭昌此时对政局思想已趋消沉，辞而不就。一九二五年回柳州家居，曾一度出任平乐县长。一九四〇年病歿。终年六十一岁。

辛亥革命前后柳州 反封建统治斗争大事记 (1846 1913年)

一八四六年(道光二十六年)梁亚发为首的柳江波山船水手起义，参加者一万多人。

一八五五年(咸丰五年)——一八六六年(同治五年)李文成、陈开，大成国起义。柳州是大成国平靖王李文茂王府所在地。(今曙光东路红星剧院)

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

兰山萃为首的流山农民起义。

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

刘三经为首的三都石门村起义，几千人攻占拉堡。

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三年(光绪二十九年)

覃老发为首的柳城四十八峯起义。起义军五、六千人在永宁(永福)、柳城、雒容、桂林、柳州等地与清兵战斗。

三点会首领之一李德山和广东会党首领左麟书策划袭取

柳州。事泄逃亡。

一九〇四（光绪三十年）——一九〇五（光绪三十一年）

陆亚发起义。起义发展迅速，声势浩大。清廷调动湖南、湖北、安徽、云南、贵州、广东、广西七省军队会攻。

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

李德山联络石龙、穿山、罗城一带会党缘林图谋攻占柳州。事泄，被拘禁数月。

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

同盟会员柯汉资奉派潜入柳城四十八崙联络会党民军，计划在柳州万寿宫伏击清官吏。事泄，莲花桥机关被破坏，梁云甫被捕杀。

一九〇八年（光绪三十四年）

湖南、贵州、江西、广东、广西边界发现三万张传单。内写定于本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柳州起事，兵分两路从湘、粤分别北上北京。

柳州同盟会会员由刘古香主持在近郊拉堡镇葛婆庙开秘密会议。

李德山和其他同盟会会员在立鱼峰绘制攻取柳州地图。被侦悉，樟脑公司、华熙客栈机关被破坏。

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

刘古香等党人集结民军千多人在柳城四十八崙，和清兵激战数日，退走苗山。刘古香去香港，柳州同盟会支部交由王植槐负责。

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

柯汉资等联络各地民军，定秋季祭孔日突袭柳州，集结

民军千人在城外屯伦村。被发觉，活动中止。

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春，王植槐等党人在郊区高岭塘机关开会筹划响应广州起义事宜。广州三·二九之役，刘古香、李德山、王植槐等均亲身参加。李德山牺牲。

武昌起义后，王植槐、刘震寰等集会高岭塘机关，议定柳州起义行动计划。

十一月九日（农历九月十九日）同盟会领导的革命派驱逐清右江镇总兵，道台、柳州知府、马平知县等各级官员，宣布柳州独立，成立右江国民军总机关，王植槐为司令官。二十八日总机关改组，成立右江军政分府，刘古香辞去广东都督府秘书长职，回柳任分府总长。

十二月初，右江军政分府派出军队会同融县团练攻打清融县衙门，知县张礼乾溺死。成立民国政权。

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元年）

元旦，刘古香就任右江军政分府总长。

三月一日，军政分府撤销，刘古香任陆军第五路统领。王狮灵任柳州府府长。

一九一三年，（中华民国二年）

七月，孙中山、陈炯明分别从香港、广州来电促令发动响应二次革命，陈炯明并派代表来柳州约起兵讨袁，刘古香应而未发。

九月十五日，革命党人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柳州独立，成立护国讨袁军，刘震寰任司令，十六日，陈炳焜部镇压讨袁军。王植槐等大批革命志士被捕，后遭杀害。

陆荣廷持袁世凯杀刘电令到柳州。十月十三日刘古香就义。二次革命失败。

陆亚发柳州起义见闻

龙月卿

陆亚发是广西宣化县（今邕宁县）大塘圩人，曾在苏元春部下当哨长。苏元春被参纵兵殃民，打下北京刑部天牢，他的部队多被解散。陆失业后，搞帮会，成为三点会的一个首领，拥有武装群众，在广西柳、庆、思、潯等府的农村或山区活动，清政府对他无可奈何，只得改剿为抚，将陆部改编为绍字先锋中营，委陆亚发为管带（等于营长）归柳州府兼统领祖绳武统率。

1904年（光绪三十年）清政府拟将绍字先锋营调去广东，封雇大船多支，停在小南码头一带，准备装运。清政府素来不讲信义，过去曾用招抚为方法，诱杀过三点会帮多次。如梁果周王飞凤等部，都是这样被消灭的。陆部接到命令后，就有人顾虑到这一点。又因绍字先锋营出发时，补充了一批弹药，其中多数是霉坏不能用的。于是更引起疑虑，以为清政府想把他们骗到广东后，又用毒辣手段，将他们消灭。在五月初十日早有一部份已经下船，十一日早上又上了岸，上岸后，就在十字街（即今解放南路及中山中路一带）放枪。枪声断断续续，市民从梦中惊醒，以为是城隍菩萨出

游放鞭炮，各人到外一看，才知道是兵变。在当天九点钟左右，马平县衙门被攻了，三个监牢里的犯人通通放了出来。犯人出了监牢，沿街喊杀连天，掳掠小南路，又捣毁电报局（在东门城楼），占领支应局（今罗池路教工托儿所）。陆部随即收容这批犯人，以增加力量，接着打下了柳州兵备道衙门，夺得很多枪械。

清军武匡军管带管常清统率有一营兵力在卢陵会馆及学院两处（今西大路豆腐社工场及日报社）死守。利用卢陵会馆和学院的高墙，凿开枪眼，对正细柳巷射击，在这里打死了不少起义人员，也有老百姓，尸体有三四十具，巷道为之堵塞，臭气远近皆闻，小南菜市附近一带，交通为之断绝。

统领祖绳武带着武匡军一营，在所驻的镇台衙门（今中山东路28至42号（双数）包括财政局、统战部，北面包括公园小学、幼儿园。当时是兵房）布防，与陆部展开战斗两日夜。陆部有一首领温有义出面调停，结果是让祖绳武安全退出柳州城，由温有义掩护，于十二日下午三时，祖绳武遂率领武匡军一营，由东门大街（今罗池路一巷）经东门出城。行军时，部队还排成四路纵队，装备整齐，还拖着两门炮，安然渡河过窑埠后，祖自杀。

当陆亚发部在柳州城内暴动时，清军宋尚杰所率领的绥靖军千余人驻河南，闻事变，遂在河南的天马山、东台山、蟠龙山、宝塔山等高地及沿河一带布防，监视陆之行动。这些清军经常不分昼夜对城内射击。东门街，东门外（今曙光东路）沙街（今柳江路）及河边一带，凡是在这几个山头及河南岸所能瞰视的街道，都是宋军射击目标。尤其是河边危险，船民和到河边挑水的居民，常被打死。因此船民都昼伏

夜出，居民不敢到河边挑水，迫得饮塘水或井水。城内的塘共有五个：即后塘（今文化大院后面），牛黄塘（今公园派出所后侧），左营塘（在青云街），道台塘（今公安局交通大队后面），映山塘（在映山街）。井有四个：一在西门大街（今中山西路），一在弓箭街（今中山中路），一在北门福庆社（今解放北路已填），一在公园路幼儿园右侧（已填）。时值夏季，常下大雨，因此饮水不感缺乏。至于粮食，完全靠各杂货店所存的谷米，加之城内居民，终日在炮火威胁下，恐慌异常，多数食不下咽。无隔夜粮的劳动人民，可以向同街存有米粮的借吃。富有之家，在这时已心慌意乱，也不再斤斤计较，反而易于挪借。因此在粮食方面，当时也不感到缺乏。

陆亚发占领柳州后，城门紧闭，四门都有陆部防守，想逃出城的，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由城墙坠下城外，但是要身体强健的人才能做到；另外一条，是从排水沟渠里爬出去。原来柳州城内有三条排水出城的沟渠，其中有一条在香箭街（今曙光中路）为最大，渠口上早被爆竹商人梁全吉占用，掩蔽得很好，邻近街道居民，很多由这条渠里逃出。十三日。右江道方道台，和马平县左知县也由梁全吉屋内的大沟里爬出去，过到河南，住在谷埠得利饷押内。

五月十三日，邻县的三点会帮和绿林，都来柳州依附陆亚发。入城后，纪律不太好，到处收括东西，此外还有柳州知府衙门守兵百余人，道台守兵三百余人，以及商人出饷招募，用来保护商船的广胜军三百余人，和驻湖广庙的绥靖军一哨约百人，都投归了陆亚发。原来陆亚发所统率的绍字先锋中营不过千余人，其后连同投顺的和陆续发展的帮众扩大

到了五、六千人，力量更为强大。这时广西省会在桂林，防卫空虚，一旦闻柳州事变，清朝大小官吏，都惊慌失措，拖了一门大炮安在桂林西门外，来安定人心，此外别无办法，当时陆亚发若乘胜即趋桂林，这个城池也垂手可得的。陆部住在柳州城内，既未断绝交通，也不戒严，但日夜都有三五军士结队手执武器在城上看守，有时也发生虚惊，大声喊叫：“白牛过带，弟兄赶快上城顶火。”（“白牛”指清军，“带”是河的意思，“顶火”是抵抗的意思。）无论日夜，百姓的大门不准关，任他们出入。每户门前，晚间要点灯一盏照明，在街上相遇，距离数丈即大叫“契弟”（广东话兄弟的意思），互相对答，否则开枪。接近时还要讲一两句帮口中的秘语，才能顺利通过，若不通秘语，被盘答不出来时，则认为“偷风仔”（奸细之意），就会有生命危险。

陆部的打扮是：身穿香云纱衣裤，足穿兰麻织耳的草鞋，头戴矮绒剪花草帽，头上盘辫，左角剃去指头大两寸长的头发，谓之“挂招”，辫子尾是半尺多长，不编组；背枪要红绸子；手上镯头，有的是银的、有的是玉的；在街上三五成群，结队来往；黄昏传鼓，传鼓的人，身背皮鼓，边敲边喊：“将军有令，有令听令，不听将令，军法示众”来维持军队纪律；大小馆口（头目驻扎的地方）都供有五祖牌位，出发时，用人背在背上随行。

五月十四日半夜，陆部开始退出柳州，由西北两门出城，人嘈马乱，闹至十五日天明八时左右，才平静下来。接着宋尚杰率绥靖军由河南渡河，从东南门进城。当时躲藏在民间的清廷地方官吏，也出来恢复他们的职权，出了安民布告。

在这个时期，人民又起了一种新的恐怖，因为陆亚发在柳州城内时，曾经传令，要每个男人将头上左角的辮盘，剃成一个小半月形的缺口，叫做“挂招”。清军官兵进城后，照例是要搜查陆的余党，凡是“挂招”的，都认为有附陆嫌疑，就会遭到逮捕。在陆亚发占领柳州几天内，大多数人都“挂招”了的，因此各人都要将“挂招”的痕迹消灭，才敢露面，于是用剃刀互相帮剃，有找不到剃刀的，甚至用切菜刀来剃。

另外还有一件更可怕的事，就是“清乡”。因为陆亚发占领柳州，清朝官吏失守城池，要受到严厉的处分。代知府陈少春为逃避处分，在向两广总督报告这次事变的电文中，诬说是军民同变，竟建议用清乡的手段来清洗柳州城。过去清政府官吏往往借着“清乡”来屠杀人民，焚烧房屋，强奸妇女，抢掠财物牲口。因此全城老百姓听到清乡的消息，认为是屠城的代名词，个个惊恐万分，于是大家捐了一笔电报费，马上通电清廷，否认军民同变，并电在北京的广西籍御史赵炳麟，要他主持正义，经过一个月的斗争，清朝官吏被迫停止实施清乡，一场惊恐，才告平息。

护法战役中我入湘作战的经过

冯浦澄

一九一七年北洋军阀政府，非法解散国会，孙中山率领海军南下护法，在广州组织护法政府。陆荣廷为自身利害计，任命谭浩明为粤、桂联军总司令（谭入湘后，经湘军之推戴，改称湘、粤、桂联军总司令），出师援湘，这就是护法之役。援湘的起因，先是护国军起，北洋军阀为了提防湖南及两广军队的向北发展，曾令王汝贤、范国璋等的北洋军队进入湖南，实际是监视湖南军队。湖南的将领如赵恒惕、刘建藩、林修梅等不甘北洋军的监视压迫，退驻湘西南各地，北洋政府派傅良佐督湘后，监视愈严，并把与两广关系较为密切的陵零镇守使刘建藩免职。因此，刘建藩与广西取得连络之后，首先宣布独立。嗣后，湘省将领推举程潜为湘军总司令。当刘建藩宣布独立时，陆荣廷即命令谭浩明迅速率粤、桂大军向湖南前进：在广东方面，由马济率领粤军第一军和粤军第二军之一部，出湖南耒阳向攸县、醴陵、长沙进攻；在广西方面派出三个军，即韦荣昌的第一军，林俊廷的第二军，陆裕光的第三军。各军由原驻地（韦荣昌部驻桂平，林俊廷部和陆裕光部均驻桂林）分途出发，第一军经三江向湖南的新宁、宝庆，第二和第三军经全州向湖南的永州、祁阳、衡阳，与湘军会合，向长沙进攻。

在组织援湘部队之前，我原任广西陆军第一师第一旅第二团中校团附，代理团长，师长为陆裕光，旅长为賁克昭，驻防桂林。奉命参与援湘时，被派为先遣司令，隶属第三军。第三军的编成，系以第一师为基干，第一师原有的部队，有新制陆军的步兵第一团（团长吕达廷）和第二团（团长原为万定南，万因病，我奉督署令代理）和师直属部队，及一部分巡防营部队，加上广西陆军第二师的第二旅（旅长翟汉华）的第三团（团长谭儒翰）、第四团（团长陆庆荣）及各兵种的直属队组成的。在当时来说，是广西训练最好的部队，亦是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

我知道有援湘行动后，顶先作了些出发的准备，不几天就接到出发的命令，限在二十四小时内出发，不得延误。各部队长仓卒接得这个紧急命令，急得手忙脚乱。有请求借支薪饷安顿家眷的，托朋友招呼家眷的，通知官兵销假回营的，请领出发费的，请领被服装具的，请补给武器弹药的等等。除这些以外，我记得还有一样特别紧张的就是弹药箱还未做好，须要赶制，一直做到出发时为止。为了上面这些工作，各人几乎忙到没有睡眠。我团出发的时间，大概是一九一七年八、九月间，在出发之前几天，我接到广东督军陈炯明的电报，叫我到广州工作，我认为今后在大地方做事，升官发财的机会，比在广西要好得多了，为之喜出望外。正在摒挡行装，预备上级派人接代的时候，接谭浩明督军来电，大意是：现处援湘军事紧急时期，部队长编制既定，不能更动，该员仍应继续任职，赴穗事，由我电复陈督，俟援湘军事结束后再议等语。我接到这个电报，无异一盆冷水泼头，但亦无可奈何，只好改变念头，一心一意地做应付援湘的工作了。出发的限期一

到，我团依期出发。出发时，军容相当严整，我团步兵三个营，另加由第一团拨来指挥的一个营，第二营全营是一式的粤造六八步枪，其余两个营，全是一式的汉阳造七九步枪，还有各兵种的团直属队。我团是出发援湘的最先头部队，出发路线，是取道兴安、全州到达黄沙河附近的万全关候命。我团由桂林出发至万全关，五天到达。抵万全关后，即一面向湖南方面警戒，同时加强整训补充。我团到万全关后不过两三天，湖南永州的报纸，就用大标题刊登桂军到达的消息，并作较夸大的宣传，这无疑是为了壮他们的士气及使北军有所顾忌不再南进。

广西援湘的三个军，除了我这一团已出发到黄沙河附近的万全关外，第三军陆续沿着兴安，全州开拔，第一军和第二军亦继续出发，但已不象我团那样限期到达目的地那种紧张状态了。

我团在黄沙河万全关住了一个多月，才奉命向湖南推进，经永州、祁阳等县，均无敌人阻挡，很顺利的到了离衡山约二十里的台源寺。敌人就在衡山集结兵力，加强防御工事，准备和我军决战。我援湘护法的联军，亦大部分开到那里，开到那里和我联系过的部队，有桂军的一、三、四团和翟汉华旅长，粤军的丘渭南统领，湘军的师长赵恒惕、团长鲁涤平、宋鹤庚，湘军司令谢国光，及省防司令李剑魂。我们部队开入湖南后，对军风纪方面，都相当注意，我团更加认真，绝对禁止强买强要，到宿营地一定要取得住户的同意，才能进入民房。出发时，我把部队集合好后，派人到各住户询问银钱衣物用具，有无损失，房屋有无搞坏、污秽，如有上项情事，必责成该部赔偿，或修复原状，打扫清洁。

有一次在台源寺附近的菜园地老百姓追赶士兵，叫嚷着“强奸”！我即进行调查，据说是有一士兵对妇女言语轻薄，惹起群众的反感。我随即集合驻在菜园附近的一营官兵，宣布查究，发现一个士兵流露出惊恐的样子，向他追问，他承认对妇女讲了粗口。这个士兵调戏妇女，罪不至死，但我为了整饬军纪，于是一面宣布要将该兵枪毙，一面授意亲信去通知湘军，和当地居民出来说情。结果将该兵责打开除了事。

广西援湘的部队，在湖南使用的货币，光洋、东毫、广西纸币三样都有。由于使用的纸币可以兑现，又不强迫使用，老百姓感到携带方便，又不怕吃亏，因此大多数乐于使用，还有些商人宁愿用钞票，不愿用毫洋的。我们部队和老百姓关系能够融洽，与广西钞票的信用有关。同时我们部队的饷钱，也是比较高的，一般的士兵每月饷钱六元六角，其他正、付班长则增加几角或一元左右，这些军饷，亦能够准时发放。士兵有了钱，因而强要民间财物的事情，相对减少。这也是我们军风纪好和军民融洽的一个因素。

我团开到衡山附近台源寺时，北军早就在衡山一带据险固守，企图在此拦阻我军前进。我湘、粤、桂联军，陆续到达衡山之南集结，准备进击。南北军的主力战，就展开在这个战场上。当时联军在衡山的部署，是以桂军担任正面，湘军任左翼，粤军任右翼。联军在衡山的作战正面，西起月牙坳，东至耒阳市，战线共长二十五里，我团位置于阵地的最中间的山谷地带，地形险阻复杂，我们要夺取敌人的阵地，必须仰攻，任务非常艰巨，我团为了达到这个任务，在台源寺驻了十多天把部队整理好，对阵地前方的地形和当面的敌情进行侦察了解，这一切工作完成后，即对敌人进攻，开始

战斗。我团为了保持广西新军的荣誉，发挥了旺盛的士气，不怕牺牲的精神，猛冲猛打，一往直前，夺取了敌人前进阵地，逼近敌军防御的主阵地，我们利用敌人阵地死角很快就挖好攻击据点。在这两个非常接近的阵地相持的情况下，有时敌人往下反攻，有时我们向上进击，由于战斗激烈，消耗弹药数目甚大。我们第三军当时有退管炮六门，虽常常发射，显示了我军的威力，但敌军仍固守顽抗，在这种情况下，我常携带望远镜和两枝十响手枪及一瓶山西汾酒，随带几个卫队，爬上高地，观察地形、敌情，希望能发现一个有利的条件，好把敌人阵地占领。可是都没有达到目的。有一次又正欲出发侦察地形的时候，忽然敌人的反攻大队冲锋前来，我命令机关枪、手枪、步枪均快放密射，阻止敌人接近。但敌人虽死伤累累，仍不后退。冒死强欲攻入我们的战壕。在这个异常紧急的情况下，我即命令士兵跃出战壕，进行肉搏。当我的卫队排长沈桂光刺死一个敌人，见敌人身上有一包捆得很好的小包，以为一定是钞票或金银首饰，想把它抢到手，被他后面一个敌兵，举起枪刺刀正向该排长背上刺下，若迟一秒钟，这个排长便作刀头之鬼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幸我方有一士兵，手急眼快，一枪射中敌人要害，该敌兵应声而倒，沈排长才幸免于死。其余互相肉搏的士兵，枪杆、刺刀有的给打断了，有的给打掉了，有的大家抢石头来对打，或互相在地面扭作一团，互相用石头砸头，打到脑浆迸裂，血肉模糊。激烈惨状，几不能言语形容。我当时的两支手枪，一扫就打完了两梭子弹，为了紧张的指挥肉搏战斗，竟忘记了再装子弹，经某卫士叫我快上子弹，我才醒悟急上子弹射击，当时我和敌人的距离

亦不过十余步左右。经这一段的拼命搏斗，我的士兵伤亡数十名，我的卫队伤亡十多名，敌人伤亡比我更多，敌人才败退不敢再来。这一次肉搏，是我团入湘以来最激烈的战斗。至我们负责正面的第三军其它各团，与敌人也有过象这样剧烈的战斗。我有一次到别团的阵地后方，了解情况并联系工作，见到桂军第四团的士兵（团长陆庆荣）一帮帮的向后退却，我猜想必是前面战事失利或者战事猛烈才有这个现象，我深恐影响到作战的协同和整个战局，因我和陆庆荣团长是多年老同事，又是很相好的朋友，我就马上以督战的语气对他们说：“没有命令，你们不得后退，违者严重处分，我是来找你们团长的，你们赶快回前线，不许在此徘徊停留！”他们被我严厉的指挥督促，不得已重返前线，其他想退却的才不敢再向后退了。我们担任正面的桂军，虽未能击破敌人防御阵地向前推进，但敌想抢夺我们阵地，也不能得逞。至在我们左翼的湘军，及在右翼的粤军，因我正面的稳定，和每次出击勇敢的影响，他们亦能固守阵地，使北军对整个战局产生悲观失败的情绪，遂至军心动摇，不敢持久作战。联军和北军在各守阵地和每日互相不断出击的情况下，苦战了二十七天，双方均已精疲力竭，而尤以我们联军为甚。当时我团部的直属机关枪连连长陈天太（武宣人，后在孙中山处当过师长）素来体力过人，勇敢善战，在未到衡山作战前，常常夸口说打仗当食饭，有什么辛苦。可是到了后来，一样的瘦削下去。这就可以想见当时官兵的疲劳和辛苦的情况了。联军在这种十分困乏的情况之下，已丧失了胜利的信心，同时各部队缺乏子弹的恐怖心理，更笼罩了全军。当时联军方面的子弹，在出发时，每士兵配给二百发。在这二十多天的

连日战斗中，一般已消耗百分之九十，有些只仅存数颗。我团深知子弹补给不易，早就严格规定，在战场上，敌人在三百米外，绝对禁止开枪，以防止子弹的浪费。这时，每个士兵所剩的子弹，最多亦不过三十颗，一般也只有十多颗了。而且在当时的敌我力量对比，于我又不利，联军在衡山战场的全部兵力，并后勤部队算在内，总数不过五万人；而北军方面，据当时的侦察及调查，估计在十万人以上。我们在使用兵力时，自始至终，都是一批兵力，坚持到底，但在北军方面，是轮班调换对我作战的。我军无休息机会，他则可养精蓄锐乘我之疲。如旷日持久，对我是最不利的。由于我军在兵疲马乏，子弹奇缺，敌众我寡的三个压力下，我联军统帅部就密令在我们自作战起的第二十八天（具体月日已不能记忆）拂晓，全线向敌猛攻，故使敌人误认为我军战斗力尚很强，不敢轻于对我反攻，甚至不敢随便向我阵地袭击，并同时命令全线部队准备在入夜后开始迅速撤退，以避免敌人近距离尾追的威胁。不料我军在拂晓全线出击至天亮退回阵地后，敌军对我军阵地，仍猛射击至三、四小时之久，至是日上午十时左右，敌机炮声才告停息，又一会忽见敌阵地起火，火烟四漫，我派人前往侦察究竟，始知敌人全部撤退。刚才敌人的猛烈射击，为的是掩护退却。我军得到这个意外消息，无不欢喜若狂。我们的长官都说：敌人多留几个钟头，那就是敌人追我们，而不是我们追敌人了。这个胜利，真是侥幸。计我们联军自到衡山作战起至敌自动撤退止，我团的士兵伤亡不下一百余人，至其他部队加上湘军、粤军在内，经过这样长时间的剧烈战斗，伤亡数目，我估计是相当惊人的。我团士兵因伤亡过多，战斗力受到一定影响，这些缺

额，幸我有两个辎重队，可以把那些年青力壮的挑选递补，才勉强把这个损失稍为弥补过来。

北军撤退后，我军即刻进占敌人的阵地，敌人阵地地形较好，便于守御防敌反攻，另方面，我军可以得到较舒适的地方睡眠休息。在搜索敌人阵地时，得到一些子弹及一些马枪。我们在敌人撤退后，一面急报军部，我们将进行跟踪追击；一面扫清战场，经过搜索侦察确无埋伏后，于第二天早上，才开始向湘潭退却的敌人追击，我团前进时，与友军赵恒惕的鲁涤平、宋鹤庚两团齐头并进。因他们是湘省部队，地形熟悉，于行军宿营给养及了解情况，对我团能得到较多方便。我团追击前进，一路很顺利。直至湘潭附近，才遇到一部敌军对我们迎击，企图阻止及迟滞我军前进。我团及湘军即在湘潭附近的湘河口及杨家渡等处，与敌接触，经过两天的战斗，敌人不支而溃退。我团在湘河口宿营时，与湘军宋鹤庚团的叶开鑫营同住一起，他们是本地人，使得敌人由永丰开来有运军品船数艘离此不远，他就留一连人在那里和我们一起，其余各连，一律开往上游一二十里的地方，将该船只截获，把所有得的物资，通通入了他的私囊。我当时为了搞好友军的协作关系，不与计较，但在这里亦可见湘军的官兵军风纪是有问题的。在湘潭的战事结束后，由衡山向长沙出发的部队，纷纷向长沙进发。第二军总司令林俊廷，亦率部先我两三天赶去长沙。他的二夫人（原名阿真，广东的戏班花旦）还在湘潭住在很漂亮的船上，她因军队刚去长沙，未明白长沙的军事情况，故尚未前往。我的部队，在湘潭整顿三四天后，须赶到长沙候命，但军队所坐船只，异常拥挤，我想得一较宽蔽船住，以便休息。据船家说：由湘潭

到长沙，民船还要比轮船快，因为这段河笔直，顺风顺水。你要舒适快捷，二夫人今天也要到长沙去，最好是搭二夫人的船。林俊廷总司令一向对我很好，他的二太我也很熟的。他的二太听我要搭船，就请我到她船上同船出发。果然，这个漂亮的民船挂起风蓬行驶如飞。常常走在轮船的前面。及载兵的轮船到长沙时，我船也同时到达。

我军到达长沙时，北军因仓率奔逃，留下军用物资不少。最特殊的，在长沙讲武堂里，还遗下子弹二百万发，不及搬走，也不加毁坏，这说明当时北军的狼狈情况。我军得这大量子弹补充，士气为之一振。在长沙我的团部，设在小吴门外旧兵营。我到长沙时，桂军、湘军、粤军陆续到来，各军高级将领云集长沙，马济则住在长沙讲武堂。马济是我少年时的总角交（他父亲马殿勋在龙州当守备，我父亲在提督衙门当“稿公”，同住一条街），他就请我到他总司令部叙谈。他喜养狼狗，他在内见我要到他的会客室时，故意放出他的两头狼狗向我扑来，我忙拔刀挥舞，不使狼犬接近。他始走出喝开狼狗，拉我入室坐下，笑对我说：“枪林弹雨尚且不惧，还怕狗吗？”我说：“你养的狗别人不怕的，要它何用。”大家为之一笑。和他谈了一些作战经过，我向他报告了在衡山艰苦战斗情形，他为了表示对我的慰劳，留我吃饭，要和我干几杯。我在长沙大概住了十日左右，又奉令向岳州前进。第一天到靖港。部队刚到达，即有该处的商会会长及代表等前来对我说：“现隔河离商场不远的某处，有土匪二三百人，打单勒索，硬要商民缴交巨额款项作为保护费，否则商店即遭洗劫。情势十分紧迫，请我务必发兵将其剿灭，以绝后患。我以追击任务在身，不肯答应，该代表等

苦苦哀求，并云如有上级责备，他们完全负责。他们又责以大义说：我们仗义援湘，救民水火，今见危不救，民死不恤，将何以示信于天下！我在这样公义民意交迫之下，不得以从其所请。天将入黑时，由该商会准备好渡江船只，我的部队乘该匪帮未留意防备，迅速渡过靖港对河，即向该匪帮驻地包围，全部将其缴械，并将其为首二人擒获。该处商民争来慰劳，同声称庆。我即将缴获得的步枪二、三百枝，派人送往长沙第三军总司令部，并电请示对两匪首处置方法。接总部复电，就地枪决。我执行命令将该匪首枪决不久，忽接湘军总司令部电话将该匪解送长沙办理，但人已法办，只好不了了之。我在靖港逗留办了这件意外的事情后，又向新墙市前进。部队快到新墙时，探得那里尚有一部北军据险扼守，我团当即部署对敌作战。在新墙附近作战时，得到当地老百姓的热情支援，自备茶水米饭到最前线阵地去慰劳的及不受报酬代部队送饭到阵地的，相当踊跃。不料一次当老百姓给我们送饭时，受到敌人的扫射，竟有一人受伤，一人死亡，使我感到十分难过。只好酌赠恤金及医药费，并对其家属慰问，作为善后。此后，我团所到之处，坚决谢绝老百姓运送物品到火线有危险的地方，以免发生意外。联军在新墙作战使用的兵力，仅我团一个团及由第一团拨我节制指挥的一个营。前后作战三天，敌人知我后方部队陆续来到，不敢恋战，即向岳州退却。我团稍事整顿，继续向岳州前进。在向岳州行军前进中，我团仍是联军的最前头部队。因岳州是一个军事必争之地，又是湖南北部一个大城市，我以为敌人必有重兵据险死守。我团将接近岳州时，即行戒备搜索前进。这一天的行军序列，是轮到陆云高营为前卫，接近岳州

时,遇到敌人,陆营即就地散开战斗起来,我率领本队到达后,施予猛烈侧击,敌人侧翼受到严重的威胁,即退出阵地向后撤退。我军尾随追击,敌人边战边退,直战至下午傍晚,始将岳州放弃,向北退却。是日虽敌军已退,我先头部队仍未敢入城,在离城不远的村落宿营或露营,次日经侦察后,才整队入城。我部入城后的军风纪相当严肃,得到绅商群众的好评。跟着就有岳州市电灯厂的徐经理等,欢迎我移住他的电灯厂内,说是在他那里住,比较方便舒适,与各方联系亦方便。我接受了他的欢迎,就将团部移到岳州竹荫街电灯厂。我到岳州的时间,大概是旧历十二月二十日以后。我们自长沙出发,没有遇到过像在衡山那样的剧烈战事,虽在新墙、岳州发生了几天的战斗,伤亡亦不大,顺利的占领了湘北最重要的岳州城,无异全湘底定,援湘目的,全部完成。当时官兵愉快的情绪,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我部占领岳州后,桂军的第一、二、三军及高级将领,都陆续来到岳州或往返长沙岳州之间。)但部队从此逐渐发生居功骄横不守纪律的现象。第一军韦荣昌的部队,居然在岳州竹荫街抢了一间大当铺。事情发生后,群众对部队反感很大。我在岳州还听说桂军第一军总司令韦荣昌到长沙后不久,明目张胆在妓馆宿娼闹酒。有一次韦在妓馆里饮花酒,有另一军的士兵亦到该妓馆闹酒取乐,该妓馆的人即劝他不要高声吵闹,说:“韦总司令在里面呢。”有一士兵高声说:“来这些地方,就大家都是一样,谁都是英雄。”韦荣昌以其出言不逊,竟命令卫兵将这个士兵拉出妓馆门口枪决,表示他的威风。从此桂军的军誉,就给韦荣昌个人败坏了。第三军总司令陆裕光到了岳州,我去见他时,他不慰劳我作战辛劳,他竟大打官腔,说我的不是。他说:“你到靖港,谁

命令你去打匪的，你以为你得了几百杆枪是功劳吗？你犯了擅自行动的军令，你知道没有？以后如再重犯，一起处分。”他这样说，激起我一肚怒火，与他争辩，他最后无语可答，我才出来。在岳州，我住电灯公司，他们对水电及煤炭，尽量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也尽量保护该电灯厂的财产。过了旧历年不久，我因奉令向湘鄂交界的羊楼司前进。经过云溪等处，已无敌踪，顺利的到达目的地。我们将前方步哨派到湘鄂两省交界线上，表示完成了援湘的义举。在羊楼司，听说在长沙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提灯游行来庆祝援湘军事胜利。那时，我们的部队布防是到了湘、鄂边界，但军事密探则派到鄂省的蒲圻一带。随时得到不少有关武汉的消息。据说我团到达岳州及羊楼司后，武汉人心浮动，军政当局，时常发生虚惊。当时湖北督军是王占元，反王派想乘机将他撵下台去。派出代表前来请我团派员送他到长沙向谭浩明请求派兵入鄂，进攻武汉。据这些代表说：王占元自闻联军到岳州后，已心惊胆战，深恐联军进击武汉，变为俘虏。曾暗中将贵重物品移放兵轮上。他本人亦有时住在兵轮，以防万一。如联军能以一两师兵力进入鄂境，武汉可垂手而得。他还谈了一些于我军有利的話。我们认为这些代表意见不错，即刻把他们护送去长沙，听说这些代表的建议，联军统帅不敢作主，转向陆荣廷请示，陆不采纳。想是陆未明武汉当时情况，恐怕惹起与北军的长期战争，将来难于收拾；或者另有计划，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一九一八年二月间，我团进驻羊楼司时，湘军赵恒惕师各部则分驻在羊楼司后面数十里的云溪以西的湘、鄂交界各处警戒。三月初接得探报，北军吴佩孚等率领大军分途向湘北

及湘西北我军进犯，北军张敬尧等则率大军向湘东北方面进犯。我军即积极准备应战。北军了解到湘军战斗力较弱，先以优势兵力向云溪西面之湘军侧击猛攻，企图击溃湘军后插入云溪，截断羊楼的桂军归路。湘军当北军来攻时，虽竭力抵抗。但以众寡悬殊，北军的装备比湘军远为优越，不得不向后撤退。湘军在放弃阵地时，始给我通知，我团虽未开始战斗和受到损失，但从地形看，我团处于向前突出地带，如北军到云溪截断归路，我团有全部被俘的危险，我根据湘军通知来不及向上级请示，即作出紧急的处置，令全部向云溪撤退。我团及湘军后撤后，北军大队向我压迫，湘军、桂军开始呈现全线动摇状态，我联军在岳州以北固守的计划，也成了问题。我部回到云溪后，当时马济统率的粤军邱渭南等部，原已抵达湘、鄂交界湖北通城的边境，此时北军的张敬尧等部主力，也已开到通城，向该部猛攻，邱部以兵力单薄不能抵御，电请联军统帅部派兵增援，统帅部令驻在桃林的桂军第二军宾华东部前往增援，所遗桃林的防御任务，则调驻在云溪的冯浦澄团前往接防。宾华东部不等我团接防，就放弃了桃林。我团兼程赶赴桃林，不料当我团前进将到达桃林时（天气已黑，约在晚八时左右），发现敌人的警戒部队，向我射击，拒止我军前进，始知桃林已被北军占领。在黑夜中我作紧急的处理，指挥部队由行军序列变为作战对抗的态势，以前卫营占领阵地抵抗，由于天时已黑，敌人并未出击，我军以情况不明，未敢冒险进攻，略事战斗后，双方自动停火。我遂命前卫营变为前哨营，对敌作好警戒。并把本队安置在松林内露营，我亲到阵地视察，一切布置好以后，转回宿营地将与敌遭遇情况和我的处置绘图分报旅部和第三

军总司令部。次日拂晓，我正准备向敌进攻，而敌人先向我发动攻势。敌人首先用猛烈炮火向我炮击，我军即进入阵地反击。我在树林的部队，被敌的炮兵群用排炮轰击。机关枪声如潮水般响，炮声震耳欲聋。我军在树底下被打断的树木压死压伤的不少。战至十时左右，我以敌强我弱，战况于我非常不利，牺牲过大，苦战半天，得不到上级指示。我的第二营营长邓干村在我身旁建议将各营分别收容掩护撤退，我赶紧写完命令，正欲交给传达兵时，听到身旁一个音响，我看见邓干村牙根一咬，唇咀一扯，眉头一皱，面色顿然苍白，我已知他身负重伤，即急速扶他卧下，敷药后，尽快送到长沙医院留医。嗣经医生检查，内部淤血归脏，不久就逝世了。我团由于邓干村负重伤，其他官兵伤亡不少，我即指定人员负责抢救负伤官兵，并命令陆云高营先向岳州附近撤退，与林俊廷司令部取得联系，其余各营，则分成小队向云溪方面撤退，以免目标过大，伤亡更多。在撤退时我团受到北军火力的侧击斜射及猛烈的大炮轰击，伤亡累累，我的乘马，为了给一个受了重伤的同事骑去，我只得步行。将到云溪时，云溪也已紧急，我们遂不在云溪停留即转向岳州退却。我走到云溪附近于极度疲劳的情况下跌伤足部，寸步难行。幸遇见团长谭儒翰见我无马，即叫他的苏副官让一匹马给我，我才得回到岳州。事后查悉我团在桃林所遇之敌系北军第三师吴佩孚的主力部队。联军见到岳州以上各处先后弃守，军心动摇，因此岳州也准备放弃，所有部队，由岳州陆续退回长沙。北军吴佩孚及张敬尧等部进入湘境后，见联军没有什么抵抗，便尾追而来，岳州不久复为北军占领。各军退到长沙时，谭浩明总司令召开团长级以上的军事会议，我也

参加。这次集会，既无决议，亦无明确指示，我记得他说：

“你们这样惨败回去，还有什么面子见你们的老婆，你们往时都车大炮（即夸口的意思）讲打得力（即狠的意思），现在怎样呀！你们有四枝枪（他不说一枝，亦不说一连一排一班有若干枪枝，偏说四枝，我至今还弄不清楚他的意思），都可以打呀，其他的话，更是杂乱无章。长沙会议后，各部即分途退兵。我团仍按照原来进军的路线退却。指定退到永州候命。我团刚退到祁阳，忽奉电令速赴宝庆，归林俊廷指挥作战。我团就连夜又取道衡山台源寺经过红罗庙，再到宝庆的吊井岭与林俊廷部及翟汉华部会合与敌作战，经两日的战斗，敌即被我击溃，我军乘胜进占宝庆。住不到一个星期，敌人田树勋等部，又复来反攻。战了一日，我在宝庆西边的部队，受到敌人的侧击，不能支持，我团及林俊廷部、翟汉华部又放弃宝庆，向新宁方向的廖家桥退却。到廖家桥住宿时，天气很冷，我和林俊廷总司令、翟汉华旅长同在一间民房烤火取暖，用门板作床，用禾草为垫。林俊廷高声叹气说：“我地今晚针菜焖鱼，丢那吗！”（就是今晚我们要用稻草作被盖的意思）说得大家哑然失笑。我们在廖家桥过了一夜，次日又向新宁县前进。到了新宁县城我们三部分部队，当时在那里集合的共约五千人，准备在那里驻相当时间，重新休整，看时局变化情况再定行动方向。后来林俊廷在那里只住了十来天，就带起他的部队回广西去了。我团及翟汉华部则在那里住了约两个月，才奉命开回广西。

回想到我团从桂林出发援湘护法，一直到湘、鄂边界的羊楼司，又由羊楼司败回到湘、桂边界的新宁县城止，往返大半年，除将作战经过作了一些回忆外，我想在其他方面，亦

有些值得叙述的，在这里说一说：就是在初期桂军和湘军的联系，非常密切，比如我个人和湘军团以上将领，经常见面，有意见就说，非常痛快，毫无隔阂。他们有什么情报，马上就告诉我们，我们有什么消息，也马上通知他们，在作战时，非常协作。因此，在作战方面，增加了有利的条件，使胜利的保证，更有把握。其次在军用物品方面，湘、桂军彼此能互相支援，不分畛域。比如湘军得到的供应，也分一部分给桂军，甚至一些食品等小东西，各部队官长都有时得到分送，我还记得赵恒惕师长常常送给我不少的鲢鱼。我们对他们所缺乏的，也给与充分的补助，如我军得到的枪械弹药，也送给他们。这使得我们友军之间，感情很好，作战得到更密切的互助支援。其次我部在上下之间感情融洽，从桂林到岳州间旅长贾克昭对我非常信任，有时他到团部，我向他请示，他的答复是：由你决定，怎么做，不要顾虑。没有一点牵制。这对我们作战，也有很大的便利。对取得胜利，有一定的影响。这是好的方面值得叙述的。可是部队到了由长沙向岳州前进后，新的问题就出现了；在军风纪方面，各军都不及以前那样注意，除韦荣昌部在长沙闹妓馆在岳州抢当铺之外，在各地与群众发生的纠纷，逐渐增多，受到群众的厌恶。其次湘军与桂军争权利的事情，亦逐渐发展，惹起彼此的隔阂，因而在岳州的前方败退时，彼此失了联系，彼此更没有尽力的支援。使得退军时成了溃败几至不能收拾。

我团和翟汉华部在新宁大概住了两个月左右，奉命全部回桂。但我团有一部分伤兵及一部分笨重大行李，需要船只搬运，可是叫人雇船时，一条船都没有，不知到哪里去了。

我就亲自出到河边，问问情况。有一个百姓问我：“你是去年在这里雇船那位姓冯的官长吗？”（在头一年护国倒袁之役，我都在这里雇船去宝庆，按规定给船费外，到站后每船还多给五元为牙祭费，他们很高兴。）我答：“是的”。他们说：“各船家怕那些不讲理的部队封船，不给船费还罢，还要把船搞坏，所以把船开到离此十多里路外去了，请你派一个人同我到那里和他们交涉。他们知道是冯官长要船，他们马上会回来的。”我照他的办法派一个人和他同去交涉，果然一下子船都开回来了。我就把这个具体事情向我的部队介绍，他们对军风纪的维持及其重要意义得到一次很深刻的教育。我雇好了船，把伤兵和笨重的辎重行李运送以后，我团部队随即步行出发，第二天就到了梅溪口。在梅溪口住了几天，即步行开回桂林，那时大概是五六月了。

二次革命柳州起义亲历记

章 子 权

柳州二次革命时，我任刘震寰帮统部模范队教练。武昌首义，我随王芝祥副都督所率的巡防营六个大队出师北伐，到达武汉后，适南北和议告成，奉调开往南京驻扎。不久，巡防营六个大队奉令遣散，刘古香被改任为第五统领，刘震寰任帮统，所部士兵都是辛亥革命时组成的民军，没有受过训练。我由友人介绍到刘震寰帮统部模范队充任教练，模范队就是刘震寰的卫队。队长刘成甫曾在广东军队中搞过几年，受过初步军事教育，但他是个散漫不管事的人，队中一切事务他都交给我处理，他们都称我为教练主任，很信任我。二次革命柳州起义我是亲身参加的。现就记忆得起的，写在下面。

辛亥革命柳州独立后，在柳州成立右江军政分府，众推刘古香为军政分府总长，刘由广东回到柳州。刘初回时，率领一个炸弹队，都是海外华侨子弟。后来军政分府撤销，刘古香改任第五统领，正式组织军队，这些华侨子弟过不惯军队生活，资遣回去了。

第五统领的部队，主要是刘震寰力量所组织的民军。辛亥革命之前，刘震寰即从事民军运动，他所联系的民军首领有曾超廷（曾四），蓝八、陶二、宋五等，刘震寰常拿钱接

济他们，至一九一一年秋，武昌首义柳州应响独立时，刘震寰即带同曾超廷，蓝八、陶二、宋五等出来柳州编队，同盟会又招出沈鸿英，李天民（大颈四）等部。

一九一三年三月，军政分府撤销，陆荣廷派刘古香为第五统领，将军政分府所属部队改编，以刘震寰任帮统，沈鸿英和曾超廷任督带，刘月卿为水师统领，总计约一千人左右。第五统领所属十二个管带中有六个姓刘，看他的军队名册，象刘姓族谱一样。陆荣廷原是忌妬革命党人的，见到刘古香的势力日益壮大，柳州府属各县政权又为刘古香所掌握。因此，陆荣廷对刘古香很不放心，设法把刘古香调离柳州。为此，陆在百色设了个镇台名义，令调刘古香为百色总兵。刘古香虽进了将弁学堂，但他还没有脱文人的本色，想去做文官，接到这个命令后即召集他的刘氏部属开会，因大多数都不同意离开柳州，尤其马电夫人反对最为激烈，刘古香遂把这个调职的命令置之不理，陆荣廷对刘更为猜疑，派了很多密探到柳州，打听刘的行动。本城冯耀堂和蒙坤，就是陆荣廷在柳州的暗探。

一九一三年八月初，刘古香接到广东都督陈炯明的电报，相约起义讨袁，并运来很多军用票和文件等。刘古香当即召开军事会议，所有管带、哨官都参加，在会议中，内部意见不一致，有主张与广东同天起义，也有反对的，会议没有结果。不久，李烈钧在江西失败了，革命形势已经逆转，刘古香见形势不好，内部意见又不统一，因而对陈炯明约期同天起义事遂犹豫不决，但刘古香没有对部下解释，就把这件事搁起算了。那晓得他的部下不知道时局的转变，还说统领做了官，发了财，怕死不敢做事，因而对刘氏颇为不满。九月初旬刘

麻六、余少怀等在福建会馆门口派兵守卫，里面大肆赌博，大吃大喝，并秘密开会，决定约期起事。当时模范队有一部分驻在南门城楼，是小队长徐得常带的，起事那天晚上十一点钟左右，我巡查到那里，他们派有兵在路口放哨，我到时，哨兵慌忙跑上去报告，我直上城楼见他们分两边奔跑，我只疑他们聚赌，不疑其他。我回队时对刘成甫讲及这回事，成甫叫我直接去报告老帮（指刘震寰）谁知他不听，反而责备我象女人爱讲小话。我扫兴出来，成甫也不高兴，并说：“他不管，我们更不管，随去”！在当时来说，刘震寰怀什么鬼胎，我们是不得而知的。不久就听闻枪声，成甫即着人找徐得常来追问，徐才讲出要起义的事，并说如何用白布为暗号等。我们才剪去几张白门帘做暗号。现在想起来当时刘震寰对这件事，他是知道的，不然为什么我向他报告，他毫不考虑不加理采呢？尤其是枪声大作时他仍处之泰然，对刘麻六、徐得常等，原意是迫使刘古香起义讨袁，但是事前没有计划好，没有对部下讲清楚，起事那天（九月十一日）天还未亮，他首先在统领衙门门口放枪，枪一响，刘麻六的部队蜂踊而起，刘震寰的卫队，刘成甫部也有参加的，自己的卫队起事，那里还有人抵抗，一进衙门，乱枪四射，这些人只想发洋财，盲目乱搞，由打统领衙门，进而打柳州府衙门，县衙门，枪军械库，放犯人，乱抢东西，搞得满城风雨，当这班士兵在统领衙门打起来的时候，秘书长梁润森、统领的妻子马电和媳妇杨澧均被乱枪击毙，刘古香深夜闻变，睹此情况，无力制止，只得向衙后逃跑，那一班人也没有杀害统领之意，只顾抢东西，寻找统领不见也就算了。天亮后，各人见事情闹大了，不可收拾，遂相约到刘震寰署统部，请帮统出

来维持，领导起义讨袁，众口一词，愿听帮统指挥，并要挟的说：“帮统如不出来维持，我们就放火烧房子、杀人、抢东西、拉队上山”。当时有很多散兵将在统领部抢得的军用票拿到市上强迫商民使用，全城秩序异常混乱。刘震寰见到事情已闹到这地步，不得不出来维持，即派模范队巡查街道，取缔散兵的胡作非为，布告安民，不久，市面秩序恢复正常。

刘古香统领遭此变乱，夜间逃出。次早刘震寰派人到处去寻找他，结果发现他躲在衙门后的字纸炉内，带他回到帮统部时，已是十点钟了。他穿件云纱唐装，拖一双鞋子，足部受伤，满面愁容，一言不发，走进刘震寰的卧室休息，（是个套房，前房办公，后房是队室）接着大家纷纷议论起义讨袁等问题，刘古香全不参加意见，刘震寰招呼他在帮统部闲住着。

第二天，刘震寰召集地方各界人士在中学开大会，本城陶警安、王干廷、郭干臣、莫显丞、吕士宾、吴挺生等均参加，会议宣布袁世凯的罪状，众皆同意讨袁，并选举刘震寰为讨袁总司令，即日宣布成立，通电讨袁，连夜写委任状，委派各级官佐，编组讨袁军。事变后，刘麻六即力争要当管带，最后照委他为管带，并拨了一批新兵给他。我写委任状和给各部队向南宁进攻的命令，一直写到天亮。沈鸿英部驻在东门街一带，沈的秘书长邓瑞征，很机警，沈鸿英多用其计谋。事变后，沈鸿英和邓瑞征商量，即往见刘震寰，表面对刘尊敬服从，但他对刘震寰此次举动不和他商量，颇为不满。沈见刘震寰后，又进见刘古香，一见面即下跪，并流泪来说道：“统领这次遭遇不幸受惊，我做部下的没有尽到保

护的责任，真是罪过”。这番花言巧语，和伪善表相，使刘古香认为沈鸿英对自己的忠实，遂相对长吁短叹起来，第二天（九月十二日）沈又向刘震寰说：“统领住在这里妨碍你们办公，诸多不便，我那边有地方，由我接统领到我那边去住吧！”刘震寰不知道沈鸿英的用意，允其所请，刘古香就搬到沈部居住。地点就是东门街陈炳焜的公馆，（今罗池路十六巷口）沈鸿英一面向刘震寰献议，从速派遣新编的部队出发，想减少刘震寰城内的兵力，另一方面暗中联络兰八，陶二等管带，邀请他们秘密开会，他对各管带说：“这次柳州的兵变，已经弄大了，北京大总统已经知道了，有电给陆都督派大兵来柳州讨伐，日内可到，这事是他刘家闹出来的，将要连累我们，我们不想法子应付，将来大兵到来‘我们有翅难飞，我们不是白白受害么？！’”这几个管带听了这番话，大家惊慌起来，任由沈鸿英摆布，沈鸿英知道曾超廷督带对刘震寰很忠实，在没有取得各管带同意以前，不敢与曾督带相商，今得大家同意后，才邀请曾超廷来参加，曾来时，见几个管带都在座，知道已中计，正要回头走，沈鸿英极力挽留他，对曾说：“这事不用你操心，我已和兰、陶几位管带商量好了，由我主动去干，免你得罪老帮，（指刘震寰）”曾知道事已如此，不可挽救，就说：“让我做个顺水人情，写封信给刘震寰，叫他即刻离城”，由于刘震寰平日和他相处很好，就兰八、陶二等，也不同意沈鸿英伤害刘震寰，曾超廷的信送去不到半个钟头，枪声就响起来了，四处同时发动，驱逐刘部，但只闻枪声，不见伤人。刘震寰接到曾信后知事已不可为，仓促地带着几个随从由西门逃出柳州城，过河逃回基隆村（刘的家乡）这是九月十五日的事。

出发进攻南宁的部队，多属新编的队伍，初出城不下五六百人，由四方塘回来的时候，天气又黑，肚子又饿，沿途逃跑的很多，到达基隆村，天已大亮查点人数，不见了一半有多，刘震寰看到这样无纪律的部队，枪械弹药不足，怎能作战？自己的主力军曾超廷等部都叛变了，大势已去，不能挽回，但表面上还和这班军官敷衍，和他们商议反攻柳州计划，到夜间，刘即改装潜逃。刘震寰走后，群龙无首，各自星散。我躲回我的家乡去，听说沈鸿英当日（九月十七日）即派兵到基隆村搜索摧残一番。

沈鸿英于刘震寰离开柳州后，即分电陆荣廷和陈炳焜报告，大意谓：刘古香，刘震寰率众在柳州叛变，叛军已被肃清，生擒刘古香，听候处理等语，陆荣廷接电后，由南宁出发，于十月九日到达柳州，驻在粤东会馆，沈鸿英即将刘古香当战俘送交陆荣廷处理。陆荣廷将案情电袁世凯，袁复电将刘古香就地枪决，临刑前，陆荣廷设宴款待刘古香，席间，陆将袁电复令给刘古香看，刘无语，十月十四日（旧历九月十五日）刘古香就义于柳州东门外鹧鸪堆。（今柳州市干部子女保育院临河地方）

曾超廷、兰八、陶二、宋五等为沈鸿英所出卖，沈邀功献媚得到陆、陈的赏识，升了帮统，后又把曾等所部官兵改编归沈属下，沈继又升统领。曾超廷等不服，几乎哗变。陆荣廷召见他们，明白沈这次阴谋，并知曾超廷所部与沈鸿英部是不能合在一起的，陆荣廷离开柳州回南宁时，将曾超廷全部带回南宁，后来开赴龙州驻防。

我所知道的陈炳焜

冯浦澄

一、陈炳焜的出身

陈炳焜马平县（今柳江县）杨和村人。杨和村在柳州市东南约二十里。家贫，父陈养和，知书，游手好闲，不事生产，成年累月傍食亲戚朋友家。母向氏，为了维持一家生活，在一都刘姓地主家帮工多年。陈炳焜随母同去，与地主之子刘用廷在私塾读书四、五年。陈炳焜很聪明，在他的母亲认真督促勉励下，学业有了一定的基础。陈逐渐长大，自知家贫无力不能送其继续读书，闻边关谋事较易，遂于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前往龙州。当时柳州龙云安先生在广西提督衙门当巡捕，陈由龙云安介绍至提督衙门当戈什哈（满语即卫士）。陈粗通文字，聪明能干，大为提督苏元春所赏识。陈在提督衙门所见所闻，多为军政事务和官场的来往应酬，日积月累懂得了很多待人接物，公务处理的道理和军政的知识。并陆续认识了一些军政大员和一些中下级军官。如马盛治、华小览、陆荣廷、林绍斐、谭浩明、林俊廷、曾少魁等人。这时候陆荣廷初招安出来，常借陈炳焜的关系以了解提督衙门的情况，而陈亦常将苏元春和提督衙门中官员们对陆

荣廷的期望和对建字营的谈论透露给陆，因此陆、陈便奠定了莫逆之交的基础。陈在提督衙门当戈什哈约两三年，一次，为了一件小事，适遇苏元春的情绪不好，被大加斥责，陈不能忍，愤而离去。当其向苏元春叩头告辞时，就说：“我不会侍候，至使大人生气我想回家学好了再来侍候大人”。说完不等苏吩咐，起身便走。苏元春亦任他离去，不加追究。陈离提督衙门后不几天就去找统领马盛治求差事，马素知陈有才干，对陈离开提督衙门的情况也很清楚。当即派他充任镇南营哨长（相当于排长）。他的哨官（相当于连长）宋云甫，是个庸懦无能的人。陈当哨长后，哨中事无大小，宋都要与陈商量办理。陈名义上是哨长，实际上代办了哨官的职务，因此，上级对陈便有进一步的认识。同时，陈又能努力整理部队，部队的纪律训练都比前大有进步，陈当哨长不过三几年，由于成绩优异，上级器重，竟得越级升充管带（相当于营长）。

二、陈炳焜与陆荣廷之间

陈炳焜以一戈什哈出身在五、六年之间当上管带，若不是他的才干过人和自己的努力是不容易做得到的。他当镇南营管带之后，自己有了部队，掌握了实力，就更能够发挥他的聪明才力，展其雄心大志了。他和当时的权贵结交就更广泛了。跟他结拜为兄弟的有陆荣廷、林绍斐等，相期互相帮助援引。这与以后跟着陆荣廷的发展而飞黄腾达，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

一九〇二（光绪二十八年）陆荣廷由建字营分统官游击升任建字营统领时，会镇南营统领马盛治于隆安马鞍山与游

勇王和顺，黄五肥等作战阵亡。一九〇三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奏革苏元春后，升任陆荣廷为右江镇总兵，并将熙字营、镇南营，建字营合编为荣字十营，以陆荣廷为荣字十营统领，以陈炳焜为荣字营营务处（即从前的帮统职权），十营的管带：前营为曾少魁，左营为黄培桂、右营为林俊廷、后营为申葆藩，中营谭浩明，付前营黄自新，付左营姓金，付右营姓江，陆荣廷自带付后营（后为邹世记）、陈炳焜自带付中营。陈为了加强部队的训练，调我为付中营中哨哨长，兼全营教习，嘱咐我认真训练，务要做到各种成绩皆为各营之冠，成为模范，给各营观摩学习。陈喜交游，与各营管带如曾少魁，谭浩明、林俊廷、黄培桂等来往亲密，各人对他也很爱戴，因而更增加他和陆荣廷之间的亲密关系。由于陈为人精明强悍，部队中的重大事件，陆荣廷都要和他商量，因而他实际上成为陆的决策人，他对陆也很尊敬。以后他当督军，省长时，迁到重大的问题，仍然向陆请示才进行办理，

三、镇南关起义时的陈炳焜

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五月中旬，陆亚发起义于柳州，陆荣廷奉命率部进剿，留付中营及付左右两营交陈炳焜指挥，防守镇南关、龙州、水口一带边区重地。其余部队皆随陆出发。次年，各属游勇会党先后平定，陆调任左江镇总兵，回驻龙州。陈驻守关前隘的时间相当长，当时边防安靖，陈得借此流览边关风景，且和边民认亲戚交朋友，军民相处，颇为融洽。但对革命党人在边关一带秘密活动，则懵然不察。至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下旬，孙中山先生率革

命党人起义于镇南关（今睦南关），占领右辅山炮台，守炮台的正是陈炳焜的付中营前哨，哨长是姚子安和李矮子（忘其名）。当时李哨长及驻守炮台的官兵时常到那模和文渊等地玩耍或买东西，因而革命党人得乘机和他们接近，李哨长和各班长兵丁多被运动，和革命党人有了联络。起事的那天晚上，适姚子安哨长回关前隘住，不在炮台，革命党人一到，他们就反正，所以革命军不费一枪一弹便占领了天险的右辅山炮台。清廷得报，大为震惊，即严电龙济光和陆荣廷一星期收复炮台，如不能如期收复即加严办，并要将陈炳焜就地正法。陈奉电后便积极作夺回炮台的准备，做了一百多架楼梯和不少的火药包。计划于作战时，持火药包的领先，次为马刀队，持步枪的上刺刀在最后，打算不射击而进行肉搏，在这以前我还未作过战，这次参加作战，我领一部分士兵作强力侦察，一冲就冲到炮台下面。炮台上革命部队看见我们，也不开枪，他们大声喊道：“同胞们，我们都是汉人，我们是同胞，我们革命为的是灭满清，救同胞，请你们不要打自己人，大家一起来革命！”我看见炮台里面站的人很多，他们没有穿军服，戴的是铜盆帽（通帽），咕帽等形形色色，如一群乌合之众。我就说：“你们讲的我很同意，我的部队还未到齐，我去把部队带来和你们一起革命，请你们不要开枪。”他们答道：“很好，欢迎你们！”我们就回头，刚走下山脚正迁陈炳焜骑马到来。我将所见炮台内的情况向他报告后，本拟将计就计带队伍去假投革命。后来我们的部队越来越多，向炮台作围攻的阵势，炮台上就打起枪炮来了。左辅山比右辅山低得很多，在右辅山的瞰制射击下，官兵伤亡不少。黄福廷帮带（原负责守镇南关，他驻在南

关，左右辅山各炮台归他直接指挥，右辅山炮台失守，他有重大责任），督队攻打炮台负重伤。攻打数日不下，陆荣廷又带三营兵加入战斗，逐渐把炮台包围起来，相持五天之久，到第六天晚上九、十点钟的时候，当付中营的部队冲上右辅山炮台时，革命军已向安南撤退去了。右辅山炮台遂告收复，这个时候，龙济光的先头部队已到达关前隘。龙济光由龙州带了几营兵来（龙州离关前隘一百三十里，本来一两天就可以到达的），但据说济军之来，主要是监视荣军，以防荣军投向革命。

右辅山炮台的失守，姚子安应当要负责。他擅离职守回关前隘住，本应办罪，但是，因为姚子安与郭春山是把兄弟，郭和陈炳焜有亲戚关系，同时，炮台既已收复，大家都喜出望外，正在庆功行赏，对这件事也就不提了，因而姚子安仍然当他的前哨哨长。

四、陈炳焜与陆军讲武堂

一九〇八年（光绪三十四年）春，清政府在龙州开办广西全省陆军讲武堂及学兵营，以蔡锷为讲武堂总办兼学兵营长，陈炳焜进讲武堂学习兼学兵营的督队官，这个讲武堂的前身是郑孝胥创办的边防将弁学堂。一九〇五年太平思顺兵备道庄蕴宽继郑孝胥任边防督办后，把边防将弁学堂改为边防陆军教导团，任钮永建为监督，聘日本原小太郎为总教习。庄蕴宽调省任广西兵备处总办后，龙济光继庄蕴宽为太平思顺道兼边防督办，改陆军教导团为陆军讲武堂。讲武堂学生分步、炮、工、辎四个队。蔡总办聘来日本大尉十三员

任教习，除原小太郎任总教习外，步兵教习有中村，炮兵教习有吉田，工兵教习有太田，辎重兵教习有田村，体操教习有大多河，还有西藤医师。这时，我原在荣军付中营当哨长，驻兵关前隘。我请假到龙州。有一天走过新街，与陈炳焜和蔡锷相迂，我向他们敬礼后，陈问我几时出来，我说：“因家事刚出来。”事后一星期，陈找我去，在和他吃饭时，他对我说：“蔡总办那天见你后问起你的情况，我告诉他你是陆军将弁学堂的毕业生，他现在要你去学兵营当前队的司务长。”我说：“司务长是要负教练责任的，我的学力不够，恐怕有负栽培。”陈说：“你不要客气，蔡总办很欢迎你去，委状已写好。吃饭后我就和你一起过去。”饭后，我跟陈到学兵营接任前队司务长。学兵营共四个队：前队学兵完全是荣军的士兵，队官是岳森，湖南邵阳人，与蔡锷同乡。左队学兵完全是济军的士兵，队官先是况伯英，桂林人，后是马孝笃，右队学兵完全是由湖南考取来的湖南人，队官姓刘。后队学兵营在广西考取的，队官是湖南人，姓彭。讲武堂和学兵营在龙州成立，驻南标营，训练几个月后，即够驻南宁葛麻岭；学兵营训练几个月后就结束了。学兵营毕业时，陆荣廷统领由龙州电陈炳焜，命所有荣军学兵全部由我率领回龙州。起程的前一天，陈嘱咐我带领荣军全体学兵向龙军门（龙济光这时是广西提督军门）辞行。是日我率领学兵到提督衙门院内整队候见。我们向龙行礼后，龙即对学兵们讲话，他说：“你们现在毕业了，虽然是当兵卒，但都是国家的鳞毛，只要你们有志气，忠于国家，将来为将为帅不可限量呀。”讲完话后，他命军需发给学兵每人大洋一元，我得大洋五元。

学兵营毕业后，讲武堂仍继续办理，至一九一〇年才结束。这时，清政府在桂林成立混成协，驻桂林李家村；在南宁、龙州、各成立一标。这就是广西新军之始，讲武堂的学生都分配到新军中工作。

陈炳焜在讲武堂毕业后，率领一部分毕业生回龙州组织第二标新军，为第二标标统。（第一标标统是龙觀光，驻南宁。）第二标有三个营：第一营管带陈玉墀，第二营管带黄榜标，第三营管带曾少魁。我在第二营前队当排长。第二营前队队官卢炎山，左队队官陆裕光，右队队官赵惠卿（下冻土司）。

五、陈炳焜在桂林

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龙济光调任广东提督，以陆荣廷为广西提督。辛亥革命广西宣布独立，推举广西巡抚沈秉坤为广西都督。布政使王芝祥，提督陆荣廷为付都督。广西独立后即出兵北上，混成协由赵恒惕率领从桂林出发援鄂。南宁方面由第一标的第一营和第二标的第一营为基干编成六个队由陈玉墀率领经广州乘轮赴南京。混成协离桂后，巡防营在桂林一度兵变，沈都督借故离桂，不久王芝祥也率领巡防营六个大队援鄂去了。陆荣廷继任广西都督，派陈炳焜率领第二标的第二、第三两营向桂林出发。军到柳州休息三天，于一九一二年旧历元旦到达桂林。本拟在桂林休息三天后继续向湖南前进的，但初二即接陆电命第二标停止前进，驻守桂林。

陆宣布就都督职后，派陈炳焜为军政司司长，军政司驻

原抚台衙门。陆通电就职后即决定将省会迁移南宁。当时桂林方面人士极力反对迁省，邀集民众千余人到军政司请愿，其势汹汹。这天正是我当卫兵司令，我恐怕发生事情，命卫兵作假射击姿态，阻止民众，一面报告陈司长。陈即出到门口，见卫兵持枪作射击式，警告我说：“不得对民众开枪！”我答：“知道”。于是我向民众说：“请大家推举代表站出前列，我即请陈司长出来，你们有什么意见，请由代表向陈司长说。”于是队伍中有人被推举出来，有的自动站出来，排在前列。陈出来时，请愿的代表说：“省会历来设在桂林，现在听说要迁到南宁，我们代表人民来向政府请愿。”陈说：“桂林偏在一隅，不如南宁适中，如果省会设在桂林，龙州、靖西、百色距省过远，治理不便，边防也不便兼顾。”代表们又说：“为了便于边防，可以采军事机关驻邕，民政机关驻桂林的办法嘛。”陈说“你们说的还是清政府时期的原办法，现在民国时代不同了，军事民政均统属于都督，不便分开，如果将来军民分治，军民首长驻在一地也便于商量大事，还是以驻在一地为宜。省会迁移南宁，这是陆都督的意见，我认为是适当的。不过各位的意见，我一定代为转达陆都督，希望大家静候处理。今天你们集合这样多的人来请愿，未免劳师动众，而且有近于要挟，这是不妥当的，今后不要这样做，有事情只派代表来商量就可了以。你们大家的意见我已明白了，转报陆都督后，一定有个明白的答复，请大家回去吧！”这件事过去不久，陆由南宁到桂林，主要是为了迁省的事。

一九一二(民国元年)二月，陆到桂林后将军政府改称都督府，设军政、民政、教育、财政、实业五司。陈炯明仍任军政司

司长。陆在桂林时，桂林人士如梁昌浩、魏继昌等仍然请求不要迁省，但陆坚持迁省的意见，他说：“迁省到南宁，并不是为我个人，而是为了全省人民，为了便于治理全省，为了兼顾国防。”省议会也同意迁省。后来并呈请大总统府核准。陆遂转回南宁。省议会和铨叙、法制两局先行移设南宁。由于桂林方面人士仍有意见，五司暂设桂林。至十一月民政司首先迁移南宁，嗣后各司相继移至南宁。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四月北京政府特任陆荣廷为广西督军，兼广西民政长，都督府裁撤，军政司亦取消。督军陆荣廷改编全省军队，将全省新军和巡防营之一部合并改编为两师：任陈炳焜为第一师师长，驻桂林，谭浩明为第二师师长，驻龙州。另编陆军混成旅黄榜标为旅长。至于巡防部队官长则委派：韦荣昌为第一军统领，林俊廷为第二军统领，龙觐光为第三军统领，宋安枢为第四军统领，刘古香为第五军统领，陈朝政为第六军统领，秦步衢为桂防军统领，黄培桂为边防军统领。这些部队各级编制和负责人记不完全了，我在第一师第二团当中校团附，兹仅就第一师下属编制及负责人记述如下：

第一师辖两个团，第一团团团长贲克昭，中校团附高学琴（后为梁少坤），少校团附谢岳中，第一营营长陆云高，第二营营长农乃圣，第二团团团长陈坤培，中校团附冯浦澄，少校团附甘又新，第一营营长万定南，第二营营长邓干村。后来两个团扩编为两个旅，第一团团团长贲克昭升任第一旅旅旅长，吕达廷为第一团团团长，万定南为第二团团团长，第二旅长为翟汉华，第三团团团长谭儒翰，第四团团团长陆庆荣。

是年秋，二次革命事发，革命党人蒋翊武由湖北经湖南

入广西，至黄沙河为秦步衡部下所执。秦捕蒋后，陈电报桂林师部外并电京向袁世凯报功。将蒋由全解至桂林师部。蒋翊武是武昌起义的领袖人物之一，陈对他颇尊重，把他安顿在师部（原巡抚衙门）的花厅客房，起居饮食都和客人的待迁一样，但受严密的监视，不得离开花厅范围。当时驻师部的部队是第一团，团长贲克昭，中校团附梁少坤，梁常与蒋谈话酬应。我当时是第二团的团附，与贲克昭、梁少坤等经常来往，亦有时见到蒋先生，但没有和他谈过话，蒋受优待的情况是亲眼看到的。陈对蒋虽然很优待，但因秦步衡已有电报给袁世凯，就没有办法援救他了。不数日，师部接袁就地枪决蒋翊武的电令，陈命梁少坤团附备丰盛酒席请蒋，以表敬意，同时将电给蒋看。蒋看电后立即写了几封信，才叫他的随从前来交代后事。他的随从闻此消息，哭不成声，异常悲痛。蒋说：“你不要这样，你这样我的心就更乱了。”遂把写好信件交给他。交待清楚后，梁少坤等便请蒋入席，在多方相劝之下，蒋乃就座。席间蒋陈述袁世凯为害民国的罪恶，痛论讨袁之必要，义正词严，激昂愤慨。饮宴其间，行刑的各种准备都办好了，并为蒋备轿一乘。酒毕，监斩人即请蒋上轿，贲光昭送他上轿。蒋向贲鞠躬告别，即上轿，至丽泽门外刑场下轿后，蒋端坐红毡上，从容就义。

九月中旬，驻柳州第五统军领刘古香，帮统刘震环与粤督陈炯明联络，响应二次革命。宣布独立，通电讨伐袁世凯。柳州府长王狮灵由柳州星夜潜逃至桂林，向陈报告柳州起事情况，陈电报陆荣廷，陆回电飭陈就近处理。陈知刘古香所部没有多大的战斗力量，即命贲克昭（这时尚未扩编为旅）率兵三营，我带第二团的部队随同出发，明知没有激烈

的战斗，所以部队皆轻装出发，星夜兼程前进。到达雒容过河后，始戒备行进，但并未遭迂抵抗。至北郊马厂，解决了王冠三的新兵营。当时，我们并没有把王营长当俘虏看待。王家住在西门，他还请我们到他家去吃饭。当我军进入柳州城时，刘震环部早已走了，沈鸿英督带所部于刘震环走后，即扣留刘古香，并分电陆，陈听候处置。事平后，我第一师部队仍转回桂林驻防。

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七月，于桂林，龙州分设镇守使，以第一师师长陈炳焜兼任桂林镇守使，第二师师长谭浩明兼任龙州镇守使。各镇区的巡防营统领均归管辖。陈炳焜这时在桂林，所有军民两政均由他主持。陆对陈深为倚重，陈在当时可谓踌躇满志，红极一时。陈虽是武人，读书不多，但常与梁昌浩、秦步衢等交游吟咏。一次在普陀山七星岩宴客，饮至半酣，陈曾题诗一首：“廿一年马背全征梦，幸有山缘此壮游；借得灵岩方寸石，挥毫题破半天秋。”颇为时人所乐道。

六、讨袁护国时的陈炳焜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企图实行帝制，对国民党势力尽力排除摧毁，同时培植其势力于各省。为了拉拢陆荣廷，特援陆荣廷为耀武上将军，但对陆不甚相信，于一九一五（民国四年）九月派其亲信王祖同为广西巡按使，嗣又令王会办广西军务，以便监视。十一月袁氏操纵之各省区代表全体“赞成”君主立宪，陆荣廷一面联合王祖同电北廷劝进，表示拥护服从，一面称病回武鸣原籍休养，调陈炳焜来督军府暂代行

拆。陆在武鸣召集高级将领谭浩明、莫荣新、沈鸿英、马济、韦荣昌等开秘密会议，进行倒袁活动。这时陈在南宁，一方面应付各方派来广西活动的倒袁人物，筹谋策划；一方面又要与王祖同周旋，表示拥袁。当时王祖同的侦探，无孔不入，稍一不慎，泄露机密，不但大事难成，旧桂系的政权亦将难保。十二月二十五日云南起义，贵州响应宣布独立。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袁世凯改本年为洪宪元年，广西仍假意遵从通令改元。三月袁世凯特派陆荣廷为贵州宣抚使，陆一切准备完竣后，扬言率兵赴贵州宣抚，一到柳州，即令陈炳焜在南宁发出通电，拥护共和，宣布广西独立。广西宣布独立后，袁世凯知大势已去，遂通电取消帝制。当陈炳焜把王祖同送走后，陆即转回南宁，派莫荣新、谭浩明等部先后进军广东，亲率第一师和武卫军等部队进军湖南，以陈炳焜留守后方。此次广西军队进兵湖南，长驱直入，湘督汤芗铭不战而逃，湖南境内已无敌踪，陆到达衡阳时，袁世凯已死。大总统由黎元洪继任，黎任陆荣廷为广东督军。但这时附逆之龙济光仍盘踞广州，陆为增强广东方面兵力由湘率师回省。北廷令组省长公署，任命陈炳焜为省长，九月龙济光被驱逐逃往海南岛，陆乃循广东各界之请，东下就任广东督军。同月黎元洪特命陈炳焜为广西督军。

七、广东督军陈炳焜

一九一七（民国六年）春，陆荣廷入京晋謁黎元洪后，受任两广巡阅使，陈炳焜调继广东督军，谭浩明为广西督军。陈赴广东督军任时，只带了一个独立营去，营长农乃

圣。并命陈坤培为师长，到广东后组织军队。陈去时嘱咐我把第二团整顿好，候命调赴广东。嗣以护法军兴，谭浩明受任粤，桂联军总司令，命我代理第二团团团长兼先遣司令，率部先行入湘，未果去粤。陈于是年五月就任广东督军，至十二月止，为期不过几个月，由于粤人不满，回省会办广西军务。其失败的原因，大约有以下数点：

（一）用人不当，错用了秦一民为参谋长，秦到广州后，以重金买得陆氏女献给陈为五姨太。五姨太貌美，陈耽于酒色，住在越秀山公馆，少问军政事务。秦一民遂得大权独揽，包烟包赌，大饱私囊，不但为粤人所恨，同伙亦甚为不满。这就大大影响到陈的声誉。

（二）陈坤培对陈没有帮助。陈坤培是陈带去广东的高级将领。他的为人本来不坏，只是太健忘，因而不能团结部下。有一次他的旅长潘其露去见他，他正在吃饭，命潘在客室等候，他吃完饭后，忘记会客，和他的夏姨太到大新公司买东西去了，潘等得不耐烦，就问“师长吃饭为什么吃得这样久，”当差的说：“师长陪姨太后门出街去了。”潘听了非常气愤。陈坤培又常自命为儒将，爱玩古董字画，不大理事。他对自己的本分工作都没有做得好，对秦一民那么坏，也没有尽着规劝的责任，对陈的事业可说是毫无帮助。

（三）广东警卫军的争夺。广东警卫军是广东省长朱庆澜收编龙济光的余部为基干扩编的，共有四十营之多，朱企图掌握武力与督军抗衡。陈以全省军队应归督军统一指挥，乃朱庆澜多方推诿，并联络粤人胡汉民、陈炯明等以为己助，更形成了粤、桂的对立。陈为谋对付，也拉拢接近桂系的粤人肇、罗、阳镇守使李耀汉，与李结为儿女亲家（以其三

姨太所生之女嫁李之养子为妻)。后来朱庆澜被迫交出了警卫军二十营，但仍留二十营改编为省长亲军，任命陈炯明为亲军司令。是年八月，陈炯明电北京政府荐李耀汉为广东省长，朱庆澜被迫去职。但朱离粤去港时，将省长印交省议会，省议会选举胡汉民为广东省长，陈不予承认。北京政府任命李耀汉为广东省长公文到省后，陈即派人到省议会夺回省长印交李耀汉。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陈炯明颇为粤人和国民党人所不满。粤人以陈作事操切，不得人心，向陆荣廷提出调陈他去。陆为了团结护法，表示退让，乃调陈回桂，派莫荣新（原籍粤人）代理广东督军。

八、广西护军使陈炯明

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冬，旧桂系在广东失败退回广西。一九二一年元月，陆荣廷与北京政府联络，北京政府派陆荣廷为广西边防军务督办，五月又任命陈炯明为广西护军使，在梧州成立护军使署，为对粤战事的指挥机构。陈派我为护军使署军附。这时对粤的战事部署如下：梧州为中路，以陈炯明、韦荣昌等部为主；怀集、贺县为左路，以沈鸿英部为主；玉林为右路，以林虎部为主；谭浩明部为总预备队，驻玉林一带。六月两广战事爆发，护军使所指挥的刘震环部事先与粤军魏邦平有交换条件〔注〕，当粤军到达梧州前线时，刘部在火山阵地树起自旗，韦荣昌随之也倒戈投粤，粤兵舰乃由西江直上进占梧州，陈被迫向抚河撤退，中路军未战而溃。左路军沈鸿英，以梧州失守，亦退至平乐，通电请陆荣廷下野。右路军司令林虎，以两广不宜再战，早

已借故离职。代理司令黄业兴，率广东籍的部队向钦廉而去；属广西籍的部队归李宗仁掌握退入六万大山。谭浩明在玉林亦不战而退，形成整个崩溃。陆荣廷在邕，见大势已去，通电下野，和谭浩明，李静诚，等经龙州出走越南。

陈炳焜退出至平乐时，沈鸿英求见，报告军饷困难，目的是向陈要挟，陈只得解囊，被索去十万元。陈在平乐发出辞职通电后，即率随员、卫队和眷属（战前已送部分眷属去香港）回原籍柳州。到达鹿寨时，迁桂林镇守使李祥禄由桂林弃职带兵二营驻在该地。据李向陈报告说：“沈鸿英部沈国治、黄日高两部驻在雒容阻拦，要缴李的枪，陈写信派我带去雒容见沈，黄、好在二人都是早已相识朋友，他们接受陈函后，摆起麻将要我打牌，不和我谈正经事。我料想他们对这件事不敢决定，须电沈鸿英请示，才作可否，因此我也不追问。后得沈复电嘱咐拥陈，他们才对我说：“我们一致拥护陈督，欢迎他老人家过境。”于是陈乃和李祥禄率部过雒容赴柳州。陈在柳州约耽搁了十天，略事处理私事后，即经桂林出湖南去天津暂住。经桂林时由钟镇藩管带护送出湖南。李祥禄率领的两个营：一为陈春廷，一为韦冠英，均在柳州交给严兆丰，严后来当刘震环的师长。

九、香港寓公与天津小住

一九二一年七月，旧桂系失败后，陈炳焜离柳州赴天津时，只带石姨太去。陈离柳州后，陈眷属避居一都榭山向太夫人的外家。陈的卫队营营长白燕鹏带卫队营一营人驻柳州。白对我说：“陈督走了，没有交代，我这一营人没有饷怎么

办？请你对陈夫人说，如果军饷没有办法，我就难负治安责任了。”我见情况不对，就劝陈夫人给了他五千元，是我亲手送交白的岳父收的。陈夫人知道长住柳州不是办法，就约同我的家属一起搭船到香港居住了。我们到香港时，陈也由天津来到香港。那时，广西地方很乱，自治军蜂起。林俊廷称自治军总司令，白燕鹏也在柳州称司令，归林俊廷指挥。白并自兼马平县知事，用李荫菁为顾问。陈夫人去香港后，柳州归陈的三嫂管家，白又强开陈仓库，将粮食全部拿去。

一九二三年七月张其铨任广西省长时，南宁“经新”（苏杭兼找换店，老板林盛芝）和“溢生”（银业找换店，老板李鼻涕四）两商号和另一商号因操纵金融事受罚，他们要求秦选斋（柳州大地主在陈面前能说话）请陈炳焜致函林俊廷转向张说情。秦选斋到香港，于陈酒后对陈说：“南宁经新等三个商号因操纵金融事受张省长处罚，请陈督写信给林总司令向张省长说情，商人跟后就送礼过来。”陈当即囑阳梦纲秘书写信给林。我对阳说：“陈督离广西时不是说过，以后不过问广西的事吗？你应当提醒他。”阳不敢说，以后商人送礼来，大家大吃大喝了一顿。

一九二四年，沈鸿英部回至柳州，白燕鹏畏惧沈势，想把部队拖往南宁依林俊廷，沈侦知其意，对白说：“你如往南宁，枪枝就不必带去了”后白部卒被沈缴枪。白被缴枪后，跑到香港，请我带他去见陈，被陈大骂：“你还好意思来见我，你在家乡，我的家你不保护还罢了，还要索款、开仓要粮，成什么话！”白低头不敢出声。陈转入后房，白即抱头鼠窜而去，不敢再见陈了。

陈炳焜的香港住宅在妙高台。他初到港时，常去德辅道

嵩楼俱乐部玩。这个俱乐部都是梁镛华开的，梁是广东三水人，财神梁士诒的兄弟，在这个俱乐部来往的人，都是大财主大官僚，都是拥有千百万的富翁。陈做的官虽然不小，但是钱却不多，三几十万家底有多少玩法。他在香港玩不多久就感到困难了。刘震环在广州当桂军总司令时，见他困难，还送钱给他用，一天早晨刘震环到陈公馆见陈，陈留他吃饭。刘走后，陈坤培的用人阿生气愤地说：“刘震环这个反骨仔（指在梧州叛变），今天来见陈督，我已预备好蔡刀，陈督如开个口，我就关门砍死他！”关于刘震环在梧州倒戈的事，在家闲谈中也常提起。刘震环的姉娘刘吉廷的老婆在香港，也常和陈的家属来往，她常替刘震环解释，“八三（刘震环小名待陈督和待他自己的老子一样，在梧州的事不过是为了大局怕地方糜烂才对不起陈督。”刘震环老婆（姓王即桂剧和园演员玲珑玉）也说：“震环捞得钱，还不是给他老人家（指陈）用。”

陈的香港寓公生活不过三几年，存款用得差不多了，难在香港继续住下去，就把香港的房子卖了，携眷到天津依靠朋友找个小房子住，陈到天津后，一次去看赛马，见一普通的马，跑得不算太快，竞赛得第一，颇不以为然，准备派人回柳州乡下把他的好马载运到天津，亲自去参加比赛，显一显自己的威风，后经友人劝阻始罢。陈在天津虽然俭省，但住不到三年，还是维持不下去，乃于一九二六年返回柳州，度其晚年生活。

十、陈炳焜的家庭

陈炳焜的家庭，关于他的父母的情况已在“陈炳焜的出身”一节里叙述了一些。陈在龙州镇南营当哨长后，他的父母就到了龙州，但不久他的母亲就去世了。陈的长大成人完全靠他的母亲，因此，陈对他的母亲孝思甚笃，每当佳节或在酒后，常常思念为之下涕。后来陈在柳州建陈养和公暨向太夫人祠堂来纪念她。他的父亲陈养和经常在各亲友家住宿。当时，他老人家在龙的朋友有彭松泉（清把总陈炳焜的前辈）、陈坤培的父亲和我的先父冯章甫。当时——一八九二年左右物价便宜，四个小钱可买一碗粉，一个豆付角。有两角钱到和仙馆可买杂烩面一大碗（有鱼丸、尤鱼、卤蛋、叉烧）和双料酒一斤，用两角钱三个人就可吃得酒醉饭饱，陈养和、彭松泉和陈坤培的父亲三个人，差不多天天都要到和仙馆占一个桌子，花上两角钱。我的先父有时也和他们一起去喝酒，但他因职务在身（先父是苏元春的稿房），不能像他们三人一样天天坐一半天。先父到和仙馆时，和仙馆的老板常请求代劝他们三位老者不要天天来，是怕他们占桌子妨碍做生意。陈养和老先生后来死在龙州，初葬在龙州近郊，陈炳焜因信风水听人说：摩沙村有南蛇饮水地（离关前隘十里）遂迁葬摩沙村。

陈炳焜的原配夫人郭氏，是郭春山的三妹，郭春山以后当过林俊廷的付司令。我在陈处当哨长时，陈介绍郭春山大妹之女和我结婚，并亲为主持婚礼。因而我和陈有亲戚关系。陈坤培的母亲和郭春山的母亲友善，陈炳焜对陈坤培很爱

护，屡次越级提拔他。陈夫人无所出，她于陈炳焜去世后，去肇庆李耀汉家依其女（三姨太黎氏所生）死于肇庆，后迁葬回柳州。二姨太姓王，是养女收房的。三姨太是龙州一苏杭铺黎经理之女，是陈的姨太中最贤慧的一个，抗战时在柳州去世，四姨太是在桂林要的，姓秦，她的女嫁柳州商家夏溢兴，现仍在柳州依其女过活。五姨太是他当广东督军时在广州要的，抗战期间回广州去了。六姨太是养女收房，名金妹，生一子，名陈思仁。还有一个石姨太，是京剧的演员，陈当广西省长时某晚看京剧后，南宁警察局长陈芳甫（陈炳焜堂弟、把她带给陈省长，陈收留了她，她的母亲也跟来。由于未经正当手续，为陈夫人所不满，故未公开到陈府，因而没有编第号，只称石姨太。石姨太生有一女，她在上海死后，陈将其女交五姨太抚养。五姨太去广州时没有带女去，将解放时，六姨太携一子一女跟她的未婚女婿到台湾去了。

陈炳焜为人，一向趾高气扬，中落后，抑郁成疾。他原不抽鸦片烟，但在天津将回柳州时开始抽烟。一九二七（民国十六年）他病在象县石龙，我去石龙接他回柳州时，已瘦不成人形，回柳州后，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他去世前我天天陪着他，他在病床上抽烟才对我说：“这两支烟枪是李耀汉送的，非常名贵，抽烟时可以发出宫商角徵羽的种种声音。”陈在政治舞台上耀武扬威，曾红极一时，但在旧桂系失败下台后，他即立意不问政治，临终时谈论不及国家大事，而只忘不了他那两支烟枪，从这里可见其为人。陈原籍广东县崇山头，死后，陈府去电原籍请郭少彩来办丧事。但是他身后大大小小的事我都在场。由于陈一向迷信风水，他死后，其家人对于选墓地和看日子都很慎重，当由秦选斋介

绍（黄惠如陈当省长时黄曾任厅长）在陈的出生地阳和村选定墓地后，曾将墓地绘图及预定下葬日期寄去广州请问堪舆名家陈揆时，陈揆时批：“日干可用，惜犯火星。”八个字。我交于黄惠如，他说：“浦哥，如果是起房子，我还选用这个日子吗！你看，火还烧坟墓不成。”我照对陈夫人说：她也觉得有理，就采用了这个日子。墓碑高六尺余，碑文是请朱子填写的。下葬之日，墓碑虽然竖起了，但还有翁仲，石马等未完工，石匠搭起的荫棚，上面盖着松枝，不料下葬时燃放爆竹，火星飞上棚顶，送葬的人离去。后竟燃烧起来，把墓碑烧得断成两节。术士之言不爽，这不过是事有偶合而已。这种愚蠢迷信的事，现在说，只供人们的一笑。

〔注〕刘震环与魏帮平交换的条件，是后来回到香港得知的。其条件是要魏帮平逮捕二次革命，在柳州叛变的府长王狮灵归案。后闻王狮灵在广州被孙中山先生枪毙了。

“四·一二”事变 柳州清党捕杀点滴

刘克初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柳州实行清党，伍廷飏奉命为柳州清党委员会主任委员，黄勉、李荫蓍为委员，其余记不清，斯时伍为第七军第五旅长，驻防柳庆，为柳庆最高军政长官。我在旅司令部当中校参谋。我记得黄勉是柳州军警督察处长兼清党委员，清党时围捕共产党人及进步青年多由他执行，曾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围捕。共产党员熊秀明清党时被捕，关在马平县监狱，关了一个时期才执行枪杀。推出刑场时，他沿途高呼共产党万岁口号，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从容就义不怕死的坚贞品格。被捕监禁时间较长的有谭权、陈秉森、卢种德、覃禧章、关育梧、欧家栅、舒文等人。是时马平县长是李乘时。关育梧、欧家栅、舒文三人是女姓，被关年馀才得释放。

一九三二年秋廖磊等二次率部 进犯东兰、凤山和谋害 韦拔群同志的经过

沈 治

一九三二年秋，国民党桂系第七军军长廖磊等第二次率部进犯东兰、凤山革命根据地，和杀害韦拔群将军的经过情形，是我调到第七军军部当参谋时，和跟随廖磊进犯到东兰的参谋处长邓殷藩、政训处长藏进巧交谈中听他们说的。记述如下：

东兰、凤山革命根据地是农民领袖韦拔群于大革命时期在党的领导下亲手建立起来的。尽管国民党桂系的头目们多次派遣反动武装进行疯狂扫荡，但革命的武装力量仍蓬勃发展和壮大。桂系的头目们为了巩固其反动统治，始终认为这支革命力量是他们心腹之患，务必扑灭之。

一九三二年秋初，桂系头目白崇禧在南宁召开军政会议，又一次策划进犯东兰、凤山革命根据地。会议前，白电召七军十九师五十五团营长陈树森（东兰人）到南宁询问东兰、凤山方面的情况。会议时，决定仍由七军军长廖磊任总指挥，由总部、省府选派一些人员随军出发，协助处理一切事

务。会议后，廖磊就率领省府顾问罗嵩如、总部参谋马镇东、政训处科长马炯、军法处长徐家豫，并带总部警卫团第二营第七连长韦作之的一连人作护卫，和崔赞光带一台无线电台，以及第七军参谋处长邓殷藩、政训处长藏进巧、副官罗敏等一同向东兰进发。同时，廖还带二十一师七十二团团团长罗活（廖的外甥）到东兰帮他策划进攻部署，进攻的部队。计有十九师五十六团团团长秦霖部、五十七团长陈恩元部，廿一师七十一团团团长颜仁毅和某团杨一峰营。这些反动武装开进东兰凤山苏区时，把红军根据地的西山纵横三、四百里的洞场重重包围。步步为营，逐山搜索，并勒令各洞场居民搬到指定地点集中起来，不准分散居住，各洞场房屋，全部焚毁。这时红军化整为零，廖磊部队包围搜索两个多月，杳无红军踪迹廖磊坐在东兰一筹等展，苦闷已极。

是年冬初，白崇禧率领总参谋长叶琪，亲自出马，由百色经凤山，东兰各地视察、指挥，并悬赏东毫一万元缉拿韦拔群①东毫八千元缉拿陈洪涛。

在这交通阻绝、粮食缺乏、四面包围的艰苦岁月里，韦拔群始终未离开根据地，经常出入洞场，领导群众抗击国民党廖磊进攻部队，几次被廖磊围攻部队侦知他的行踪、派队搜索，均未查获。是年十月十八日半夜，细雨蒙蒙。韦拔群个人到了中和乡附近山洞，侦查白军进攻情况，到了韦昂住的响茶洞，韦昂利欲熏心，起意谋杀韦拔群，假意殷勤，要韦拔群到山洞里面休息，自己在洞口放哨。据说他第一次进洞想谋害韦拔群时，韦拔群尚未睡熟，听见韦昂进来，问他有什么事，韦昂支吾其辞，说是找东西，转身仍出洞口。不久，韦拔群睡着了，韦昂昧起良心，再进山洞，摸到韦拔

群在枕头下驳壳手枪，按开木壳，取出手枪，这时韦拔群已醒，厉声呵止。韦昂对着韦拔群连打三枪，韦拔群当即牺牲。第二天一早，韦昂就到中和乡向住在该处的廖磊部队报告，廖磊部队就派人到山洞察看，并将韦拔群的尸体抬到中和乡，经圩上老百姓证实确是韦拔群，驻军就向廖磊报告，廖磊命令他们砍下韦拔群的头，在中和东兰县城“示众”②廖磊就将韦昂全家接到东兰县城发给他几百块钱，叫他们缝了一套新衣服。廖磊对韦昂说：“你杀了韦拔群，他们（共产党）是不能容你的，你不能在东兰住了，你跟我到柳州去。一万块钱的花红，到了柳州再发给你”。后来韦昂就跟廖磊到了柳州。廖磊把这一万块钱存入广西银行，只准取息，不准动本。后又在这笔钱内拿了一千多元，在柳州培新路帮韦昂买了一座房子，房契由军部保管，只能按月收些租金，不准变卖，这座房屋出租和营业的事，由军部政治指导员黄汉钟专门负责帮他办理（黄是东兰人，后调总部政训处少校科员，解放前当伪天峨县长）。这一万元的“花红”，就象水里的月亮纸上画的饼了，韦昂可望而不可及，韦昂就住在柳州，靠这些银行利息和十多元的房租，维持全家，过着半饥半饱无聊无奈的生活③。

韦拔群被杀害后，廖磊就在东兰组织了“东风善后委员会”，廖磊为主任委员，罗活为副主任委员，罗蔼如、徐家豫，藏进巧和东兰凤山两伪县长为委员。他们积极搜索红军武器，一面派兵搜山，一面出布告引诱红军“自新”，听说搜山部队见人就杀就抓。到廖磊回柳州后，留驻东兰办理善后的杨一峰营，把搜山捕获的群众，先后两次共二三十人解到柳州，被廖磊枪杀了，并委徐家豫为伪东兰县长。

罗活随廖磊到东兰后，七十二团仍驻柳州整训，团长职务由我代理。一九三二年冬，我因家庭婚姻事受降级处分，调充七军部少校参谋，罗活由东兰赶回团，提升少校团副朱乃瑞为中校团副、代理团长。罗活回团约半个多月，待我把团务交待清楚后，罗活就带我到东兰。

我到河池时，韦拔群的头已运到河池县城“示众”。我到东兰后，“东凤善后委员会”已经成立，所有公牍都由藏进巧办理。军部则无事可做。适廖磊离开东兰回柳时，廖见我带有手携照相机，就叫我到西山各洞场红军根据地拍照，并说军部准备出“七军剿共专刊”，拍照山洞形势。将来在专刊上付印。我就率手枪队一班，到各洞场拍照，经过三十多个洞场，这时进攻红军的廖磊部队，已纷纷向外撤出，所有洞场房屋，全部烧光，断墙塌壁，瓦砾遍地，荒烟野蔓，荆棘纵横，不但杳无人烟、鸡犬全无遗种，间或见有一二个石臼，和破烂的锅灶，厥状极惨。盖当地主人，不死则已被迫迁徙矣！洞场小道崎岖难行，路旁野草，粘人衣裤，加以连日小雨爬山更感吃力，我把各洞场形势摄影后回到东兰，廖磊早已回柳州。“善委会”主任由罗活暂代。不久罗活请假去广州，“善委会”工作交由驻东兰办理善后的杨一峰代理。我回到东兰县城时，罗活已离开东兰了。

我到东兰后，接军部电报，调我为五十六团中校团副，我就离开了东兰到桂林到职。我所拍摄的各洞场照片，因途中连日遇雨，衣履尽湿，底片受潮走光，到柳州后冲洗，多数已发霉，少数虽能洗出，但亦模糊不清，后七军专刊未编出，模糊的照片也没有用到。

（一九六四年六月）

编者注：

①韦拔群同志当时任红军廿一师师长，陈洪涛同志任廿一师政委。根据当时任廿一师副师长黄松坚同志的回忆，敌人悬赏缉拿韦拔群同志是二万元、陈洪涛同志是一万元。

②据黄松坚同志说：韦昂是韦拔群同志同族远房侄儿，韦昂原在廿一师特务连当战士，当时特务连在巴马，有些战士军纪作风不好，因此进行了一个星期的整顿，清洗了八个人，韦昂是其中之一，韦昂被清洗回东兰当农民，心怀不满。韦昂的小老婆与当地的坏人有关系，敌人就通过这些坏人收买拉拢这个小婆，要韦昂杀害韦拔群同志，韦昂贪财答应了。韦昂杀害韦拔群同志的那天情况是这样的：韦拔群同志在一个山洞里休息睡觉，他的一个警卫员（瑶族青年）在洞口放哨，韦昂抢了警卫员的枪进去把韦拔群同志打死了，并砍下他的头，压警卫员拿着头，一起到县城送交国民党反动派。反动派把韦拔群同志的头在东兰示众后，还送到南宁、柳州、梧州示众。韦拔群同志被害后一个多月，陈洪涛同志因叛徒出卖被捕一九三三年一月在百色牺牲。

③据黄松坚同志说：韦昂杀害韦拔群同志后，带了小婆到柳州住。国民党反动派答应给他一万四千元，实际只给了他几百元住房也比较小，韦昂不满，发牢骚，后来还和国民党反动派吵，国民党反动派见韦昂已没有什么可利用了，就杀了他。他的小婆就在柳州一带流荡，后来改名换姓，在融安和一个瑶族的农民结了婚。解放后，东兰革命干部和群众打听到她的下落后，报告人民政府，在一九六一年前后已在柳州将她枪毙了。

鍾祖培反白崇禧活动概略

杨 义

鍾祖培号植轩，广西恭城县人，家庭是地主成分。他于一九一一年在广西陆军小学毕业后，随即转入广西陆军速成学校。毕业后，先在广西部队充任下级官。倒袁时，编入广东护国第二军林虎部下。一九一一年，陆、谭失败，林虎去职，李宋仁继起，树自治军旗号，鍾任李部统领。改编定桂军后，鍾升为纵队司令，定桂讨贼联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时，鍾升任第八旅旅长。一九二六年大革命时，随第七军参加北伐。第七军改旅编师时，升为该军副军长兼师长。一九二九年李明瑞率第七军反李、白投靠蒋介石，鍾被迫去职，流寓上海，郁郁不得志。一九三〇年李宗仁、黄绍雄、白崇禧均已返回广西，重掌政权。由于李宗仁徒拥虚名，白则大权独揽，鍾素不见重于白，又因李明瑞之变，大被责难，所以徘徊不回广西，白亦始终置鍾于不闻不问。因此，鍾由怨而恨，从而酝酿和进行反白拥李活动。

一九三〇年冬，鍾由上海携眷回香港后，会同张一气（曾任广西省长）、陈绍虞（袁世凯时期的国会议员）向杨义备述当时广西局势，他们说：两年以来，广西陷于破碎瓦解、孤立无援、穷蹙万分，前途暗淡无光。追溯所以致此，白崇禧实为罪魁，现在白在广西，利用李宗仁作傀儡，大权独揽，既阴谋刺死吕焕炎，逼走黄绍雄，又软禁蒙志、黄

权，极力造成清一色的白氏系统。更可恨的是横征暴敛，日益压榨民众，用来充实武装，图逞个人野心。似此迁延日久，广西必将日趋黑暗，益陷痛苦，广西民众何辜，遭此不幸，我们虽身在省外，心极关切。经过互相研究，一致认为广西问题，主要是白崇禧操纵权柄，倒行逆施，以至如此，为今之计，必须拥李倒白。因李宗仁素有威信，很得人心，可以领导广西。拥李倒白，白将陷于孤立，结果不能不倒。为了策划和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已在上海、南京通过有关方面，取得“中央”的同意和指示，并经委任锺为陆军新编第八军军长，同时发给一笔临时活动费。现就香港先行徵求部分必要的同志，通过商讨筹划及具体进行方案，再为分工进行。我们因你（指杨义）也是在广西被迫逃出的，而且对于吕焕炎的血案，抱着满怀义愤，当然对于白崇禧的危害有着深刻认识，对于广西局势亦必积极关怀。我们热切希望你参加拥李倒白活动，共同努力，坚决彻底地消灭白崇禧，挽救广西局势，解除民众痛苦”同时锺祖培等还就一般局势作概括的分析。他们说：“（蒋介石）白之间的利害关系，极为尖锐，随时可能决裂。蒋是优势，白是劣势，故倒白还必须拥蒋，运用蒋、李双方压力，倒白才能更有把握。至于李、白间的关系，虽然不浅，可是在两年来的失败和当前白在广西的专横跋扈，李实深受其苦。而且，白对李之尊重，始终是虚有其表而已，李、白关系是可分化的。再则以锺祖培为首的反白活动，李必不至有所反感。至于蒋、李的关系虽然不好，总不如蒋、白的恶化，即以此次活动而论，蒋完全同意拥李倒白。当然李一方面必须妥为筹划，进行工作，以竟全功。所有上述问题，希望详加考虑，多提宝贵意见”。

杨义原因在南宁遭到所部事变，出走香港，转抵梧州，再与吕焕炎晤面，正待筹商一切，不料吕因暂赴广州，竟不幸为白所暗算丧身，杨义抱着愤上加愤的情绪，强为忍耐，困居澳门，正在考虑应如何活动，以泄此愤。当时听到锺等拥李倒白活动一番谈话，可说大体上与自己意志相同，因即表示愿意参加这个活动。

接着锺、张、杨、陈等（当时参加的还有孙仁林、刘锡兹）用秘密方式进行多次商讨筹划，决定工作方案，大意是以拥李倒白为主要目标，以改善广西当时局势为总要求，先联络广西部分或大部分武装力量，然后相机或者造成机会，发动拥李倒白。联络对象以现在广西的比较接近李不接近白的师、团长为主要方面。总之整个活动，以联络武装部队为主要策略，联络工作有进展后，再逐步作适应的决策。暂以香港为通讯处，并推定杨义、陈绍虞、刘锡兹三人为联络工作组，首批进入广西展开联络工作，并约定秘密通信办法等。联络对象暂以第七军师长覃连芳为目标，再为相机发展。当时覃连芳部队分驻桂林地区，于是杨、陈、刘三人分别由香港、广州前往梧州，于会齐后，一律化装为商人，取道八步、平乐到达桂林后，秘密住在杨琮（号灿华，当时任第四集团军总部高级参谋，以前长期在镇祖培部充营连长、付官处长等职）家内，通过密谈拥李倒白活动后，杨琮表示积极参加，当时杨义、陈绍虞是不能在广西公开出面，但刘锡兹是不会引人注意的。因此即由刘锡兹、杨琮二人担任掩护，展开活动，首先察看一般近况及部队情形，作为参考资料；其次，为了明了覃连芳与白崇禧的最近情况，先由杨琮、刘锡兹向唐纪（当时覃的付官长或者团长已记不清楚），覃采如（覃

连芳的二胞兄，当时是桂林警察局长）作初步联系，然后再由杨义、陈绍虞同他们晤谈，经过较详细的研究，覃、唐俱同意白崇禧在过去和将来都是危害广西的根源，李宗仁始终是为他操纵利用而已的看法。同时着重研究覃连芳对于白的印象情感等等，结果认为拥李倒白问题，可以提出和覃连芳讨论。唐、覃两人并负责先对覃连芳做好初步联络工作。果然事隔两日之晚间，唐即陪同覃连芳来到杨义、陈绍虞住处，作秘密访问。谈话之间，覃很直率，他说：“我与白本无深仇大恨，但是他的阴险忌刻虚伪奸滑，对人极不忠诚，所谓‘翻手为云，复手为雨’，太令人可怕，何况他对李老总（指李宗仁），仅仅供作个泥菩萨看待，事无大小，不是‘先斩后奏’，就是‘斩而不奏’，包办一切。现在正在逐步发展成为清一色的天下。像我这一类型的人，只不过是他的过渡工具罢了。为我个人和广西前途计，白某确是障碍，你们的来意我明白了。不过问题不简单，必须从长计议”。上面这一段话，虽是初次所谈，可是覃对拥李倒白，已作了明确表示。此后约在半月至二十日的时期内。覃连芳又亲访杨、陈商谈约三次。在这同时，覃采如、唐纪亦多次谈到，并提过某些有关问题，作过分析讨论。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是有代表覃连芳的作用。综合历次商谈的内容，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当前广西局势，由于一败再败，损失不堪，士气消沉，仅余残喘，困顿万分，再有外力压迫（尤其是内外交迫），必将全部瓦解。为此确有改善必要。而在目前情况下，当然要以南京为重心，可是在广西一般人都多多少少对南京是有戒心的，必须从方式方法上多加研究，以期妥善。第二、当前白的威信已相当降低，但有李老总做幌子，所谓

“神灵庙祝肥”，使他仍有依靠；应考虑如何向李老总做些工作。第三、如上述，覃对白的不良印象，估计在中上级军官中，有半数以上是相同的；不过是有口难言而已，可是联络工作从外面派人秘密活动，易生枝节，可以暂为停止。覃本人愿负起责任，相机工作。第四、关于鍾已得到南京方面所委名义，未到时机，必须严守秘密，但对南京的关系，必须保持。第五、总的看来要起变化由内部发动，极多困难，最好由外部压迫，作用必然大而且快，应密切注意、促使实现。除以上情形而外，其他有关问题，如覃连芳现在或将来有无个人要求，或者某些必需条件等。另外，杨义、陈绍虞还同陈恩元（桂林军区民团指挥官）、杨芝山（总司令部高级参谋）密谈数次，交换了一些意见。

杨、陈、刘在桂林对覃连芳进行的联络工作，至此暂可告一段落。除将详细情况转报香港通讯处并请指复外，同时因在桂林停留已近一个月之久，为避免不必要的枝节，决定暂为离开桂林，移到全县等候香港回信。当即先由陈恩元预为安排妥当。计在全县住留十多日即接到鍾祖培由恭城来信说：他已回到家里，专待杨等三人前去商讨一切。因此，杨等立刻到鍾处会唔。除了详谈经过情形之外，并即结合省内外情况，着重研究讨论前面所记在桂林综合的五个问题。其中第一和第五，大体上是一个问题，这是里应外合的方法，当然是功效大而且快，必须向南京强调提出。第二个问题也是一个关键所在，鍾祖培所以急于回来，就是为了这个问题，待考虑成熟办理。第三项，可说是这次的重大收获，最少也是播下了良好种子。当然，我们还要审慎的再播种子。第四项也是必要而且应当加强的。因为鍾祖培的家在恭城之东约数

里，在龙虎关之西十余里，是个僻静山村，大家很安定的住留不下一月之久。在这期间把所有问题概行反复研究讨论。最后的决定由锺向李宗仁进行工作。首先进一步要造成与李有较多接触机会，再相机做工作。如能得到比较适宜的名义或职位，亦可利用作为掩护，但须对白提高警惕。另一方面由杨、陈、刘同往南京、上海、香港向有关方面将这次活动经过情形以及往后计划，提出汇报和取得联络，对南京要特别强调里应外合的办法。因此，杨义、陈绍虞、刘锡兹约在一九三一年五月初离开恭城取道长沙、武汉到达南京，通过有关方面向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和国民党中央党部陈立夫部长分别作过面报，报告大意是说广西内部工作已打下良好基础，前途大有可为。锺决心深入虎穴，艰苦奋斗，以竟全功。切望“中央”大力支持，促其实现。关于以后活动情形、自当随时报清核夺。

自此以后，陈绍虞住上海，张一、杨义留住香港，孙仁林、刘锡兹随同锺祖培在广西，均不断的秘密活动和暗中联络，并且不久，锺已得到李宗仁委为总司令部高级参谋，再后又得委为龙州区民团指挥官。对于反白活动，可说是越来越有利。但是，就国内局势来说，当时“中央”认为桂系已经打垮，退守老巢，仅余残喘，已不足为患，转而集中力量坚决“剿共”。同时“九一八”“一、二八”及“七七”事变风暴，接踵而来。广西问题虽然有时不完全平静（如六一运动），并无重大影响，故“中央”始终不再以兵力相加。同时锺在广西内部，亦不能酝酿成熟。因而迁延到抗战开始以后，在举国共赴国难的口号下，遂完全停止活动。（锺祖培在广西解放之初，组织武装暴动，经解放军围剿拘捕旋在恭城镇压）。

昆仑关战役亲历记

陆学藩

前言：我毕业于桂系的南宁军校，毕业后任桂系的总部参谋和南宁军校教官，后来又入南宁军校第五期高级班学习，一九三六年毕业。在南宁军校当队长几个月，后由白崇禧保送陆军大学第十五期学习，一九三九年夏毕业。当时白崇禧任桂林行营主任，他分派我任桂林行营参谋处作战科上校科长，专管作战业务。我系白的老学生、老部下，陆大又是他选送，士为知己死，又能在他左右，对这个职务还满意。从此，我每天就过着电话、地图、红蓝铅笔的生活。一九三九年昆仑关战役我是参与了的，下面是我的亲历纪实。

（一）当时我战局形势和广东南路之防守情况。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大撤退，国民党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一部份军队凭藉三峡天险，守住峨眉山大门，大部军队分向长江南北两岸之湘鄂和豫鄂方面溃退。日寇占领武汉，控制全国中心之华中，截断粤汉、平汉南北交通，接着又占领广州，控制华南，形成占领全中国之半壁河山。沿海海岸线，均入敌手，截断中国对外之国际连络，实行封锁政策。

广东和广西毗邻，广西和越南又毗邻。日寇虽占领广州，但湘桂铁路已通，越桂公路亦畅通，中国仍可向外取得

接济。因而日寇欲深入广西，截断越桂交通，占领南宁，目的在于截断当时中国对外的国际交通联络线。当时广东南路沿海防守部队系夏威集团之三十一、四十六两个军。十六集团军总部驻贵县南山，韦云淞之三十一军军部驻桂平，所辖一三一师、一三五师一八八师驻玉林五属一带。何宣之四十六军军部驻南宁，黄固之新十九师驻钦县防城，向钦州湾龙门港海面警戒。冯璜之一七五师驻合浦灵山、北海，向北海以西警戒。黎行恕之一七〇师驻南宁及邕宁蒲庙，作集团军总预备队，对广东南路沿海之防守，实际就是保卫广西的南大门。

（二）蒋管区之西南、西北两个行营。蒋的中央军委会在重庆，对华北、华东、华中、华南之军事指挥，有鞭长莫及之感。为便于指挥全局，乃设西南行营于桂林，由白崇禧主持，指挥第三（苏、浙、赣）、第四（粤桂）、第九（湘、鄂、赣）三个战区，即长江以南各省之军事。设西北行营于天水，由程潜主持，指挥第一（豫、陕）、第二（晋、冀）、第五（川、陕、鄂）等战区，即长江以北之各省军事。

现在专谈西南桂林行营。桂林行营组织主要人员是：主任白崇禧，参谋长林蔚，副参谋长俞星槎，政治部主任梁寒操，总参议王泽民，兵站总监陈劲节，参谋处长吴石，军政处长陈启之，总务处长唐希价，校阅委员会主任李毅，谍报组长杨继荣。另有军法处长、交通处长、经理处长、军医处长、姓名都忘了。

桂林行营地址设在叠采山下旧法政学校校址。其所辖三个战区负责人和地点如下：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江西上饶。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广东曲江。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湖南衡阳。

当日寇在钦州和防城之龙门港登陆，沿邕钦路北进，袭取南宁时，战事发生在第四战区辖境，照理这场战役，该由第四战区指挥，但因当时第四战区长官部在曲江，战事又发生在桂系老巢广西的南部，所以就由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直接指挥。

（三）蒋介石对昆仑关战役的幻想和态度。

蒋介石由于抗战以来，屡战屡败，丧师失地，一筹莫展，想找寻机会打一次胜仗，以挽回颓势，而振士气^①。他以为广西在蒋桂对峙时期侈谈三自三寓政策，民团办得好，高唱全省皆兵，凭这一点，可先声夺人。广西又是桂系老巢，军心民心都可利用，从地理和民气来说，是具备战胜条件的。蒋投这个机，投一笔资本，捞一个胜仗，满有信心的调用一些嫡系部队，形成绝对优势，把昆仑关和南宁的日寇吃掉。但结果相反，得个惨败。

从此他对白崇禧的印象改变，对广西的看法降低，以后对桂系部队的补充限制很严，尽量削减。蒋桂勾心斗角，又埋下日益滋长的根苗。

（四）参加昆仑关作战兵力情况。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日寇在广东钦州、防城之龙门港登陆时，白崇禧因公在重庆，参谋长林蔚到容县吊夏威父丧，夏威原驻贵县，因奔父丧回容县原籍。仅副参谋长俞星槎在桂。得到日寇登陆情报后，俞星槎急电白崇禧、林蔚赶回，不几天，两人均返桂林。

白崇禧由重庆回到桂林，决定成立“行营指挥所”，以参谋处人员为主，并由各处抽调必要人员组成，参谋长林蔚、参谋处长吴石是指挥所主要人员，位置在迁江红水河北岸附近一个小村庄扶济村。为应情况需要，赶时间，白崇禧率副参谋长俞星槎，高级参谋海竟强（白的外甥），参谋周竟，科长陆学藩，秘书黄启汉，副官陈寿筠，电务员杨能达及卫弁儿人，作先遣人员，由桂林先行出发，到迁江扶济村住一间独立家户，开始指挥。其余人员由参谋长林蔚率领陆续抵达。这时南宁已沦陷，日军已有一部份分别扼守宾阳昆仑关、武鸣之高峰坳，我前线部队和敌人保持接触中。

白崇禧得到蒋介石的许可，增调部队策划反攻，调动迁延了半个月左右。白所掌握参加昆仑关战役的部队约有九个军，二十七个师，人数约三十万左右。有四个集团军总部，番号是：夏威的十六集团军，辖三十一军、四十六军两个军，共六个师；叶肇的二十四集团军，辖陈骥之六十二军，共三个师；徐庭瑤的二十五集团军，辖杜聿明的第五军，共三个师（郑洞国、邱清泉、戴安澜）；蔡廷鍇的二十六集团军，辖广东六四军（军长邓龙光）共二个师。

此外由河南、四川、湖南、江西各调来一个军，共四个军（内有李延年一个军），另外炮兵团、工兵团、装甲兵团，加上广西绥署之四个独立团。后勤部队的中央兵站总监部设于柳州。

以上部队中杜聿明的第五军，系机械化部队，附属装甲兵团有战车二、三百辆，是这个战役之最精锐部队。

（五）陈诚和李济深之监军。

蒋介石是阴狠猜忌，白崇禧则奸滑巧诈。他们是互相利

用又互相防范的，彼此之间矛盾，由来已久，他们为抗战而合作，是貌合神离的。日寇入侵广西，蒋本想让广西自生自灭，利用日寇摧毁广西桂系老巢，但为维持国际交通线，又为避免因广西沦陷而危及重庆，动摇大后方，不得已而付出一笔本钱，调了不少嫡系部队，投入这个战役，但对白崇禧总是不放心。行营参谋长林蔚，是蒋的心腹，但林的权力有限，对白崇禧之作战指挥和部队之使用，林不能干涉。所以蒋介石就派陈城前来监军。对白来说，亦只有陈城才起监督作用。李济深是桂系老伙计，无权无勇，只是陈城的陪衬。陈、李在部队将近完成集中后，来到桂林，转到迁江，驻合山煤矿公司，距指挥所很近。陈每天必到白崇禧住房间长问短，了解情况。白崇禧对陈之来受到掣肘，大感不便，在昆仑关战争激烈阶段，白率原来先遣人员推进宾阳附近的白岩塘，驻白氏宗祠小学内，设前进指挥所，陈城仍住迁江合山煤矿公司，他自然洞察白的企图，万分不满，直到全线溃败。白崇禧回迁江，蒋介石到柳州召开柳州会议，陈把全部责任推卸在白的身上，对白攻讦备至，蒋自然深信不疑，在蒋白之间，陈白之间这种倾轧猜忌是不足为奇的。

（六）日寇兵力和企图。

在钦州龙门港登陆袭取南宁之日军，系其国内第二流部队之久留米师团和另一个师团，及海军陆战队一个师，归南支派遣军序列。以后又由龙门港登陆，向水淳到新市场迂回之部队，又系一个师团，分成两部：以一个旅团附一个骑兵联队为迂回部队，一个旅团直接向南宁增援，补充九塘中村旅团之损失，前后共约四万多人左右。海军陆战队始终在沿海警戒，担任掩护。钦州到南宁沿线系一个师团担任掩

护。南宁、昆仑关及高峰坳守敌为一个师团。昆仑关守敌为中村旅团，高峰坳守敌系一个联队。空军由海南岛起飞，活动频繁，威胁很大。

日寇袭取南宁之目的，主要在截断我国对外的国际交通联络线。那时印度支那仍为法国占领，越桂间有公路交通，成为中国得到外援的国际交通路，对中国的封锁未收实效。在华南仅占领广州不起作用，就必须占领南宁。为要确保南宁，又必须占领昆仑关和高峰坳两个据点。昆仑关是邕柳路上要点，形势险要，不通过昆仑关，无法到达南宁，特别是机械化部队，不能离开公路，所以成为敌我双方必争要点。我方不惜以重大代价攻取，日军也以一定兵力固守，因而构成一个大战役。

（七）战役第一阶段。

日寇南支派遣军，约两个师团，配合海军陆战队，用空军掩护，在钦州附近龙门港企沙登陆时，我驻军新十九师，疏于防范，被日军突然袭击，措手不及，溃败后撤，日军占领小董作据点，俘虏该师师部人员和家属很多，钦州也被日军占领，新十九师师长黄固对部队失了掌握，损失很大，余部向苏圩溃退。在合浦、灵山方面之一七五师，在灵山陆屋坳阻击向灵山县城进犯之敌，尔后亦奉命后撤。日军沿邕钦路长驱直入，越过苏圩、吴圩之线。迫近邕江南岸，作渡河袭取南宁之准备。

桂林行营得知日军登陆情报后，判断日军目的在袭取南宁，副参谋长俞新槎即按作战计划，指挥部队，电令驻桂平方面之三十一军三个师，向苏圩、吴圩方向急进，阻击向南宁北进之敌，同时电令驻合浦、灵山一带之四十六军一七〇

②、一七五两个师分向邕钦路西进，阻击北上南宁之日军。又电飭夏威速回贵县负责指挥。三十一军之苏祖馨一三五师距南宁较近，乃电令该师由贵县渡河，用强行军兼程到南宁，布防守住邕江北岸，拒止日军渡河。该师先日军到达南宁，在邕江北岸防守。日军以南宁已有守备，乃避开正面，于邕江下游之蒲庙渡河，越青山塔，进出长岗岭，绕出守河部队之后，该师师长苏祖馨仓忙向武鸣方向撤退，守邕江北岸之伍宗骏团亦放弃阵地向武鸣方向溃退，十一月二十三日，日军遂占领南宁。日军占领南宁后，为确保南宁，即以中村旅团占领昆仑关向宾阳方向警戒，以一个联队占领高峰坳，对武鸣方面警戒。这明显地说明，日寇目的在确保南宁，截断我越桂交通，没有向柳州或龙州或百色前进的企图，三十一军之魏镇一八八师亦于南宁失守后，沿邕柳路北撤，在昆仑关以北之太守圩附近和敌人保持接触。夏威之十六集团军总部，韦云淞之三十一军部亦到武鸣，贺维珍一三一师先到宾阳候命，后到武鸣，苏祖馨之一三五师离南宁后亦逐次撤到武鸣，在米花坪、双桥一带与高峰坳之日军保持接触。何宣之四十六军一七五师、一七〇师则在邕钦路东侧阻击敌人后方交通。由于日军以占领南宁，分别扼守昆仑关和高峰坳两个据点，南宁敌阵脚已稳，我部队则惊魂未定，只求喘息之机，因而这时前线形成我不犯敌，敌不犯我的休战状态。目前十六集团军的两个军，只能警戒前方，安定人心而已，这是战役的第一阶段。昆仑关大战正在积极酝酿准备中。

（八）战役的第二阶段。

昆仑关和高峰坳是日军占领南宁的两个据点。昆仑关是柳邕公路要点，关系特大。我军为克复南宁，必须先攻夺昆仑

关，要想攻夺昆仑关，不是广西这两个军力量所能办到。对南宁反攻，白崇禧在重庆已得蒋介石同意。反攻部队正在忙着调动中，部队大部系蒋嫡系，都是最精锐的。杜聿明之第五军是机械化部队，有装甲兵团、炮兵团、工兵团，当时反攻是以他为主力，该军原驻桂北全州一带整训，又系机械化，朝发夕至，所以第五军是先到达迁江、宾阳，接近昆仑关，驻清水河和红水河间之邹圩、石陵圩一带待命。这时邹圩之清水河渡口，桥梁已破坏，邹圩至昆仑关之公路，也完全破坏，电杆、电线都已破坏砍断，交通通讯全部中断，为要反攻先须恢复交通通讯，是当时战前首要战备工作。白崇禧指派我做这项工作，并向前方部队取得联系找他们所在位置。同时白崇禧令杜聿明派一个连，掩护我行动，用意是壮我的胆。我受命后，即坐车出发，由扶济村渡迁江红水河，到清水河之邹圩渡口，杜聿明和郑洞国率兵一个连已在渡口等着。见面后，郑洞国握我的手说：“学藩兄，主任叫我们派最好一个连掩护你，现在我派第五军荣誉师第一团、第一营、第一连给你。都是第一。是全军最好的一个连，你放心吧！”我笑说谢谢乃舍率兵一个连步行，向昆仑关前进，沿途看到公路确已挖断，电杆砍倒，几十里路看不到一个老百姓。我想一八八师一定在昆仑关附近，决心继续前进，果然在太守圩附近找到了一八八师师长魏镇，了解当面敌情，传达白崇禧意志后，即回头去到了桥，派兵找宾阳县县长来传达白崇禧命令，限宾阳县五天内修复邹圩到昆仑关之公路和电杆。办理后赶回邹圩，时已薄暮，乃在邹圩住一夜，挂电话向白崇禧报告完成任务经过。第二天清早，白崇禧派来的汽车已到，我率去做掩护的连，已集合在我车边等我，我向

他们告别，即坐车回迁江扶济村。这时，第五军部队已全部到齐。其他部队，亦都在途中陆续到达。参谋长率领之行营指挥所大部人员也都到齐。他们住村内，白崇禧率领之先遣人员，住村外之一间小学里，得知战火已快点燃，反攻部署在积极准备中。

大约是十一月底左右，调动的部队全部集中完毕，杜聿明之第五军是主攻方面的主力，已进入昆仑关作战准备位置。徐庭瑤之二十五集团军总部和杜聿明之第五军军部，驻昆仑关附近山冲内一个小村庄——南天门（白崇禧以后常到此视察）。叶肇的二十四集团军所辖陈骥的六十二军已到丁桥附近。我奉白崇禧的命令到那里传达作战任务。指定他在昆仑关东北侧一带高地高上田南北之线，协同第五军作战。攻击敌侧背蒋嫡系之其他三个军（内李延年一军）都到达迁江石陵、邹圩一带。我曾跟白崇禧去石陵圩对部队检阅和讲话。广东六十四军（内有官祜一个师）到达宾阳新市场附近。我奉白崇禧命到那里传达作战命令。该军尔后在九塘一带参加作战，原在太守圩之魏镇一八八师归还夏威集团军建制转到武鸣方面去。何宜之四十六军一七五师、一七〇师及桂绥之四个独立团在邕钦公路东侧，阻击敌人之后方交通联络线。广东之另一个军（番号记忆不起）到灵川附近，归蔡廷锴之二十六集团军（驻陆屋）在陆屋那陈一带，阻击敌之后方交通联络线。蒋嫡系之两军为总预备队，控制在宾阳及其以东一带，这是当时部队部署情况，主要是以克复南宁为目的。先攻下昆仑关，进出南宁，以昆仑关为主攻，高峰塆为助攻，以有力部队突击九塘敌之侧背，对邕江南岸敌之后方联络线，尽力截断之。以后全战役经过都本这个方针进行。

地形上，昆仑关南面有一条夹长冲沟直达九塘、八塘、邕柳公路在冲沟北侧。冲沟西南面山峦重叠，冲沟两侧距离在步枪射程内，形成一条隘路，由北向南延伸，是有利于防守的天然条件。昆仑关口冲沟对面，矗立着一个四四一高地，能瞰制和封锁昆仑关口，大有一夫当关，万军莫敌，难越雷池一步之概。日军就在这个四四一高地上占领阵地，设置防守，构成浓密之火网，控制关口和几公里之公路。战防炮、小钢炮特显威力，给我方装甲部队以致命打击。由于地形限制，部队虽多而活动困难，等于无用，造成逐次使用兵力的缺陷。重炮、山炮更受地形限制，未收协同作战之效。

大约在十二月十八日（估计时间）反攻开始，第五军在炮兵掩护下，以装甲兵之战车为前导，冲扑昆仑关口，荣誉师继进，并不遇到抵抗，好象没有日军一样。先头战车约十余辆，通过关口，向南续进，仍不遇抵抗。后续部队跟进，以为不费力而克复昆仑关。谁知先头战车前进约两公里左右，沟对面之密集炮火，特别是战防炮炮火猛烈袭来，先头战车均中弹起火，不能行动，阻塞了道路，关口和公路上人车拥挤，死伤枕藉，构成自己前进道路之障碍。经过多方侦察，得知四四一高地之守敌威胁很大，不拿下四四一高地。无法前进，于是攻夺昆仑关变为攻夺四四一高地。荣誉师就作攻夺四四一高地之部署；由关口两侧爬山越沟，全力对四四一高地之敌攻击，日敌沉着顽屈，毫不为动。经几昼夜之强攻，荣誉师死伤很大，四四一高地山脚下，尸体堆积。但牺牲虽然重大，仍无法夺得四四一高地，而成胶着状态。主攻方向如此，助攻方面武鸣高峰坳之攻击也无进展。这时白

崇禧已率海竞强和我等少数前进指挥所人员，来到白岩塘从事指挥。每晚白崇禧都率海、陆两人到南天门第五军部督战，白崇禧曾到炮兵阵地指挥炮击，深夜始归。徐庭瑤名为集团军总司令，其实没有什么指挥权，是一个空架子，惟挂名在第五军部而已。实际负责指挥的全是杜聿明。白崇禧则利用机会对杜聿明施展拉拢功夫，企图把第五军成为他的部队。杜聿明亦心照不宣。

第五军对四四一高地之攻击将近十天，除荣誉师损失特大外，邱清泉、戴安澜师轮番攻击，也损失不小，仍不得手。其他侧翼之攻击，如九塘、八塘亦无进展。高峰埭方面夏威夷十六集团军之助攻，亦仅接触，形成对峙而已。白崇禧曾两次率海竞强和我到武鸣视察。并到米花坪第一线，仰视高峰埭，长吁短叹，一筹莫展。这时杜聿明因战况僵持，部队损失重大，心情万分焦急，每天都到白岩塘请示待命，因睡眠少，疲劳不堪，每次到来就和衣睡倒在我床上。杜服从性很好，因而与白始终融洽。大约十二月中旬，决以第九师（嫡系精锐师）接替荣誉师，归杜聿明指挥，投入第一线作战。因荣誉师损失殆尽，已丧失作战能力，须代以新的力量，郑洞国撤离前线时，能战的士兵，仅约七百人左右，郑伤心之余，曾亲率残余士兵到白岩塘请白崇禧检查，以示痛心。白崇禧带我同去。一万三千多人的师，仅余七百多人。我问当战役开始前，曾掩护我的第一连情况，仅有四个人举手，郑洞国差不多流泪，我也不禁凄然。即命郑率归后方整理补充。

第五军增加第九师后，配合原有之邱清泉、戴安澜两师，继续对四四一高地攻击。这时李延年军亦增加到九塘方

面对九塘之敌猛攻，因中村旅团长在九塘，是指挥中心，攻克九塘可抄四四一高地侧背，其他方面也同时进攻，形成反攻以来新的高潮。苏联来了十八架轰炸机，由柳州起飞，分别对九塘和四四一高地轰炸，陆空协同，收了效果。九塘之敌不支，日军中村旅团长被击毙，残敌向八塘撤退，但仍占领九塘、八塘间之高地，继续顽抗。四四一高地之敌亦向九塘、八塘间撤退，和九塘之敌汇合。这个时候昆仑关表面似是克复了，但日军仍占领九塘以南一带高地，其形势险要不下于对昆仑关之四四一高地。九塘、八塘乃至七塘之狭长隘路两侧高地仍是日军占领，我军在这样的地形和密集火力下进攻，加之指挥笨拙，何能免于重大死伤！中村旅团虽损失过半，但已得南宁方面增援，其力量仍和四四一高地一样。从整个地形看，日军放弃昆仑关不等于昆仑关到南宁之公路畅通，要到南宁，仍路不通行。于是继续进攻，以达到克复南宁之目的，这是我军的必然趋势。日寇方面除令前方顽强死守外，为解南宁之困，正在积极增援中。这时我军总预备队已完全使用，必须向重庆方面蒋介石请求，才能得到增援部队，远水不及救近火，只好暂时空着。这时敌机活动频繁，掌握了制空权。九塘到迁江间之公路上受敌军空袭妨碍很大。白崇禧率我们到前线，曾在火守圩附近，被敌机一架跟踪低空袭击，幸而系敞蓬汽车，下车快，得免于难。到了一九四〇年一月上旬（确否不定）对九塘以南高地进攻，仍为第五军和第九师及李延年军为主攻部队，其余则使用于对八塘、七塘、六塘之包围侧击。高峰坳方面，敌我战况无变化，邕江南岸之邕钦路两侧，战况亦无变化，因战线延长，时间拖久，部队疲劳，士气低落，已到了再衰三蹶之境地。

而最主要的，就是总预备队已经没有，控制不起，因而构成以后对敌之迂回，无法应付之困境。

（九）战役第三阶段。

日寇占领南宁，为的是截断越桂交通；占领昆仑关和高峰坳，为的是作南宁外围据点。现在昆仑关和九塘为我军攻克，并仍积极对八塘、七塘，进攻中，威胁了南宁，中村旅团又损失大半，必须增援。据敌情判断，得知日寇南支派遣军已增派一个师团和一个骑兵联队为增援部队，以一个旅团直接增援昆仑关，填补中村旅团之损失。另以一个旅团配属一个骑兵联队作迂回部队。元月中旬，日军增援部队和一个骑兵联队仍在龙门港登陆。增援昆仑关方面的旅团先行，迂回部队一个旅团和一个骑兵联队登陆后，向永淳方向急进，随即在永淳渡河，经伶俐圩，向宾阳急进。先头骑兵，行动迅速，很快就可到达宾阳。白岩塘指挥所据报，判断敌军系企图迂回我军后方，新市场无疑是其目标。白崇禧张惶失措，令我们分别通知前方部队，不得无故擅自撤退。令第五军以一部监视八塘当面之敌，主力回头阻击迂回之敌。白崇禧这时才感到不控制总预备队之失策。乃责成杜聿明负责全权应付这个意外情况，得相机行事。对此紧急情况，作草草的处理后，即商讨关于前进指挥所的位置移动问题。白岩塘距新市场很近，为策安全，决定即撤离白岩塘，仍回迁江之扶济村继续指挥。前进指挥所撤退到邹圩稍事停留，决定以清水河作拒止敌人北进之临时防线。但无法通知前方部队，乃决定回迁江后再作处理。而重回离别两个多月的扶济村。事后得知，我们离开白岩塘不久，敌先头之骑兵就到达新市场，折向昆仑关方向奔袭。从这时候起，前方情况不明。事后得知

杜聿明亦无法指挥部队，他本人只好自行撤退到邹圩。前方情况紊乱不堪，白崇禧率我们回到扶济村已近黄昏。大约下半夜三点钟左右，白崇禧叫我进到他房里，我在煤油灯灯光如豆的照射下，看到穿军大衣的三个人，排坐在一条长凳上，白崇禧坐在床上，经他介绍，第一个是李济深，第二个是陈诚，第三个是张发奎。接着白对我说：“现在全线整个垮下来了。电话中断，情况不明，必然很乱。杜军长可能在邹圩附近，我派你马上坐我的车到邹圩去找杜军长，并察看前方情况。叫杜军长负责收容撤退下来的部队，不准再北退，逦逦沿清水河北岸之线，严密布防，阻止日军北进。要杜军长从现在起，前方情况用电话或电报向柳州报告，你完成任务后，须在天亮时回到迁江，我在迁江渡口等你，同回柳州”。那三位大员，听到白崇禧的话后，面面相觑，不表示态度。当时已三点钟左右，任务在身，时间飞过，不愿多考虑，就糊里糊涂地带着黎民强、李瑞祥两人，坐着白崇禧的专用车过江向宾阳邹圩前进。一路看到真的兵败如山倒，兵慌马乱，但无人拦阻我的车，很快就到清水河渡口。看到杜聿明在那里走来踱去，他看到车，知道是我，开口就问，主任在那里？有什么指示？并把前方情况说了个大概。我传达白崇禧旨意，指定他的任务，并告诉他白崇禧等我回到迁江，即返柳州。

从杜聿明口中得知（一）日军迂回部队到宾阳新市场时，第五军准备扼守昆仑关南北高地，逐次抵抗，待命行动，本可挽回颓势。只因高上田方面，叶肇集团军不沉着，不听约束。敌骑兵刚到新市场，即擅自撤退。影响左右邻接部队，全线震动，因而崩溃，不可挽回。（二）各部队均利

用山冲后撤，分向宾阳和上林方面撤退，无法制止，但损失都不大。（三）我军撤离前线后，敌并不追击，仍占领昆仑关原来阵地。第五军现仍在太守圩、昆仑关间，和敌保持接触中。杜聿明本想和我多谈，因时间关系，匆匆而别。沿途仍是人、马、车杂乱，争先恐后。但我坐指挥所专车通行无阻，很快就回到迁江渡口，天刚发亮，渡过河北岸，看到白崇禧和海竞强及其他先遣人员已到了渡口。我把杜聿明情况和其他情况详细向白报告后，接着就跟他们同车回柳州，驻羊角山一个学校内，昆仑关战役就是这样告个段落。

（十）柳州会议。

1、会议地点：柳州羊角山。参加人员：蒋介石、陈诚、白崇禧、李济深、张治中，各集团总司令、军长、师长及行营主管有关人员约百余人，张发奎也参加。

2、会议内容：参谋长林蔚报告作战经过概况，各部队报告作战经过。

3、蒋介石讲话：说明他对昆仑关反攻的期望和败仗之失望，并指出行营指挥之失当，部队作战之不力，都应负战败之责。

4、陈诚自称监军不力，自请处分，降为二级上将。白崇禧自称指挥失当，自请处分，降为二级上将。

5、参谋长林蔚宣布：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叶肇，交军法讯办。一三五师师长苏祖馨撤职留任。团长伍宗骏经军法讯办，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6、曾攻克昆仑关和九塘之部队，分别予以奖励。

7、撤销桂林行营，成立桂林办公厅，不负作战指挥，派李济深为主任，林蔚为付主任。白崇禧回重庆军委会军训

部长原职兼副参谋总长职。

8、叶肇、徐庭瑤、蔡廷锴三个集团军番号取消。

9、第四战区张发奎移驻柳州，专管广西。

10、令设第七战区辖广东全境，余汉谋任司令长官，驻曲江（韶关）。

11、会议期间，日寇飞机曾对柳州羊角山轰炸。

（十一）陈白之倾轧。

在白崇禧回柳州的同时，陈诚和李济深也由迁江合山煤矿公司驻地回柳州。第二天上午，陈诚一个人到羊角山找白崇禧的晦气、奚落一番，冷嘲热讽，大吵大笑，声传户外，约十多分钟，听到白说：你想要作战情况，可向陆（学藩）科长要，不要向我罗嗦。不一会陈诚到房门口大声叫我名字，我到白房里，白崇禧坐在讲台边看文件，陈在下面走来走去，仍在嘲笑。白崇禧对我说：陈部长想知道前方情况，你抄给他一份。陈走靠我身边对我说：陆科长我知道你很能干，帮白主任做很多事，并问我是陆大第几期的。他又说：假如白主任肯割爱的话，你愿意跟我做事吗？我看出他和白崇禧互相嘲笑弄僵了，拿我来扯过场缓冲一下。当时我说：白主任眼委座做事，陈部长也跟委座做事，我跟白主任做事，还不是等于跟陈部长做事吗？部长有命，我必服从。陈诚听了，故意大声笑道，强将手下无弱兵，说得太好了，我欢迎你跟我做事。我接着给他战报一份，他才离开羊角山。白、陈之矛盾很深，并很露骨，互相猜忌，各不相下，陈这次到迁江，不能达成监军任务，十分不满，加上吃了败仗更加火起，也是攻击白的绝好机会。抗战后，白崇禧任空头的国防部长，挂个虚名。陈任参谋总长，掌握实权。曾公开

说“部长有权。总长有能”。暗争得白热化，表面化，这是有其历史渊源，不是偶然的。

（十二）保存实力。

广西防区属于夏威集团军。日军在龙门港登陆，袭取南宁，该团军首当其冲，新十九师受到损失。反攻前，昆仑关和高峰坳与敌人对峙的部队是夏威集团军，但没有作战。反攻后，三十一军仍在高峰坳，四十六军则到邕钦路西侧，都系助攻方面，任务不重，根本没有损失。昆仑关和九塘方面系主攻，任务重，牺牲大，那就不同了。这些对心计狡滑之白崇禧是心中有数的。反攻以后，夏威集团军在白崇禧亲自指挥下，有权使用部队，尽量使用别的部队，不动用自己的部队。夏威集团军始终在武鸣和邕钦路西侧方面，打些风流仗，看着敌人，可打可不打，因而不受到丝毫损失，争夺激烈，死伤惨重之昆仑关，始终是第五军和其他部队，这都是白崇禧保存实力的做法。蒋介石对他这一套，是早有戒心的。陈诚之监军，原因就在此，但白崇禧竟公开避开陈诚之监军，跑到宾阳白岩塘前进指挥所去，使陈诚失去监军之作用。他的目的，只要能保存实力，胜败置诸度外，实系民族罪人。八年抗战，蒋介石都在有意识地利用机会，消灭杂牌部队。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杂牌部队也针锋相对，谋求对策，争取生存，避免被消灭，上下勾心斗角，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因而导致丧师失地，万里神州，敌骑纵横，使整个中华民族沦于浩劫。这就是消极抗战的具体内容。往事回忆，实在痛心。

（十三）结束语。柳州会议，标志着昆仑关战役的结束。日寇仍占领昆仑关和高峰坳两个据点，确保南宁，越桂

路从此中断，直到日寇占领了越南，才撤退南宁之日军。

三十万对四万，吃了败仗。蒋介石嫡系最精锐的部队原来也只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豆腐军。自比小诸葛的一级上将行营主任白崇禧，却也不过是日军一个少将师团长的败卒。这就是蒋介石消极抗战的必然结局。

写于一九七八年四月

编者注：

①这是作者的看法。另一看法是，据国民党第五军《昆仑关作战纪要》，认为蒋介石主要是为了保持当时的越桂国际交通线和防止日寇深入。

②据冯骥说，一七〇师驻邕宁蒲庙。

抗日战争期间柳州商业概况

黄炳燊

我是在一九四二年春才到柳州的，因此写这方面的情况只能从这个时候写起。

原来柳州市的主要商品来源，如锦纱、棉布、洋货、百货、京果、海味等等都是由广州经梧州用船运来的。抵柳州后才分散到柳州附近各城镇如宜山、河池、南丹、长安、柳城、来宾、石龙等地，较远的也可以销至黔南一带。

柳州的主要出口商品如桐油、茶油、豆类、生猪、鸡鸭、木材、山货、药材等等，也是经航运由梧州转运往广州、香港、澳门等地销售。

抗战以后，由于日寇侵占了广州，后又占据了香港，因此柳州市的贸易便起了变化，进口的纱布等货物，已不能直接由广州运来，出口的商品也不能直接运往广州了。在这样情况下，究竟怎样贸易？商人们为了赚钱，逐步的冒险走通了两条路线：第一线是在广州将商品偷运到广东三水县芦苞镇，再由芦苞镇经四会、高要等地运入梧州，由梧州转运柳州；第二条线是由香港偷运至广州湾，然后由广州湾经玉林运柳州。出口商品也是经这两条线输出。运输方法比以往困难，有很大一部分路程是需人力挑运的。因此商品的供应，经常出现紧张的局面，再加上当时的重庆、成都、昆明、贵

阳等地的商人都集中来柳州采购，更促使柳州的商品供求失调。由于利润关系，刺激了香港、广州湾、芦苞等地的大商，把大批的商品运来柳州。这样一来，大大充实了柳州的市场，便又吸引了更多的远道客商，如西安、青海等省市的商人也都来柳州采购货物了。因此，便形成了柳州市的一度繁荣，大街小巷都成了商品交易的场所。由于外来商贾的增多，旅店业、经纪行便应运而生，如雨后春笋般的开设起来。经纪业又名“九八行”，旧称“平码行”，它的业务是代客买卖，收取佣金（佣金即是手续费）。由于经纪业务和旅店业的增多，大大方便了来往客商。因而柳州市便成了当时西南几省货物集散地主要商场之一。使柳州由原来一个中小商品集散地，一跃便成为大宗商品的集散地，由九万人口增至一十多万人口。与此而俱来的各种行业便相应的增多起来，可称“盛极一时”。柳州市场这种局面，到一九四四年日本鬼子侵入柳州前夕才消失。

当时柳州为什么会比本省几个市兴旺而又成为主要商场之一呢？其主要原因是交通比较方便，东下可航通梧州，西上有火车直通金城江转汽车到贵阳，南往有汽车通玉林转广州湾，北有火车通桂林、衡阳、粤北、长沙等地，当时也有一些航空运输。第二个原因是由于当时国民党的官僚资本向柳州渗入，有十多家商业银行设有分行在柳州，使现在的培新路成了当时的“银行街”，这样便大大地增加了当时的商业信贷（当然这种商业信贷，实受其惠者，则是这批银行的大老板）更吸收了货源。第三个原因是由于当时腐朽的国民党政权的金融逐日贬值，信用低落，聪明的商贾们也看清了这一套，大家都不愿存银纸过夜，恐怕白白蒙受贬值的损

失，今天售出了什么货，必定要在今天购回，因而形成货物的交易频繁。由于上述三个原因，便形成了柳州当时的虚假繁荣。

现将当时各行商的经营情况分述如下：

（一）经纪行业

经纪业是当时最活跃的一个行业，它的业务是代客买卖，对卖方则九八找数，故经纪行又称“九八”行。对买方则收2%的佣金，每代客售出一百元之货，他的内外收入就是四元。这是公开的收入。这种收入，在经纪行来说，这是次要的，主要的收入则是另外一种欺骗顾客的手段。他的欺骗方法是很巧妙的，它是通过货物的起跌价格来欺骗货主的，例如有一个客商由广州湾运来一批货物到经纪行卖，这批货物的价格是按当时市面行情而估定，可是这些经纪行的老板却别有用心的把价格喊高一些，使货物一时未能售出，等待货物周期价格上涨时（货物的价格上涨，实质是当时币制贬值的反映），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办法，马上拍出电报给货主：说这批货物已按价售出了，于是其中涨价的大部分收入已落在经纪行的腰包了。由于这样情况，经纪行在当时大为兴盛。这些经纪行大部分集中在沙街开设（现柳江路），也有一小部分在正南路开设（现在的解放南路），总数达两百多家。其中以沙街的生纪行，厚福行、联福行、仁泰行、达成行、泰丰行等为最多货物的经纪行。在正南路开设的经纪行则是较小型的，有些是伙铺兼营经纪业的。他们的业务规模，比起柳江路经纪行的业务是悬殊的，但也有它

的特点，它可以适应一般小本经营的小行商（沙街的大经纪行是不收货客的伙食费的，正南门的小经纪行则收货客的伙食费）。

经纪行的老板们除了代客买卖外，并乘其业务的方便与及各方面的行情比较清楚，同时由于银钱来往较多的关系，多数与当时的公、私银行有勾结，因此，这帮经纪商人大事炒买，大做其买空卖空的勾当，在市场兴风作浪，使物价一日数变。当然这些赌注式的买卖有发了大财的，但也有亏光而垮台，债台高筑而“走路”的。

经纪商人们一则为了招来顾客，二则为了过其腐化的生活，大部分每于华灯初上，便联袂“西飞”，在特区（特区即今之连塘路和柳荫路一带，是妓女集中营业的地方）招妓侑酒，真是夜夜笙歌，灯红酒绿，生活极端腐化。

由于征歌逐色，讲排场，讲体面，挥金如土，有部分经纪商在这些场合沉沦下去，把经商之本挥霍一空，而至“床头金尽，负债累累”宣告“关门大吉”的。

总之，经纪行业，在当时一方面是起到了沟通城乡和促进各地贸易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又成了兴风作浪、捣乱市场的场所。当然主要者不是它，而是官僚资本，但它是起了配角作用。

一九四四年，日本侵略军将到柳州时，经纪行业早已迁移一空，老板及其有关货客大部分逃往贵阳等地。在路上由于交通工具极为缺乏，货物运输困难，连人也难行走，损失很大。有被日寇飞机炸掉的。有来不及搬走的，也有被土匪抢劫的。总之他们逃到贵阳时，所存物资已不多，有些连伙食也成问题。昔日柳州沙街的大老板，今天变成了贵阳街头的

苦力，大不乏人。但也有极少数人因缘时会，投机得手而成暴发户者。

一九四五年，柳州光复，经纪业又在兵祸余烬（日寇临走时，把柳州全城付之一炬，千万铺户、房舍幸免为灰尽者极其少数）中，在柳江路重张旗鼓，争相占据“营地”和争相招徕顾客，不数月而经纪业又已成行了。当时经纪业的主要买卖不是棉纱布匹，也不是日用百货，更不是茶油桐油之类，而是黄金买卖。这些黄金都由泰国经越南，到中国东兴而转来柳州出售，由柳州再转售给贵阳、重庆等地商人。因此，当时的黄金，有称为“泰条”、或“九九条”者。每条是六市两庄或十二两庄不等。当时他们运来的黄金有多至几百条的，甚至有更多一些的，但一般商人都是十把条或几十条而已。当时经纪行收取黄金买卖的佣金九九、五、即是收总值0.5%，由于数量庞大，这样收取佣金，就是非常可观的了。他们也是同样利用起落价的机会从中占取便宜的。当时有生记行老板周乐文其人者，在逃往贵阳后已经一贫如洗，但返柳后，干了黄金经纪，不数月又再作富家翁。但好景不常，自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结果复因大做黄金炒买而又垮台了。

一九四六年后，真正黄金实货交易已逐步减少，变成炒买黄金空头，经纪行业务也由此转向正常，即是恢复一九四四年日本人沦柳前的状态。此时大宗商品已由上海、广州等地陆续运到，出口商品也由长安、三江、贵阳等地到柳州集结，通过经纪行而转售给各地商人。所以这时的经纪业又复蓬勃兴起，但比之一九四四年前已经有所逊色了。迨后，由于川、黔等地的商人直往沪穗采购，而不来柳州采购，出口

商品也从川、黔、滇等地直运穗港。因此，柳州的经纪业已少却了大宗的买卖了。同时由于一九四七年以后的“国币”迅速贬值，使得原来走行商的老板各各亏蚀，无法再作行商。故经纪业这时已陷入衰落的状态，不如昔日之旺盛了。但话还得说回头，为什么到解放前还有一百多家经纪行呢？原因是这样：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经济崩溃，通货恶性膨胀，原来那些行商所亏蚀的货物，大部分被通货膨胀亏去，而另一部分则被经纪行“借艇割禾”割去，因而经济业务虽然不振，经纪行老板借此而捞了一笔，以作苟延残喘的本钱。其实当时的经纪行所经营的业务，除小部分货物是人家的外，多数买卖却是经纪行本身的了。除此之外，大部份经纪行都做投机买卖，大炒金、银、纱布，买空卖空，你来我往，将黄金、白银、棉纱、布匹等作为踢皮球式的买卖，实在当时的商品已甚为枯竭了。由于这些投机买卖都集中在经纪行来往，在外貌上看，经纪业务似有起色，但实质是经纪业务的继续衰落。到将近解放时，柳州市的经纪业已成为“无鱼之池”了。解放前夕，投机失手，债台高筑而至垮台者，大不乏人，肖条景象，已笼罩着整个经纪行业。

（二）绸布业和百货业

绸布与百货两业是相连的行业，有些铺户单独经营绸布，有些单独经营百货，有些则两样均经营。这两行商业在抗日战争时期和光复后，都集中在小南路经营，因而小南路又称“苏杭街”。在抗日战争时期，有几间较大的和大的批发商，是专营批发而不做零售的。其中较大的有兴仁路的友成

隆、小南路的同发昌、广成昌等。他们的资金大约是五千匹布左右，商品来源是在上海、广州采购来的。销售地区则甚为辽阔。除柳州专区各县外，在抗战时期还远销至昆明、重庆、贵阳等地。抗战前和光复后，则只销柳州专区各县，其中也有部分销至黔南如独山、榕江等地。这些批发商没有一定的利润标准，他们的原则是：看见货物在少的时候，便抬高价格；看见货物积压时，便亏大本也要出售。在抗战前，他们来往之间的赊销很大，互为利用，赊来赊去，大打筋斗。因此，当时称这些生意人家为“纸上富贵”：评为“真财主、假客商”。在年终结帐时，不知多少中小铺户受债主临门所迫，连年也过不成，年终宣告破产者，比比皆是。有些店铺较大、资金较厚的商店，则又受着官僚的迫害和勒索，如友成隆当时就被廖磊敲去一大笔，甚至该店老板邓寿山要被迫出走。所以当时的绸布业和百货业就处在这样风雨飘摇的环境中，小的被迫债，大的被敲诈勒索，白天受日本飞机空袭，晚上又慌盗匪光顾。更重要而受害更大的则是受“国币”贬值的害最大。笔者一九四二年抵柳州时，看见当时的绸布店和百货店货物还很充足，这些商人还拥有大批的商品，可是到了一九四四年，许多商店的货物已不翼而飞去了十分之八九，而他们的资本却增加了不知若干倍的“国币”。所以当时在商人中流行着这样一句话：“现在做生意是笑着亏本的”。他们眼看着利润很大，钞票日多，自以为又捞了一笔，可是等你将这批款重新进货时，却只能得回原来货物的半数而已。这样一次复一次的循环下去，数次交换便所存无几了。当时小南路有一家较大的零售布匹店，开张时约有二千匹布的资本，约三年左右，便全部亏光，由此

可见一般了。显然当中也有些投机得手而捞了一些的，但绝大多数的工商业者在那时却确是不堪亏蚀，再加上当时的苛捐杂税，抽壮丁等等情况，使当时这两行的商人和其他各行的商人一样难以维持下去。

当时这两个行商中还经常有与外省人殴打的情况。原因有几种：一种是当时国民党的官兵、尤其是那些空军出来买东西，由于他们目中无人，趾高气扬，总想占些便宜，揩些油，又兼南北言语隔阂，往往造成殴打——打烂窗櫺，打伤营业员等事件经常发生。每次发生这类事情，结果总是商人吃亏。即被打了，又遭损失，甚至还要受拘押，等等。当时地方执政的国民党小官僚为了讨好其上级，对商人的这些情况，根本是不理的。

一九四四年，日寇侵入柳州，绸布、百货的商人，大部分逃往象县之中平圩。由于日寇没有到过中平，这批商人幸免于遭受更大的损失，因而光复后尚有能力继续经营，可是当这批商人由中平回到柳州时，只见断壁残垣，一片瓦砾，全成废圩，原来店铺，无一存者。他们只得在这些废圩上扯起布帐，挂起招牌，恢复营业。由于刚光复未久，国民党的金融曾有过几个月左右的稳定，这批商人因得逐步的把店铺建筑起来，业务有所发展，中兴一时。但好景不常，国民党的金融又日见波动，比前更剧，市场又不稳定了。商人们吸取了以往的教训，他们对国民党的动荡金融采取对策，改用银币交易，十多年不见的光洋、东毫、又在市场上成为最有价值最稳定的货币了。国民党虽然强迫使用关金券，银元券、金元券等等，可是商人们根本不理他这一套，只是阳奉阴违而已。

绸布，百货业虽然在一九四五年光复时有所复苏，但由于一九四六年以后国民党发动内战，对商业更是横征暴敛，大加摧残：一方面由于民生困苦，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公教人员的生活，已是朝不保夕，市场购买力极为低落，使商店业务甚为清淡，真可算为“门堪罗雀”。只有那些投机买卖的表面上还存在着一些虚假繁荣，那些老招牌则早在抗战期间以及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间垮台，剩下来的资金已是薄弱得可怜，有很多商店是靠借日息维持门面的。当时日息之高，实为惊人，借一百元，每天需付息五至六元，甚至十元不等，为借日息而垮台者也是不可胜数。至于那些搞投机买卖的，虽曾得逞一时，但最终也不能倖存，如以比较著名的投机买卖起家的王祥泰布店，最后也以投机失败而破产。最大的百货店均和号也老早被“币灾”弄至垮台了，迨至解放前夕，整个绸布、百货行业也和其他各行业一样，已处在极度危机之中。

解放前广西桂林特察里的概况

谢凤年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社会上除了有大量秘密卖淫的私娼之外，还公开设卖淫的妓馆。这种妓馆是向国民党地方税局缴纳“花捐税”，获得合法营业，受到保护的。广西桂系当局为了收入这批数目不少的“花捐”，也同样允许公开设立妓馆。但是以妓馆的名称太令人刺目，所以称为特察里。并由广西省政府颁布“特察里管理条例”，规定在桂柳邕梧四个城市和较大的县城，可以设立特察里，但必须划出一个地区作为特察里的范围和人民群众住宅区分开，使那些寻花问柳者易于识别。特察里所在地区，专门设立一个警察所来管理这个特察里的治安工作。桂林的特察里，最初设在文昌门城墙外，后来在一九三八年被日机轰炸焚烧殆尽，搬迁至东江下关文家园，并建了四排新妓馆和一间大酒家取名“合记”。可是到了一九四四年九月，桂林被日寇沦陷前，又被国民党军队以拆除障碍物为名，先洗劫一番，然后全部烧光。抗战胜利后，虽重在原地建立妓馆、酒家，但已大不如前，非常简陋。柳州的特察里则设在柳荫路，南宁的特察里，最先设在西关路铁桥对面，但后来遭敌机轰炸焚毁，被迫改设在水上的花艇。梧州则一贯设在水面上的花排。另有平乐、全州、百色、宜山、贺县八步等十多个较大的县城，也设有特察

里。笔者长期在桂林工作，故对桂林市的特察里情况略为清楚，现将实况分述如下。

一、特察里的设立和妓馆的情况

桂林自成立特察里以来，由于这种出卖肉体的丑业，是最有利可图，因此，为桂系头子白崇禧的胞兄白崇勋（又名佐庭，人称白大老爷）所垂涎，出面组织了一间花捐公司（名称已记不起），向伪市府申请承包特察里的花捐。当然任何一位市长都不敢得罪于赫赫有名的白崇禧胞兄，否则，乌纱帽就难以保住，何况白大老爷还肯先拿出一点钱来承包，所以都乐得拍白大人的马屁，批准由他组织的公司出面承包。故多年来，桂林的花捐都由白崇勋所包揽，谁也不敢和他争夺这块肥肉。这位白大老爷是一个昏庸无能的脓包，只知道有利可图和贪杯、玩乐，公司的一切大权都交由桂林市著名的花棍王竹之、卢子久等来管理。这批家伙，平日就狐假虎威，恃势凌人，甚至帮助那些鸨公鸨婆来欺压妓女，无恶不作。当时特察里的妓女分为两种，一为堂班（内区分南词班）、一为窑班。他们虽然都是被迫出卖肉体，但其中还有很大区别。特察里内有四条街，靠东两条是堂班，靠西的两条是窑班。所谓窑班，就是最低等、下贱的妓女，不管任何人，都可以去打茶围，看中了那个妓女，马上就可以到花捐公司购买宿票，便可以同这个妓女过夜。一般到窑班寻乐的，大多数是劳动大众和士兵、店员等人。堂班也同样可以打茶围，但不可能象窑班那样立刻购买宿票过夜，必须在妓馆内先花一笔钱请客做“花头”，摆设酒席宴请一批朋友来助庆，每

个陪饮的人都要在这间妓馆内叫“条子”，所谓“条子”就是叫妓女来陪饮和敲锣打鼓的唱曲，热闹一番（当时每张条子约要伪法币十元）。假如这个做“花头”请来的朋友不叫“条子”，那就由这个做“花头”的出钱全部包下来。经过一番手续后，妓馆老板才同意这个“花头”和他所看中的这个妓女同宿过夜，这样一来最少得花上伪法币万元以上，这就叫做“铺堂”，经过“铺堂”之后，再到这个妓馆来，就受到欢迎，妓女就会热情的接待你了。当时到堂班寻乐的，一般普通人是不敢问津，即使过其门也不敢入去，只有那些富豪的资本家、少老板、豪绅、大地主和国民党的中、上级军政人员，才有钱去堂班买醉和“铺堂”。还有一种是要用很昂贵的代价才能达到目的，堂班里养有一些雏妓，到了十六岁，身体发育差不多成熟，鸨婆们就把她们当作摇钱树，替她寻找“大老爷”（这种大老爷，不是做官的那种大老爷，而是将这雏妓的处女之身出卖给出得起高价的嫖客，享受头三晚的初度权利，因而在花丛中称这种人为“大老爷”），往往要花上儿两黄金和大摆酒席，才能享受头三晚权利，如发现这个雏妓已不是处女之身，则需要退还原身价，并由妓馆请酒陪礼。所以鸨婆们平时对这些雏妓管得十分严，稍为动一动，就会遭到辱骂和鞭笞，并且随时都有人监视这些雏妓的行动，因为鸨婆想在她们处女之身，先捞回一大笔钱，然后再公开接客，继续替她们赚钱。在桂林特察里的妓女，不论堂班和窑班，百分之九十五是湖南人，而以宝庆、邵阳一带的居多。南词班则以江西籍的较多，桂林的寥寥几个，如较有名的歌妓“小燕红”就是其中的一个。南京籍的歌女也有一个叫“雪艳”她不是卖身的，抗战时间逃到了桂

林，因生活无着迫得得到特察里“钟记”妓馆搭班，后来从良嫁给桂林中国国货公司的一个职员。桂林特察里最旺盛的时候是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四年可以说是黄金时代，那时是在东江下关义家园（又名臭水塘）。窑班约有六十家左右堂班约有三十家左右，妓女总数约一千五百人左右。在窑班与堂班的分界线中，由商人投资兴建了一座“合记酒楼”专供客人呼叫歌妓陪酒唱曲，生意十分兴旺。堂班以“钟记”、“合记”、“春记”等最出名，拥有名歌妓“燕燕”、“小艳红”、“花宝”、“小燕”、“青山”、“佩青”、“宝钗”、“雪艳”、“小玉”等三十多人，故每晚都灯红酒绿，不少花花公子、阔商，国民党伪军政人员，流连于这些烟花场中，乐而忘返。桂林代理美商美孚石油公司的经理陈洪泰，就在妓馆纳了一个妓女为妾。代理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的桂昌行经理陈秀民和桂林中国银行营业主任曹尔龙等，每晚都必到他们所热恋的妓女家，狂欢尽兴，他们挥金如土，故鸨母和妓女都视他们如财神，尽情献媚，生怕得罪了这些财神爷。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二年，特察里地区出现了一位“花花太岁”，此人当时官职虽不高，但权力可不小，加之他又是“洪帮大爷”，所以谁都怕他几分，让他几分，他就是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的副官主任陈寿筠（桂林人，抗战胜利后，任伪桂林市银行经理）。他仗着是白崇禧的亲信，有恃无恐，手上既有武力，又有金钱，因而每晚必至特察里寻欢。我记得有一次，一名歌妓（名字已记不起）因冒犯了这位“陈大人”的尊严，陈大发雷霆，把驻在东江区独二团的一个连调来，把整个特察里包围得水泄不通，吓得那些妓馆馆主，纷纷前来叩头赔罪，重责这个妓女，让陈消气息怒。当

时警察局得知陈调兵包围特察里，这明明是违法乱纪，胡作非为的举动，但由于畏惧陈的势力，怕得罪于他，所以不敢出面干涉，只由我和特察里警所所长赵虎城出来劝解，我又以朋友的资格相劝于他，我说：“你现在的威风已出够了、面子也有了、就应当适可而止、收手了，继续这样做下去，万一被省主席黄旭初知道，恐怕对你也不利，特别是你的爱人知道，更会和你大吵大闹，反而不好”。我这番话很有作用，于是陈在发泄了一顿威风之后，便看风驶舵，把这连兵撤走了，才算平息这件事。这种欺压妓女之事，在当时是家常便饭，不过程度上有大小不同而已。

二、娼妓检治所之设立

特察里是一个性病繁殖、传染的场所，特别是窑班有些妓女、每晚接客高达七、八次之多，因此，性病的传播是很快的。伪政府鉴于这种情况，在一九三九年即成立娼妓检治所。所里设有主任、医师、护士等人，负责检查和治疗患有性病的妓女，规定每星期轮流检查各妓女，如发现患有性病，立即勒令停止接客给予治疗。从表面上看，好象对那些妓女还有点人道主义，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而是给那些娼妓检治所的官老爷开辟了一条生财之道，他们利用这种检验的特权，一方面可以收入一批检验费和医疗费，更重要是可以利用职权限制妓女接客，向妓女进行敲榨，特察里的妓馆老板对检治所的老爷们视如太上皇，因为窑班的妓女百分之百，都患有程度不同的性病，堂班的妓女虽然不是百分之百，但最低限度也有百分之七十患有不同程度的性病的妓女。

按条例规定，凡检验患有性病的妓女，一律禁止接客，勒令治疗，候治愈后才准复业。因而妓馆的老板们，不得不向检治所的人行贿、送礼，以使患有性病的妓女也能继续接客。这种检治所不仅未能防止性病传染，相反欺骗了人们，使人误信那些妓女，是经过政府检验、治疗，比较可靠，从而更加麻痹大意，致造成不少嫖客染上各种不同的性病，影响健康。可以说到过“大鸡笼”（人们称特察里为大鸡笼）、特别是到窑班寻花问柳的，无一幸免。由于这种检治所徒有虚名，反而害人不浅，所以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特察里恢复时，在人们的反对下，伪政府已不敢再恢复这种误人的检治所了。

三、特察里内的烟、赌活动情况

俗话说“烟、赌、娼是三位一体”有密切联系的，虽然解放前国民党桂系当局也曾一度制定和颁发了“禁烟惩治条例”，“禁赌治罪条例”但这仅是表面的工作，阳奉阴违的大有其人，特别是那些有权有势的国民党部分军政人员，更加猖獗。特察里是公开卖淫的场所，自然免不了还要秘密设有鸦片烟局，尤其是“花捐公司”的几个著名花棍王竹之、卢子久等都是些烟瘾很大的烟客，所以妓馆也暗中设有烟局，并且用妓女代为陪伴和打荷，以广招徕。我记得在一九三九年初，我当时是警总局的一个外事科员，和一个杨督察员，到特察里内，巡视，经过堂班“合记”妓馆时，闻到有鸦片烟气味，当时我们都是年轻人，没有经验，更不懂得要有局长的手令，才能执行逮捕工作，凭着一时的勇气，拔出手枪、冲上楼去，把在场吸毒的烟犯和妓女与烟具全部捉获。当时特察里警所

所长赵虎城也闻声赶来，看见我们两个冒失鬼、感觉头痛，因为这些秘密烟窟都是在他们的包庇收了保护费之下开设的。因为我们两个是警总局的警官，又不好把我们捉到的烟犯立刻释放。他是一个老奸巨滑的家伙，他首先板起面孔，威吓的问我们，“有没有局长的手令”？为什么不通知警察所就擅自逮捕？由于我们是初生之犊，缺少经验，被他一吓，反而内心有点惊慌起来，还误认我们这样做，太过鲁莽，违犯了纪律，因而不敢坚持要把这些烟犯带回警局处理，相反还央求他就地解决。他就假惺惺的叫人把几个烟犯带回警所写了悔过书了事（按当时广西的禁烟治罪条例，是要解送法院法办的）。赵虎城心里也害怕我们回去向局长汇报。于是请我们在特察里妓馆内吃了一顿花酒，算是皆大欢喜。至于赌博方面，虽然没有直接在特察里妓馆内公开赌博，但在特察里旁的文家园附近则设有秘密的大赌窟、专供一些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引诱一些有钱的嫖客到那里赌博。这就是过去桂林（一九四〇年）一度闻名的“亚庐”（亚庐是国民党广西省党部秘书邓亚雄的住宅，他利用他的职务和与当时的伪市长兼警局长陈恩元有同乡、亲戚关系来掩护，开设这间大型赌窟，牟取暴利），这座赌窟内，设有各种赌具、和高级酒席，还可叫妓女来陪伴取乐。虽然秘密开设，但由于有市府和警局的包庇，他们还是明目张胆，大干起来，赌场生意十分旺盛，每天赌徒达七、八十人之多。抽头的收入极其可观，获利不少。当时，有些群众对这个罪恶地方，极为痛恨，纷纷向市长兼警局长陈恩元检举揭发，而陈并不命令破获，只叫人通知邓亚雄收敛一些。可是邓亚雄由于财迷了心，不肯收手，还是照样干下去。结果，群众忍无可

忍、向伪省府民政厅长邱昌渭（邱是广西禁赌最坚决的一个，曾亲自主持破获白崇禧堂弟白老九在临桂县会仙圩的大赌窟）揭发。邱接到密报后，知道如果把这些密报发交市府、警局去办理，就等于让他们去通风报信，毫无作用，于是他秘密派民厅三科科长余立铭主持破案工作，事前派民厅科员吴掀化装，扮作嫖客混入赌场内，侦查全部情况，并绘就地形的详图，以便围捕。在一切准备就绪后，由邱昌渭亲自主持布置破案行动。在执行破获的当天上午十一时，由邱昌渭直接命令我（当时我是警局警探长）和东江分局长苏乐民调动大批便衣警察和省府卫上队的武装士兵一百多人到七星岩前集合候令。当时我接到命令，也不敢向局长报告（因规定不准向局长汇报，以免走漏风声），也不知究竟执行什么任务。等到各部分队伍都齐集后，民厅科长余立铭才宣读伪主席黄旭初的密令，要我们立刻去破获“亚庐”这个大赌窟，并且由民厅三科全体人员随同监视我们队伍出发，以防走漏消息，经过悄悄的绕道到龙隐岩附近，首先突袭了这个赌窟派出的两个瞭望哨，然后迅速将“亚庐”全部包围得水泄不通，破门而入，当场将全部赌徒六十八人捕获，并收缴了大批赌具和赌资。所捕获的赌徒当中，有伪广西绥署少将、上校等高级军官刘照台等多人，大部份是有钱的商人和妓女，于是连窝主邓亚雄一起解送到东江分局扣押，连夜由省府派李鹏咨议前来拍照。当时这间大赌窟被破获轰动了全市，大快人心。而市长兼局长陈恩元知道后，很不高兴，认为邱昌渭太丢他的面子，不通过他，而直接命令执行；也责备我和苏乐民不该不向他报告，而直接听从邱昌渭的指挥，目无直接的领导长官，使我颇感为难。最后这件大赌窟案，分两部分

处理：所有现职军官，均由绥署命令撤职。并各罚款伍百元（禁赌条例罚金最高的数目）；至于文职人员则由省府命令撤职，也各罚款四百至五百元不等。商人，妓女则由东江分局处理，以各罚款三至五百元。窝主邓亚雄也由省党部命令撤职，并加倍从重罚款一千元。这个特察里地区的警察所长赵虎城，有包庇嫌疑，由省府明令撤职查办，至这件赌窟破获后，特察里内虽然暗中有小赌博，但已不敢象“亚庐”这样猖獗了。

四、警察局怎样控制特察里

特察里是一个藏垢纳污场所，任何人都可以进去买醉寻欢，这是一个最复杂、问题也最多的地方，特别到窑班去寻乐的，更为复杂，有士兵、伤兵、苦力工人、店员、小偷、盗匪、帮会分子，地痞流氓等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每天发生的案件为数不少，尤以争风、吃醋、斗殴更是家常便饭。因此地方治安当局必须严密控制这个地区，除了专门设有警察所（一九四七年，扩大改为下关分局）专责管理外，还由刑警队派有一个组，长驻在内，负责侦缉员如刘坤庭、罗辉、黎锦辉、骆庆穗（兼街长），文武斌等多人，都是最熟识各妓馆情况的，这些侦缉员为了能够对特察里的情况了如指掌，还利用一些妓馆老板（包括鸨公、鸨婆）做“驳脚”，提供情报，他们互相勾结，互相利用，订有默契，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点：①凡在妓馆内发现有来历不明、可疑的人，妓馆负责向他们汇报。②凡是警局有通知给妓馆嘱咐注意的案件，妓馆负责向所有妓女传达，协助侦查。③凡有妓女私逃，这些

侦缉员负责代为追截回来。由于有了这种默契，警察局是收到一点效果。例如，一九四一年间发生伪主席黄旭初木龙洞公馆旁的防空洞内，被盗去贵重衣物的惊人案件，就是在特察里妓女（已忘记名字）的帮助和提供线索下破案起赃的（这件案的真相，另专文写出）。此外，警局每年都召集所有妓女训一、二次话，勉励她们要注意了解那些可疑的嫖客，提供线索，这种做法，往往也收到一点效用。在一九四七年，由于特察里发生了一件爆炸事件。死伤多人（内容下面续写），为了加强防范起见，在特察里周围，用木柱建造了一排围墙，把整个特察里妓馆都围在内。不通过有警察把守的两道木栅，就无法进入去，到了晚上十一时在特察里玩的游人，如果不买宿票留宿，则一律驱走，由值班警察把木栅锁上，禁止出入，严若“鸡笼”一样。所以称特察里为“大鸡笼。”此外，反动政府对特察里的妓女，曾给予人格上很大侮辱，规定她们离开“特察里这个特区，到市内街上时，一律要在胸前佩带一朵襟花”（堂班和窑班的颜色不同，堂班是粉红色，窑班是深红色），以资识别，免至和良家妇女渔目混珠，分别不出。如果妓女上街，不按照规定佩戴，一经发觉，就被处罚。可见旧社会的妓女是何等受压迫和凌辱。

五、特察里内发生过的几件重大事件

①一九四二年，伪省府主席办公室（特务组织）也常派特务梁定远（又名梁琼，当时是科员，后升参议）混入特察里内搜集各方面的情报，而梁则利用职务的方便，经常出

入特察里各妓馆，横行霸道。有一天，梁定远侦知窑班一间妓馆内，开设有鸦片烟局，他认为这是一次发财的机会，于是他不通知当地的警察所。单人匹马闯入去，拔枪捉拿吸烟的人，乘机敲诈五百元巨款，当时这间妓馆的老板曾某（已忘记名字）不认识梁是省府的特务，误认为一般流氓，籍机来敲诈勒索的，竟反扑过去，企图夺去梁手上的手枪。可是梁见势不佳，竟开枪将曾某的左腿击伤倒地。梁见枪伤了人，也慌张起来，急欲夺门逃走，但由于枪声一响，群众和察警已赶来阻拦，缴去梁的手枪，把梁拘回警所。梁到了警所，见到秦所长就暴跳如雷，把身上的省府“密查证”掏出来，威吓所长妨碍他的公务，他还含血喷人，说他追捕一名共党嫌疑犯进入妓馆，被曾某拦阻，放跑了，为了自卫起见，他不得不开枪将曾某击伤。由于梁是省府的特务，警察所长害怕起来，马上打电话向警局长马启邦请示办理。而马也不敢得罪省府主席办公室的特务，立刻打电话给主席办公室负责人梁学基（特务头子）汇报这件事。洽商处理办法，而梁学基为了包庇他的部下违法行为，顶硬说是他派梁定远到特察里去追捕一名共党嫌疑犯，曾某阻拦梁定远执行任务，被击伤是罪有应得与梁定远无关，并要警局立即把梁定远释放，发还所缴去的手枪。马启邦也只得照办，命令警所放梁定远回去，当时特察里的群众都替伤者鸣不平，纷纷指责警察所，不能释放凶手，要依法送到法院审判。但是警察局也只听从特务组织的指示，压制群众，反而警告伤者家属不要闹事，以免特务组织追究曾某掩护纵放共党嫌疑犯的罪名。在扣上这个重大罪名的威吓下，伤着也只能自认倒霉，不敢再吭声，这就是当时特务籍机勒索，枪伤的重大事件真

相。②一九四一年间，由于国民党中央银行总行从重庆雇用了一架飞机，满载当时流通使用的“关金券”到长沙经过湖南道县附近，因天气关系，机毁人亡，（飞机没有焚烧），所运载的全部“关金券”被当地群众掳去。于是重庆中央银行通报各地分行注意查访飞机失事所遗失的关金券的钞票号码，各地警局也接到通知查访这些钞票。有一天，警局司法科长郭凤玉（吉林省人，当时的警局长马启邦的结拜兄弟）接到特察里的一个妓馆（堂班钟记）的报告，发现两位新从湖南来的不速之客，到妓馆寻欢，在妓女面前拿出一叠一叠的新“关金券”在妓女面前炫耀自己的阔绰，这两个人来历不明，十分可疑，并把这两位嫖客拿出来用的“关金券”一张交给郭凤玉。于是郭马上把这张钞票送到桂林中央银行查验，核对正是飞机失事所丢失的关金券的号码中的一张钞票，郭获得银行鉴定结果后，便立即和局长马启邦、主任秘书林序密商，认为正是他们发一笔大横财的机会到来了，切不可放过这个大好时机。但考虑到突然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是会打草惊蛇，决定设下一个圈套，使这两个人堕入其中，由郭凤玉乔装改扮为商人，混到妓女馆内和这两位嫖客相熟，然后籍机邀他们赌博，趁赌钱的时候由我率领便衣警察，以他们犯有赌博的罪名逮捕回来。在一切布局就绪以后，这两个嫖客果然上钩，正在郭和这两个人及几个妓女赌卜克的时候，我奉局长命令把他们全部逮捕回来（包括郭凤玉在内），但妓女则暗中释放了。这两位嫖客被逮捕回来，还满以为犯一点赌博，了不起罚几个钱，满不在乎，怎知道不一会，郭凤玉身穿起全付警官衣服，坐在法庭上提审，这两个人见郭是堂堂的法官，吓了一跳，知道事情不简

单。郭便追问他们的关金券是从那里得来的，迫他们供认，迫他们供出收藏关金券的秘密地点，从而全部起赃回来和局长马启邦等私自吞没、分肥。但这两个人只供认是在湖南道县附近，以低价向当地农民购买了少量关金券，坚不承认是他们直接在失事飞机上掳得的。当时郭还不相信这两个家伙的供认，马上采取“吊飞机”的肉刑，强迫他们供出从飞机残骸所掳得的关金券隐藏在什么地方，可是肉刑用过，他们还是供不出收藏地点，几经对他们施用肉刑，还是没有结果，最后，只得放弃这个发一大笔横财的机会。这两个倒霉鬼，因误买了几叠关金券，却遭来了一场横祸，差不多连性命都丢了，以后这件事盛传于桂林，最后省府民政厅长朱朝森知道郭风玉身为司法科长，为了想发横财，设下陷阱陷害无辜的老百姓，下令把郭免职，以平舆论。③国民党的伤兵，大多教是目无法纪，横行霸道，特别是强买强卖，更是他们本色，到妓馆寻乐、打茶围，也常常不付钱，因而妓女都讨厌这些跛手跛脚的家伙，鄙视他们。不愿接待他们，但又怕他们无理取闹，寻机挑衅报复，不敢当面得罪他们，地方当局对这些伤兵也感觉头痛，无可奈何，这样更加助长了这些伤兵的嚣张气焰，不断发生闹事，扰乱治安。一九四七年初桂林特察里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市的爆炸案件，地点就在窑班妓馆的街上，这天下午八时许，一群九十三伤兵医院的伤兵到妓馆寻乐，由于这个妓女已接有客人，而这些伤兵强迫这个妓女接待他们，因而引起争吵，发生斗殴，其中一个姓王的伤兵（已记不起名字）竟暗中将其挟带的一枚手榴弹拉燃丢向人丛中，致当场炸死两人，炸伤三人，这是桂林市从未有过的重大事件。我当时是警局长，闻讯后赶到现场，并

立即封锁了整个特察里，进行搜捕，可是凶犯已逃跑。由于这件爆炸事件十分严重，影响治安很大，省府下令限期破案，群众亦纷纷要求破案。在刑警队的努力下终于把在逃的伤兵王某（主犯）从丽泽门外九十三伤兵医院附近捉回来，经特察里的妓女指认，确系其投掷手榴弹，造成惨案。马上由警局解送到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审判，过了三天，省保部即将这位主凶王某提解到特察里，在造成血案的地方，宣判死刑，立即执行枪决，以儆效尤。经这次镇压，杀了这个伤兵后，特察里才安然无事，人心才安定下来。

（写于八一年三月十二日）

桂北军政区和平改编前后

蒋道宽

一九四九年十月，白崇禧的主力部队在衡宝战役被解放军歼灭后，为了确保其广西反动老巢，将广西全省划分为桂东、桂西、桂南、桂北、桂中、粤桂边区，黔桂边区等七个军政区，每个军政区统辖两个行政专区。除每个军政区配属一个正规师外，并颁给“广西反共救国军”一个新编军的番号，由军政区司令官兼任军长。其兵源：以所属各县原有的地方团队为基干，根据“总体战方案”，发动了一个“一甲一兵一枪”运动。即每一甲抽壮丁一人，买枪一枝编组成立。并由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组成若干个总体战督导团（每个专区一个），分别派赴各行政专区监督实施。各县如推行不力，督导团有权撤换县长。新编军的编组原则是：每个行政专区成立一个新编师，师长由专员兼任。每个县原则上是将原有的自卫总队及按“一甲一兵一枪”运动所征集的人枪合并编成一个团，由县长兼任团长。大县如能编成两个团以上，可编成旅，由县长兼任旅长。并限期编组成立。

桂北军政区司令部于一九四九年九月中旬在桂林组织成立。司令官周祖晃，副司令官兼参谋长龙炎武（十月上旬龙炎武调任第三兵团参谋长），原第三兵团参谋长霍冠南，调任军政区参谋长，秘书长马炯，司令部分设军务、政务、总务三

个处，军务处处长蒋道宽，政务处处长徐葆森，总务处处长高鹏，后因高鹏久未到职，改派上校参议唐友鹤代理总务处处长。直属部队有一个警卫营和一个通信队。

桂北军政区统辖两个行政专区。兴安的第八专区，专员蒋雄，所属为临桂、永福、兴安、全县、灌阳、资源、灵川、义宁等八个县。融县长安的第十五专区，专员蒋晃，所属为融县、三江、罗城、龙胜、百寿、中渡等六个县。另外，桂林警备司令部及所属部队，桂北纵队，桂林市政府及该市自卫总队，广西省会警察局及其所属警察部队等，均归桂北军政区指挥（桂林警备司令兼桂北纵队司令莫敌，副司令马谨民；桂林市长韦瑞霖；广西省会警察局长谢凤年）。

桂林军政区成立后，即着手于编组广西反共救国新编第十三军，周祖晃兼军长，辖三个师。第八专区所属各县合编为新编第三十七师，蒋雄兼师长，第十五专区所属各县合编为第三十八师，蒋晃兼师长；桂林警备司令部所属部队及桂北纵队（临桂县自卫总队也合并该师）合编为新编第三十九师，莫敌兼师长；桂林市自卫总队及广西省会警察部队编为直属独立第一团，韦瑞霖兼团长。后来军政区撤到百寿以后，又将百寿县团队编为直属独立第二团，百寿县县长胡奇兼任团长。后因解放战争迅速逼近，各部尚未及编成，即仓促撤退。

桂北军政区在桂林最初策定的作战计划大致是解放军进入广西后，新编第三十七师应以兴安、灌阳境内之大瑶山区为东地区根据地；新编第三十九师以永福县属从化山区为西地区根据地，开展游击作战，相机袭扰湘桂沿线城镇，切断桂柳交通线，以策应邕柳主力作战。新编第三十八师应在该专区辖境内，建立游击根据地，严密控制湘桂水陆通道。各

专区所属各县，应坚壁清野，留置一部份地方部队，在所辖县境内不断袭扰解放军，策应各县主力作战，使解放军不能在县辖境内安然立足。军政区直属部队及独立第一团在百寿附近山区建立根据地，支援各地区作战。必要时，转移至中渡县属四十八崙山区，指挥桂北辖境内游击作战。

作战计划策定后，曾派出两个侦查小组分赴东西两地区侦查兵要地理，后因形势急速变化，这两个小组均未完成任务归来。同时，为了尔后进入四十八崙山区预作准备，派参议马××前往中渡县邀该县地主恶霸覃正旺到百寿面授机宜。但后来覃正旺到达百寿时，军政区已决定起义，周祖晃赠送给覃正旺银元三百元，送他回中渡。

军政区在桂林尚未部署就绪，十一月二十一日晚突然接到桂林警备司令莫敌电话报告，前方部队已纷纷经桂林南撤，桂林警备部队决定于二十二日拂晓前全部撤往永福从化山区。军政区接电话后，当即通知各直属部队及桂林市长韦瑞霖，着于二十二日清晨率部撤出桂林，经两江圩至山口村附近集结待命。并电令八区专员蒋雄率领所部随军政区司令部撤往百寿。

十一月二十二日清晨撤出桂林时，秩序非常混乱，军政区大宗械弹器材虽已先期运往两江，但剩余物资因缺乏运输力量，最后一批由我率领，于上午十一时许，已听到北门外枪声时才仓卒撤出。到达两江后，因进入百寿山路崎岖，既不通车，又找不到人力搬运（数日前五十六军马拨萃部路经两江时，到处拉夫，以至附近圩镇村庄老百姓已逃避一空），所有运到两江的械弹器材无法运走。当时，周祖晃指示：除留蒋雄率所部驻守山口里旺一线，对桂林方向严密监视外，

司令部及其他部队继续开往百寿待命；运不走的械弹器材，暂交当时驻在山口的四县联防办事处主任李松龄负责保存，并设法继续运往百寿。

由于撤退仓卒，到达百寿地区的部队计有：第八专区专员蒋雄率领的保安第八团及沿途收容由湖南溃散下来的官兵所编成的一个团；灵川县长李崇韬率领的灵川县自卫总队的一部；桂林市长韦瑞霖的独立第一团（由广西省会警察部队及桂林市自卫总队编成）；军政区司令部及直属部队。到达百寿后陆续到达的还有：一七二师师长刘维楷率领的该师师部及该师梁耀新团的一部，该师的另一个团（原保安第六团）当时驻在保安圩。同时，桂林警备司令莫敌由永福从化来电报告，桂林警备司令部所属部队及桂北纵队已全部到达从化山区集结待命。此外，临桂县长阳焕明率领该县自卫总队也撤到从化，编入莫敌的新编第三十九师。

长安的第十五专区自军政区撤出桂林后，始终没有和军政区取得电讯联络，该部情况不明。十二月上旬，该区保安副司令莫超人率领官兵二十余人，携带一部分武器，由融县长安到达百寿，据说，长安已于十一月下旬（确切日期已不能记忆）未经战斗被解放军占领，专员蒋晃率领一个连逃出长安，未明去向。十二月九日，蒋晃带了一个排的警卫人员到达百寿。

由于战局的急剧变化，撤离桂林时一片混乱，原订作战计划已被打乱。到达百寿后调整部署如下：一、电令莫敌将桂林警备司令部所属部队，桂北纵队及临桂县自卫总队编为三个团，组成新编第三十九师，以从化山区为根据地，严密监视桂柳线解放军之行动。二、令蒋雄就现有部队编成两个

团，组成新编第三十七师（缺一团），驻守里旺至山口一线，对桂林方向严密警戒，并封锁通向桂林的大小路口。

三、一七二师刘维楷所部，除驻保安的原保安第六团仍在原地严密监视桂林方向外，并对三江、融县方向加强警戒；师部及梁耀新团归军政区司令部直接指挥，担任百寿城区之防守。四、韦瑞霖的独立第一团，随司令部驻东岸。到十一月底司令部将蒋雄所部调驻保安一带，改派韦瑞霖率部驻守里旺至金竹坳一线，对两江方向严密监视，并加强对苏桥方向之警戒。五、命百寿县长胡奇，将该县自卫总队及各区常备队编成直属独立第二团，确保全县之安全。

在撤离桂林时，周祖晃鉴于战局急剧变化，军政区临时拼凑建立，部队分散各地，不易集结，战斗力太差，同时，深感国民党腐败残暴，民怨沸腾，其垮台已成定局，因此，对形势作了周密估计后，决定作两手准备，在撤离桂林时，留下省府参议龙××（桂林中山北路中北旅馆经理，名已不能记忆）、在桂林观察解放军入城后动向，预为起义作准备；另一方面，派参议马××前往中渡县找当地地主恶霸覃正旺到百寿策划，今后万一受到解放军压力，预为尔后转移到四十八岸预作打算。故撤到百寿以后，只作消极防御部署。

撤到百寿不久，大约十一月二十六日左右，龙××由桂林派人送信给周祖晃，汇报了解放军入城后，纪律严明，爱护民众等情况，周祖晃遂决心向人民靠拢，派参谋长霍冠南到桂林与解放军接触，为准备和平改编作试探。霍冠南大约到十一月二十七、八日左右离开百寿，当时，这一行动除军务处长蒋道宽，第八督导团团长刘莘野和驻里旺的独立第一

团团长韦瑞霖等人知道外，仍一律保密。表面上只是宣称派参谋长前往里旺、山口一带视察防务。霍冠南到达桂林与解放军代表取得联系，并初步商定了和平改编协定草案，派人送回百寿清审议答复。周祖晃当即召集在百寿的秘书长马炯、军务处长蒋道宽、政务处长徐葆森、一七二师师长刘维楷、第八督导团长刘莘野等开会研究，并征询意见。会议结果，原则上接受了协定草案全部内容，但对改编后所有军政人员及家属的安全问题，一致表示关切，要求在正式签订协定时，必须在协定上提出对改编人员一律不咎既往的明确保证。决定后，周祖晃复信并加派徐葆森到山口会同霍冠南代表军政区全体官兵前往桂林与解放军第十三兵团正式签订和平改编协定。十二月六日左右，霍冠南由桂林带回已签订的和平改编协定正式文本。周祖晃遂召集司令部负责人于十二月八日在百寿开会。会上，周祖晃正式宣布，决心接受解放军和平改编，并宣读了与解放军第十三兵团所签订的和平改编协定全文。当时，出席会议的人员虽然都感到突然，但无人提出异议。周祖晃遂即规定各部队从十二月十二日起，开始按协定规定的路线开赴指定地区集结，听候改编。并强调各种部队必须采取严密的安全措施，防止破坏协定及违犯纪律的情事发生。同时，决定由必要的参谋人员和电台及译电人员组成前进指挥所，由军务处长蒋道宽率领随司令官周祖晃于十二月十日推进至里旺，司令部及直属部队仍在百寿待命。十二月十一日，周祖晃在里旺召集各部队长开会，讨论接受人民解放军和平改编问题。

在准备和平改编会议当中，十二月八日上午接到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特急电令，内容的大意是：一、美国盟军同意

给予紧急军援五个师的全部装备。二、着桂西、桂北两军政区迅即各征集壮丁二万五千人，待命开赴指定地区集中装备训练。三、发给两军政区各银元×万元，弹药××万发（确数已记忆不清）着即选定空投场所，并将空投场图上位置及地面标志电复，以便派机空投。我将电文送给周祖晃后，周当即指示，既已决定改编，此电可不予置理。

十二月十日，军政区前进指挥所推进到达里旺后，周祖晃发出了三封电报，其中两封是发给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和副长官夏威的告别电，内容大意是：因大势所迫，为不使地方遭受战争破坏，决定效法北平傅作义将军接受解放军和平改编，特电告别，并祈鉴谅。另一电致莫敌，告以决心率部改编，以免地方遭受战争破坏，“兄如亦愿共同行动，希电复，以便代向解放军商谈”。电发出后，莫敌竟拒绝收报，并通过其电台，对周祖晃横加指责。因之，军政区与莫敌之间的电讯联络就此中断。

十二月十一日早，无线电报话台报告，华中军政长官公署请周祖晃通话，我去接话时，对方电台说，白崇禧要与周祖晃亲自通话，我即向周祖晃报告，周拒绝通话，在对方电台一再催促下，虽然我一再劝说，周始终拒绝与白崇禧通话，我只好命电台切断与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电台的电讯联系。

十二日上午蒋雄在电话中报告，由零散官兵编成的那个团已获知改编消息，出现不稳现象，已有少数官兵自行离开部队，请示如何处理，我向周祖晃请示后，由电话答复蒋雄：应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将该团武器收缴，该团官兵不愿留者，让其离去，以免激起事端波及其他部队。后来听蒋雄

说，据传闻，这个团的一部分官兵，曾密谋于十二日在百寿与里旺间的三大炮（地名）的山隘，拦劫军政区司令部，因司令部已提前于十一日由百寿到达里旺与前进指挥所会合，致使该项密谋未能得逞。

十二月十三日，桂北军政区所属各部队均遵照和平改编协定分别开赴指定地点集结，听候改编。军政区司令部和直属部队及韦瑞霖所部于十三日到达两江，宿营于两江旧村（俗称两江城）和古定村一代。当晚，两江士绅以保卫地方为由，要求周祖晃（周系两江人）留一部份武器给地方。周一方面命警卫营长陈寿龄抽出轻机枪两挺，步枪十余枝，并配备弹药，准备留交地方领用。另一方面把我找去，征询我的意见，我当时对周说，我们既与解放军签订了和平改编协定，如果私自把武器留给地方，万一以后闹出事来，对解放军不好交代，我的意见还是不留为宜。周采纳了我的意见，没有把这批武器留下来。

到达两江后，按照和平改编协定的规定，司令部武装及所属各部武装陆续交给解放军改编。军政区司令部及直属部队的一部共官兵二百人，由解放军第一四七师师长郑贵卿派汽车送到桂林，驻桂林文昌门外忠烈祠解放军第四十九军解放团驻地（这时，解放军第十三兵团已去南宁，由解放军四十九军军长钟伟负责处理改编事宜）。到达桂林的第二天，钟伟军长在桂林中山中路太平酒家举行宴会，招待桂北军政区团长以上军政人员。席间，钟伟军长告知周祖晃，永福从化地区的莫敌所部，尚在玩抗，由于周祖晃已靠拢人民，所以解放军尚未大举进剿，希望周祖晃设法通知莫敌要他停止抵抗，接受改编。当时周祖晃问我是否有办法与莫敌取得连

络，我即向钟军长请示，我们是否可以开设电台，钟军长作了肯定的答复，我即离席回到驻地，命通信队架设电台呼叫莫台，叫通莫台后，即电劝莫敌停止抵抗，接受改编，莫仍拒绝收报，并肆意漫骂，至此，与莫的电台最后终断了电讯联系。

十二月下旬，各部队改编完毕，所有改编军政人员均在桂林集中，参加学习，编为广西军政大学第六大队。校级以上编为第一中队，驻中山北路中北旅馆；尉级编为第二、三、四等三个中队，驻文昌门外逸仙中学。至此桂北军政区遂告最终结束。

还有一点补充：一九五〇年元月中旬左行，解放军四十九军军长钟伟告知周祖晃，莫敌已率领一部分部队向解放军投诚。另一部跟随莫的副司令马谨民仍拒不投诚，继续在山区对抗解放军，莫敌投诚后在罗锦圩，态度消极，不愿到桂林来。钟伟军长希望周祖晃派人劝说他来桂，并告诉他：他投诚时曾向解放军提出要求，在部队改编后准许他到香港去医病，现在上级已批准他的要求，解放军说话是算数的，要他不要顾虑。周祖晃当即派十五区专区专员蒋晃乘解放军汽车到罗锦圩将莫敌接到桂林，住在定桂门外他自己家里，大约半月后，钟军长到中北旅馆来告知，莫敌已去香港医病。

我从柳州、南宁到小 董溃逃亲历记

陆学藩

一、柳州撤退

一九四九年，新桂系为了搞假和平，作缓兵计，以延宕时间，争取美援，准备成立五个军。在柳州设立广西新兵训练处，派海竞强任处长，甘成斌任副处长，我任参谋长。

十一月二十日下午，白崇禧由桂林飞到柳州，住柳州河北中国银行（即现在之财政局），海竞强随行，其他李品仙、夏威、黄旭初亦到。因战况紧迫机场在南岸，恐浮桥中断，二十四日下午七时左右，白崇禧由柳北过柳南，到新兵训练处休息。原拟住一夜，因据鲁道源由三门江来电话，说三门江附近已发现解放军。并声明该兵团兵力单薄，他无法保障长官之安全。又据报西面解放军已越过柳城，先头部队已抵长塘，东面解放军已进出梧州，向玉林五属方向急进。柳州已在大包围中，柳州不能久留。大家劝白崇禧即离开柳州。夜十时左右，白崇禧离柳州飞南宁，海竞强随行。笔者也作离柳州准备，因家眷拖累，当夜是柳州解放之夜，人心浮动，浮桥被冲断，渡口汽车拥挤，交通困难，共产党地下

工作活跃。笔者因照顾家属过柳北，只用小艇渡河，这时柳州市仍万家灯火。我于当夜下半夜，即十一月二十五日凌晨，离开柳州，我率领之新兵训练处大汽车百余辆，到距柳州约三十公里处之六道，停车休息。隐约闻由柳州传来断断续续枪声，说明柳州已解放，我催车队向迁江急走。到迁江渡口，看到大小汽车约千多辆，拥挤不堪，维持渡口秩序、指挥渡河的人，是长官公署特务团团长邝斗。我优先渡河，渡了河，天已大亮，即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白天了，当天下午二时左右到南宁。南宁情况，已入战时状态，外驰内张，车辆拥塞街道，人心已浮动。

柳州等于不设防城市，没有什么战斗，白崇禧离柳后，鲁道源兵团，亦自动撤退。桂中军政区王景宋和柳州警备司令秦镇，没有抵抗，王景宋旋被俘，秦镇逃香港。王景宋被俘后，和笔者在宾阳新市场会合，后在清水河渡口（老虎渡）逃去香港，后病死台湾。

二、南宁溃逃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白崇禧由柳州飞南宁，住伪旧总部，逗留整十天，是他一生在大陆的最后十天，也是桂系统治广西最后的十天。这时李品仙、夏威、黄旭初，都随他到南宁。李、夏住总部，黄住民生路广西银行楼上。华中军政长官公署，代总统府，桂林绥靖公署、广西省政府，都集中到南宁。南宁中、小学校，一切公共场所，都住满人。街道上，大小汽车拥挤不堪，特别是洋关大道、凌铁村渡口，汽车塞满，交通阻塞，人心惶惶。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一日，美国参议员诺兰由香港飞南宁，目的是看看白崇禧在大陆的实际情况，能否仍在大陆上支持。当夜白崇禧和他会见，李品仙、夏威、海竞强参加会见。因会谈美援问题，笔者亦参加。诺兰说，美械装备已到香港。白崇禧告诉他说：战局演变已到不能在大陆立足的地步，决定退到海南岛，请他把美械装备改运海南岛，并请他于明（二）日离开南宁。他知道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已到不可挽回的绝境，当夜宿南宁总部内，第二天（二日）上午十时左右，坐自备飞机飞回香港。海竞强老婆李惠兰搭他的飞机到香港。笔者到机场送行，以后这批美械是否改运海南岛，就随着海南岛之解放而变化了，结果不明。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三日。解放大军西面到武鸣，向南宁前进，南面到玉林五属一带。张淦之第三兵团情况不明。柳州方面，解放军已越过迁江，南宁已在大包围圈内，人心浮动，大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概。白崇禧决定离开大陆，退到海南岛。二日上午，他派海竞强作先遣人员飞海南岛之海口，和陈济棠联系，要船到钦州附近龙门港，接运渡海部队，又派新兵训练处第一总队长陈炯到龙门港接收海船。令新兵训练处副处长甘成城和笔者负责率领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和其他一切后方部队及新兵训练处所属各部队到龙门港，上船渡海。但甘成城临时不走，改由笔者单独负责。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四日，武鸣、宾阳方面的解放军逐渐逼近南宁，南宁市人心浮动。西南各省逃难的都麋集南宁，乱到极点。一个特点是，大小汽车多，拥挤不堪，邕江亭子圩渡口，争先恐后的抢渡。白崇禧命令赶架浮桥，但架桥材料缓不济急。工兵司令部参谋长林柏生和工兵团团长某，都

到现场指挥架桥，但随架随流，总架不起。下午三时左右，白崇禧亲到渡口视察督促，笔者随同到河边，看到邕江河面宽，流速大，没有大型制式材料，实无法架成。架桥指挥官林柏生束手无策，白崇禧很着急。车辆拥挤，争先恐后地渡河，秩序很乱。大约四点多钟左右，笔者看到架桥无望，揣想战况已更加紧迫，劝白崇禧回总部，迅速离开南宁，他默然同意。南宁也等于不设防，这时也等于解放。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下午，白崇禧由凌铁村渡口督促架桥不成回总部后，鉴于情况之紧迫，于五时左右坐飞机离开南宁。在邕江渡口的最后时刻，他对他统治二十多年的广西，表示感慨万端。当我建议请他回总部迅速离开的时候，他低头长叹，离开渡口。临走时，一再回头，嘱笔者不要有其他想法，尽力设法率领后方部队，完成渡海任务，笔者唯唯答应。彼此都默然无别的话再说，他就离开渡口，笔者就这样和白最后诀别。后来，白崇禧于一九六六年在台湾病死，笔者在雏容农场改造，聆悉他的死讯，心实凄然。当时因改造未好，封建意识仍在，对白之死，感到悲伤，郁抑寡欢者数月。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下午约六时左右，南宁机场四架飞机起飞，在南宁上空环绕两匝，便向海南岛飞去，白崇禧离开南宁了，李品仙、夏威等同行。其余全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各处人员，大约二百人左右，四架飞机，在暮色苍茫中冉冉消逝，骑在人民头上的桂系也就一去不复返了。笔者当时因职务关系，不能置身于四架飞机之中，只有对空长叹。现在我得到改造，又蒙宽大，及安居大陆，以享天年，反而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了。当天下午七时左右，笔者乘轮渡渡邕江。夜九时左右，离开南宁亭子圩渡口，沿邕钦公路奔向

钦州。到吴圩天刚发亮，得知南宁昨夜已解放，我仍决心续向钦州前进。中午到达唐报河，河流虽小，但原有浮桥中断，汽车停开，拥挤不堪，不能渡河，我决心修桥，因无材料，派车回吴圩附近征运材料，当夜在唐报露宿。入夜，第十兵团司令徐启明，参谋长诸葛曙亦到达，大家督促架桥，勉强完成。六日早离开唐报，向钦州前进。

向钦州方面撤退的部队，单位，有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的家属，还有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的特务团、宪兵团，总统府警卫总队，军统局交警总队、新兵训练处全部及部队一个团，共计一万六、七千人左右。大小汽车两千多辆，光洋有十多车，美式武器装备两百多车。部队全坐车，行军纵队长达数十里，先头越过吴圩，队尾仍在南宁邕江南岸未走完，谈不上统一指挥。我只好听之任之，抓住本单位部队，其余则用通知转达方式敷衍了事，由他们自由行动。六日下午到达小董。不利的情报，如雪片飞来，形势紧张起来，人心惶惶。据报解放军离小董不远，钦州龙门港方面情况不明。很多已到达的单位和人员，都来向我探询情况，听候办法。我当时想，南宁已解放，有进无退，货到地头死，看看情况再说，过了今晚再讲。决定在车上露宿，以观情况变化，再作处理，表示镇定。

三、小董被俘

六日晚，向钦州前进的部队、单位陆续到达，都在小董露宿。人多、车多、家属多、异常混乱，找人不容易，传达命令更不容易，我感到束手无策。只能掌握新兵训练处这个

单位，其他由他们自由活动。我打算如果情况许可，到龙门港后再规定上船次序。当夜八点钟左右，第十兵团司令徐启明、参谋长诸葛曙亦到小董。他们积极找四十六军下落，行动未定。我则一心一意要到达龙门港，目的地不同，心情各异，无话可谈。夜十时左右，他们离开小董，和我分道扬镳，以后得知，他们向龙州方向前进，在上思附近碰到解放军，诸葛曙被俘，徐启明化装潜逃香港。

七日拂晓，钦州方向隐隐约约传来枪炮声，我想情况不简单，钦州必然在战斗，情况并不突然，而是预料中的。不过时间感到快一些，提前了两天。假如唐报河桥不断，行动不受阻碍，我已渡海了，现在情况显然渡海成了问题，我虽不慌张，但觉得任务在身，责任大。这些人都在看我的态度，我决亲到钦州附近看看情况。乃率两辆大卡车的武装兵六十人左右，自己和妻儿坐一部小轿车，不顾一切，奔向钦州，观察战况。约八时左右，到距离钦州约十公里处之公路上，碰到四十六军军长谭何易（和笔者系南宁军校高级班同学），军部人员全在，得知钦州于昨（六日）夜已被解放军占领。四十六军两个师，清早对钦州攻击，抵抗力很强，现未能攻下，已停止攻击，另作打算。谭问我到此何干？我笑说：我是后方大杂会的总指挥，打算到龙门港上船过海南岛去。他说：这个行动应在半个月前开始还可以，何以这样迟缓？我说：这是白先生的从容不迫的战略，我们只好听从。同时我把南宁四日晚已解放，白崇禧已于当天飞海南岛，我奉命率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及其他后方部队单位，和我自己的新兵训练处，到龙门港登船过海，并告诉他其他全盘情况。他问我他的四十六军应该怎样行动？我告诉他徐启明兵团本

部已向龙州方向去。你们目前唯一出路是向龙州走入越南，别无其他路可走。他同意，并请我跟他一起行动，我说：我庞大的后方部队，这里无去龙州的公路，转移不便，交通情况，部队情况，都不许可，我回小董后，再决定行动。于是我就和谭何易分手。四十六军乃向龙州方向活动，以后情况不明，我当即转头回小董。

我回小董后，在小董的部队、单位，都在等候着，我把钦州方面的情况，明白向各部队、单位传达。并说：我们前无去路，渡海无望，我决定在此等待解放，大家的行动可由自己决定。于是特务团、宪兵团及总统府警卫总队等都自由行动，以后下落不明。新兵训练处及家属和其他非武装单位，人数约两万多，大小汽车约三千辆，均满载人和武器、弹药、行李、光洋等，男女老幼，形形色色的人都有。中将、少将、上校不知其数，都在当天（七日）在小董不抵抗情况下而全部被俘。

在小董时得知：六日下午，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先头到达龙门港的家属、部队，在紧急情况下，由陈炯率领抢先上船渡海，状很狼狈。而在小董被俘的部队、单位，系由华中向广西汇合的残余，汽车多、家属多、行李多、特别是高级人员多，中将十多名，如步校教育长刘震清，武汉陆军医院院长中将某在内，还有吴锡龄、冯巖、徐雄等。少将级近百人，上校更不知其数。其他人员，部队，单位可算是最复杂的一群，大家都做了俘虏，从此，桂系统治广西二十多年的局面算是基本结束了。扫除大陆上之腐朽残余，广西人民得庆新生。

新兵训练处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新组成的训练新军的单

位，我系参谋长，对它的行动我有直接的责任。其他部队单位，白崇禧临时指派我率领到龙门港，我无什么责任可言。在那种情况下，无法指挥，只好听其自由活动。又因我带有妻子儿女跟着，不忍在战场上抛弃妻儿于不顾。并认为今后的安危祸福，生死利害，已在未可知之数。在这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关头，打也打不起，抵抗也无用，徒招无谓之牺牲，无补于事，别人坐飞机去了，我却蒙受这种遭遇，再进一步自找灾难，何苦？唯有放下武器，听命运支配，连新兵训练处人员及一个总队，都已星散，集中不起来，原来所属之三个总队，先向海岸活动，现在更加情况不明，考虑到此，我决定一切不管，当夜我携带妻子和少数随从警卫人员，到小董民房住下，喝酒消磨时间，以待解放军到来。我感到这段时间，是我从军近二十多年最难过的一段时间。约十二时许，小董周围浓密的枪声逐渐接近小董街道，我命一个副官在门口等候，俟解放军到我住处附近时，引他们进来。果然枪声稍停，四周呼喊“缴枪优待”之声不绝于耳，并叫谁是指挥官。又听答声：“有个新兵训练处陆参谋长，住这里附近。”我听了很刺耳，也很难过，但又想事到如今，还有何话可说，命运和前途悉听自然支配。五分钟左右，我的副官韦钧带解放军战士三名，进我住户，算有礼貌，叫声：“参谋长”，并请我给他一张名片，二人在等着，一人回去，约十分分钟左右，带来一位青年干部，据称系团部派来，态度很好，很有礼貌的请我到团部去。并说：“你安心去，你家属有人负责照料。”我到团部时，已有不少的高级被俘人员先到，那位团长很客气和我握手，表示欢迎。并说：“为参谋长得到解放新生祝贺”我真有点汗流浹背，不

知如何答好，只点头唯唯而已。和我谈话时间很短。即请我仍回原住地，照顾家属。并派几个战士和一个青年干部同来，名为保护，实系监视，从此我就成战场俘虏，作阶下囚，开始逐步改造，走向光明新生的金光大道。第二天清早，由一位青年干部带到一个较大房子住下，他就专负责招待我。我开玩笑地对他说：“同志！我如果早知被俘这样优待，轻松愉快，我早就自动解放了。”他也笑笑地说：“从你的家属情况看，如果你没有家庭拖累，你是走了，不会解放的。迟解放不如早解放，为着革命我们欢迎你。”听了这些话，使我啼笑皆非，在小董住了两天，我们这批较高级的俘虏（上校、少将、中将）连同家属约五六百人，由解放军一个连护送，向横县方向移动。我个人蒙特别优待，配给马一匹，马夫一名，通讯员一名。据说，因我系这次由南宁到钦州的率领者，特予优遇。其他不管什么人，都是自己步行。约两三天，到达横县的云表圩，改由汽车运送宾阳，转解送柳州集中。

解放小董之人民解放军部队，据说系二野三十三师之一一个团。解放后第二天，团部派人来替我们照相。我本人和全家大小八九人，在那批高级战俘中，是蒙特别优待的。行动中，又另外派两个战士，替我背小孩，我也步行，用马驮行李。到宿营地，首先替我准备房子，柴米，肉菜具备，在那种困难生活中，每天还配给我全家每人肉类半斤。照顾备至，的确做到按政策办事，优待俘虏，使我感激。

解放初从大陆逃到港澳的 桂系军政人员概况

谢凤年

一九四九年底，整个大陆都已解放，桂系部队已全部被歼，（除四六军军长谭何易率领一个师逃入越南外）大部分高级军官都已被俘。可是，当时由于刚解放，而解放军一时觉察不出那些乔装改扮的分子，故有一部份能潜逃到港澳，其中有：第十兵团中将司令徐启明、桂中军政区中将司令王景宋、桂南军政区中将司令罗活，前北平行营中将军法处长黄敬修（李宗仁的表弟），前桂林民团中将指挥官黄绍立，五十六军中将军长马拔萃、师长李芳西、杨受才，杨创奇、广西防空副司令陈桂、柳州警备司令秦镇、桂绥署处长李人翘副处长莫志鹄、二处行动队长柯不克、玉林专员周益雄、华中长官公署二处副处长伯宁、廖啸文、警卫团长邝斗、省府委员梁朝玑柳州警察局长王景宜、县长则有罗培中、黄琼森、陈鸣岗、吴其松、林剑峰、林鹏飞、潘昆华、高锡攀、方棠美、梁镜、鍾鑫等数十人（有些人的名字因日久已记不起）。县警察局长则有廖兰、彭公寿等十余人，还有广西大学训导长谢康，西南商专校长廖竞存和广西清党时期杀害共

产党人士的驰名刽子手黄华表、黄同仇，中共叛徒梁耀宝等人。至于中下级军政人员竟达七、八百人之多。除了少数早已把家属和金钱调到港澳。有了固定的安身之所外，绝大多数都是身无长物，生活无着。逃港后，有些暂时靠亲友维持生活，有些则靠出卖劳力，甚至靠乞讨过日，充满树倒猢猻散的凄凉景象。一九五〇年初期，黄旭初，见到这种情况，不得不拿出港币一万五千元交黄崑山负责在九龙启德机场附近的留香园建了一座二层楼的简易房屋，作为容纳这些逃港而又无亲友照顾的文职人员（省府所辖的伪人员）栖身之所。当时象黄同仇、谢康之流也不得不住在这里。这栋房屋面积很小，住了一百多人（包括有家属、小孩），故拥挤不堪，甚至连厨房，走廊都铺满了帆布床和地铺，卫生条件更污秽不堪。柳州警察局局长王景宜夫妇就住在一个仅能铺一张床的小厨房内，而其幼女则因拥挤不堪碰倒了热水炉当场被滚水烫死，可谓惨矣！而住在那里的单身汉伪都安县长，省参议员林鹏飞（桂系特务）因贫病交迫，无人过问，至僵死在帆布床上两天，才被人发觉，报请香港警务处派黑箱（所谓黑箱是用来收殮无人认领的尸体）来把林的尸体运去火化。当时在场看到这种情景的人，大有兔死狐悲之感。由于留香园八号的房屋狭窄，无法容纳这么多的逃港人员，加之生活困难，大部分中下级人员不得不跑去香港政府社会局所办的调景岭难民营（那里的生活艰苦，住食条件都很差，不能温饱，故当时一般人称“调景岭”为吊颈岭）登记，请求收容，当作难民安置。我的一个老同事曹让尊（曾任绥远省防空副司令，广西省会警察局主任秘书），在桂林解放时，由于他对共产党的政策有错误认识，偕妻儿逃到香港，，可以

依靠桂系头子养活，怎知事与愿违，无人理他，我亦爱莫能助，不得不全家到难民营，请求收容。象这样的人，颇为不少，仅举此为例。逃到港澳的桂系伪军官更属不少，最初，白崇禧、李品仙还想笼络一下人心，利用他们回大陆进行破坏活动，故从台湾指示在港的伪华中补给司令许高阳，桂绥署二处处长汤济（桂系特务头子之一）和唐纪、李品蓁（李品仙的胞弟，梧州红帮大哥），在湾仔六国饭店租了两间房办理登记，并发给一些微少的救济费。另外还拿出港币一万多元在九龙大埔道一二六号三楼顶租了一层房屋，安置一些无家可归的较高级军官，如杜定芳，李芳西、陈炯、李人翘、伯宁、廖啸文、柯不克等都住在那里。但好景不常，因白崇禧、李品仙拨出来的钱并不太多，而逃港的伪军官人数越来越多，大有僧多粥少之概，尤其是发现指派回大陆，组织土匪暴乱的，只有杨创奇回广西搞土匪暴乱被捕镇压了，其他的人，钱到手后，均裹足不前，避而不见。后来李芳西拿这一万元港币到粉岭开咖啡室，杨受才则到元朗圩开养鸡场。白崇禧知道后，很生气，但却无可奈何。特别是在台湾的蒋介石发现李宗仁在海外搞第三势力，进行反蒋反共活动，因而向白崇禧、李品仙施加压力。故白不得不命令汤济等在香港停止活动。因此，这些逃港的伪军官再也拿不到微少的活命钱，纷纷哄闹起来，指责汤济等人从中贪污，去找汤济等算帐，弄得汤济不敢回红磡芜湖街六十三号三楼自己家里，秘密避居香港附近一个小岛。而住在大埔道一二六号三楼的高级军官也被中断了救济，结果由他们自己商量，把大埔道一二六号这层楼出顶，各分得港币一千多元，各自找栖身之所。后来我知道李人翘，莫志鹏跑到九龙油麻地吴淞

街新皇宫旅舍做管帐（新皇宫旅店是广西蒙山人黄奇开设的），来维持生活。至于伪广西省府主席办公室这个桂系特务组织，除了特务头子梁学基和尤宗乾早已逃到香港外，其余是在解放前几天或解放后逃到香港。计有梁定远、谢勇、林鹏飞、梁耀宝、黎宗辅、牟甲珠、谭君侠等人。这批特务到港后，原以为可以在香港过舒服生活，误认为他们过去在广西曾替桂系干特务，卖命多年，有了汗马功劳，理应由黄旭初、梁学基很好的安排他们的生活，怎知道当他们去找黄旭初时，黄则说“已给港币五万元，交梁学基做好安置他们生活的工作”。可是，他们到湾仔电器道三号找梁学基时，梁又推说“黄旭初没有交这笔钱给他来安排他们的生活，等他请示过黄旭初，有钱拨下来再说”。总之，黄、梁之间互相推诿，引起这批特务极为不满，终于造成梁学基和梁定远反脸争吵起来，断绝来往。由此可见，多年共事搞特务的老伙伴，一旦为了金钱，也反脸不认人，可谓绝情弃义。但是，梁学基为了避免别人攻击他手段太毒辣，太无情，假意收留了一个年轻单身的特务谢勇在他家居住，实际上也是只供给两餐一宿（睡在厅上的帆布床，日拆夜铺），连零用钱都不给一个，还经常把谢勇当成通讯员一样使用，等于不花钱请的佣人。最后在一九五一年梁学基举家搬到大埔圩禁山六号居住时，谢勇也忍受不了这种刻薄的待遇，离开梁家，自谋生路。叛徒、特务梁耀宝一家四口逃到澳门转香港后，生活十分困难，多次找梁学基要求解决他一家的生活，但都遭到白眼。因此，有一次梁耀宝和我见面时，对我发了一番牢骚，他说：“我后悔莫及，当初不应听信梁学基的甜言蜜语的诱骗，至变节投降了国民党，充当特务，替桂系卖命多年

年。今天亡命香港，无人过问，一家四口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言下不胜感慨万分。最后梁耀宝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找到九龙城一间麻雀馆（赌馆）当茶房，总算找到一个报酬低微的工作，勉强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这帮特务中，林鹏飞饥寒交迫僵饿至死，处境最为恶劣。黎宗辅则全靠一个香港的中医劳某收留，至免挨饿，牟甲珠，则全靠荃湾竹林寺的主持老和尚收留在竹林寺内食宿。据我所知，当时这座竹林寺系香港名胜地方，香火甚盛，主持老和尚系广西陆川人，很重乡情，故对广西玉林五属一带逃港的同乡，都乐于资助和收留食宿。不少人寄居在竹林寺内，其中就有广西佛教会的道安法师和黄昆山等多人。曾在广西当过多年县长的高锡攀竟然万念俱灰，看破红尘，在竹林寺出家当和尚，这一举动，使不少桂系人士感到悲哀。至于伪桂林警备司令兼桂北纵队司令莫敌于桂林解放后，向人民投诚，经人民政府同意他到香港同家人团聚，到港后，隐居在元朗圩，很少露面。其副司令马谨民（白崇禧的外甥），稽查室主任马赞五（白崇禧的外甥女婿）在莫率部投诚前，坚决反对莫向人民投诚，继续与人民为敌到底。失败后，化装病人，由特务潘速航夫妇（桂林广芝馆的少老板）和文定邦掩护，骗过解放军的检查逃抵香港，住九龙上海街五号地下。当他们后来知道莫敌到了香港，曾准备找莫算帐，但被人劝阻了，才免至发生冲突。马谨民搞土匪活动失败后，躲藏在黄冕附近，为了想保存他这条狗命，一再恳求潘速航等设法秘密护送他到香港，并一再发誓保证，只要他们能护送他安全到达香港，今后的生活由他负责，有福同享。可是，到了香港不久，马即反悔，因而潘等不断遭到白眼，马本人不便出面，即唆使其

母二姑太（白崇禧的胞姐）出面下逐客令，因而潘、文二人都被迫搬离马家，在香港四处流浪。文定邦一气之下，不久便回国到梧州其弟处，潘速航夫妇虽仍在香港大埔圩居住，但两餐十分困难，朝不保夕。大家知道这件事后，都鄙视马谨民这种忘恩负义的可耻行为。总的说来，桂系逃港人员大部分都过着痛苦的生活，生活过得比较好的是极少数。

写于柳州市政协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柳州文史资料 第1期

作者=

页数= 1 6 5

S S 号= 0

出版日期=

目录
正文